

目 录

前言	1
----------	---

佛朗哥的与没有佛朗哥的西班牙政治

瓦尔特·豪布里希

一、处于独裁与民主之间的一个不和的国家	4
二、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的长期独裁 (1939—1975年)	18
三、胡安·卡洛斯一世——所有西班牙人的国王吗?	36
四、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十全十美的政府官员	40
五、拥有二百个政党的国家——西班牙的政治派别	42
右翼激进派，佛朗哥分子，民主的敌人	54
平民化的右派	64
中间偏左的基督教民主党人	79
社会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	86
动摇于莫斯科和民主之间的西班牙共产党人	98
六、非法的工会——工人委员会及其它组织	106
七、军人——依然是实权派	109
八、西班牙的教会——不再是政权的支柱	113
九、在专制下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有限自由空间	117

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经济前景

卡斯滕·R·莫泽尔

一、西班牙经济在担忧与希望之间徘徊	136
-------------------------	-----

二、佛朗哥统治下经济繁荣的支柱	148
国家资本主义	148
社会政策	153
向外国开放	159
法国计划的西班牙版	164
三、佛朗哥的经济遗产	169
社会冲突	169
陈腐的工会	176
在国外的西籍工人问题	181
经济官僚制度及行政管理机构的势在必行的改革	187
四、君主政体和势在必行的改革	193
穷富对立	193
北富南穷	199
西班牙面临着全面的经济变革	205
西班牙被摒弃在欧洲大门之外	212

前 言

佛朗哥用独裁手段，统治了西班牙几乎近四十年。自从佛朗哥逝世以来，多数西班牙人，迫切要求发展、改革和迅速改变他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对此，不同政治集团的最终目标绝不是始终一致的，甚至往往是相互对立的。西班牙捉摸不定的政治前途即使只是短暂的，也引起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关切和不安。西班牙是唯一的一个在近期内可能发展成改变东西方均势的欧洲国家。经过四十年之后，全体西班牙人民，终于又希冀能够自主地参加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

在本书的第一部份（《佛朗哥的与没有佛朗哥的西班牙政治》）里，瓦尔特·豪布里希论述这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其杰出领袖，以及他们接受佛朗哥的烂摊子的可能性。

佛朗哥给他的接班人们留下的国家，经济上也困难重重。社会动乱和经济不稳定是西班牙的家常便饭。在本书的第二部份（《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经济前景》）里，卡斯滕·R·莫泽尔研究了佛朗哥的经济政策及其后果，探讨了个国家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改革和可能变化。

两位作者分别对书中各自撰写的部份负责。材料划分以及题材选择和安排，是在密切磋商与合作下进行的。

第一部份引用的西班牙政治家们的言论，凡未标明出处者，均

为他们与作者的谈话。政治部份的若干章节,取自作者为《法兰克福汇报》所写的报导。

瓦尔特·豪布里希
卡斯滕·R·莫泽尔

1976年2月于马德里

佛朗哥的与没有佛朗哥的 西班牙政治

瓦尔特·豪布里希

一、处于独裁与民主之间的 一个不和的国家

1975年11月22日，一位神情紧张的年轻人，在西班牙议会宣誓效忠宪法。这样一来，经历了八年共和和三十六年独裁统治的西班牙重又变成一个君主政体国家，并且有了一位自称为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国王。短短几星期后，仅在马德里一地就有二十多万工人罢工，成千上万的游行，日复一日地出现在无数城市的街头，高呼着“大赦”和“自由”的口号。乍看起来，西班牙仿佛突然变成一个动乱国家。然而，这是一种错误印象。西班牙一直处于动荡与不安之中，虽然表面上似乎很平静。一位有识之士曾经说过，西班牙犹如初秋的康泰布利亚海^①。表面上风平浪静，一种难以觉察到的、消失在辽阔海洋上的波涌浪翻，是海底深处猛烈运动的几乎看不见的征兆。骤然间，平展展的海面，由下而上地被撕破了。康泰布利亚海的风暴喧嚣而危险。它们是不速之客，业已夺去很多生命。

在独裁的四十年里，起初似乎纹丝不动。在西班牙，有堂堂正正的和平——只有在进一步仔细观察之后，人们才感觉到这是一种坟地上的和平。警察林立，一种精心策划的控制体系，不自由和死刑判决，才使动乱不安未能表面化。但是，早在佛朗哥逝世之前很久，西班牙就失去了平静与稳定的虚假表象。居民内部的巨大对立，一再猛烈地相互撞击着。独裁遗留下了一国不和的人民；顶

^① 康泰布利亚海是比斯开湾的旧称。——译者

多只能说，是时间的牙齿，而不是佛朗哥和他的政策，磨掉了几分不和的锐气。这位独裁者死前不久，再次发生了小规模内战。在银行和商店门前警卫的警察，被冷酷地枪杀；国家不是用公正，而是用报复来回答。佛朗哥重又下令处死政治对手；他们中间也许有几个犯有凶杀罪的恐怖分子，然而按照法治国家的观点，没有一个罪证确凿。被处死者的政治朋友们，也已经搜寻出报复对象在长期独裁下，西班牙人依然生机勃勃、积极进取、富于幻想。但是，他们也还一直有着巨大对立，身上带着长期不公正留下的还未治愈的创伤——一部份人感到自己绝对公正，无可指责；另一部份人则愤愤不平，复仇心切。

在今日的西班牙：右翼激进的治人者，正在争取国王；政治上受迫害的人，在长期监禁或流亡之后，正在寻求工作；青年人，部份还是少年人，正被军事法庭匆促审讯判处死刑。而与此同时，上层大家族却正在欢庆节日，正在温文尔雅地谈论政治。在今日的西班牙，极右的“瓜达拉哈拉穴居人”^①和“民主联盟”或“论坛”的左派人士，兼容并存；安达卢西亚临时工的茅屋，仍然一直存在于赫雷斯雪利男爵们豪华宫殿的阴影下。所有这一切，应该在未来民主的西班牙，在没有压制与强权下，平等地共处——很多人感到这是种空想，而有些人则认为是可以达到的目标。

胡安·卡洛斯许诺过，他要成为所有西班牙人的国王，也要成为那些不恶意让他当国王的人的国王。这种人有多少，无人知晓。因为没有询问过西班牙人。象其他许多别的事情一样，国王和君主政体是佛朗哥给他们规定的。国王登基那一天，观礼台上国家元首的行列，并不十分显赫：乐于参加各种庆典的约旦国王侯赛因，摩纳哥的兰尼埃，在他旁边的是摩尔泰教团首领，还有在西班牙

^① 参阅下文第12页。——译者

牙也特别臭名昭著的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对西班牙特别重要的西方大国政治家们，尚未到场。他们不想在翌日参加独夫民贼佛朗哥的葬礼。一周之后，当胡安·卡洛斯做过祈祷弥撒和军事检阅之后，邀请他们首次觐见国王，他们才光临。

佛朗哥出殡时，西班牙人也许是最后一次领略这个政权从前公开推行的法西斯礼仪。内战老战士，蓝色师、老卫队和佛朗哥卫队老战士——所有这些人，都身穿蓝色长枪党制服——举起右手行法西斯礼，唱着长枪党的赞歌《向着太阳》，《我有过一位同伴》和卡洛斯党的颂歌《奥里亚门蒂》。后一首歌他们不得不改变一段歌词。他们现在不再唱“我们将竭尽全力，让卡洛斯国王进入马德里”，而是唱“让红色的（卡洛斯党的）便帽进入马德里”。因为，成为国王的不是卡洛斯党的卡洛斯，而是另一个阿方索波旁支系的胡安·卡洛斯。大多数卡洛斯党人早就同政府处于尖锐对立之中。议会的议员们仍习惯于呼喊“佛朗哥，佛朗哥”，而新的口号“国王万岁！”，他们倒觉得难以出口。

当国王首次驱车巡行马德里时，在大街上和王宫前，伫立着数十万人。他们或者向新国王欢呼，或者觉得这不过是旧戏新演，并无什么新奇之处，更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值得兴高彩烈。右翼激进派散发传单，讲到佛朗哥的段落，比新国王的段落还要长。传单上说，他们忠于国王，“因为这是我们伟大领袖佛朗哥安排的”。

在同一时刻，近十万想看他们国王的西班牙人，到郊区卡拉万切尔监狱前示威，要求释放政治犯。大约有三千人高呼“大赦”和“自由”。而监狱墙内的一个高音喇叭回答说，在“国王日”，不释放犯人，因此，人们应该回家去。人们不听这一套，于是开来了警察，放了催泪瓦斯，才把他们驱散。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警察用催泪瓦斯和烟幕弹，并不惜挥舞棍棒大打出手，驱散游行，取缔罢工集会。不过，同佛朗哥时代相反，警察不再立即开枪。左翼游行

的抗议也直接针对国王本人。1月底，马德里街头响起震耳欲聋的喊声：“听着！胡安·卡洛斯，人民准备战斗！”人民？大多数西班牙人，既没有去争取年轻的国王，也没有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由于害怕和不安——肯定也有一部份出于无动于衷——他们正在等着瞧。然而，大多数还在小心翼翼地等着瞧的人，将很快地不是投身这一边，就是投身那一边。只要许可，西班牙人习惯于党派分明。优柔寡断或懦弱旁观，不是他们的本色。但是，两个西班牙——人们必须表明站在哪一边——一直针锋相对，剧烈争斗。谁要是夺得政权，谁还得清算夺权斗争的失败者。十九世纪的三次内战，产生一个短命共和国。在共和国里，各个政党从未成为伙伴，而依旧是敌人——有时甚至在大街上，在光天化日之下相互残杀。最后是1936年7月到1939年4月爆发的一场持续三年特别残酷的内战。思想意识的对立，社会的对立和宗教的对立，推波助澜，使阵线分明，壁垒森严。在最后一次内战中，外国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集团也染指其中。

的确，在佛朗哥政治上死气沉沉的长期独裁下，很多西班牙人放弃或者修改了他们过去的立场。另一些人，正是由于他们在这个时期遭遇不公正，政治态度变得更加冷酷无情。1975年秋被判处死刑的青年男女中，有好些人的父母，在共和国时代就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而且四十年之后还依然如故。孩子们从小就目睹战败者的退却和秘密坚持受迫害的政治信仰的情景。后来，他们不再有他们父母那种忍耐，而参加了激进暴力组织：在巴斯克地区，参加巴斯克与自由党；在西班牙的其他地区，参加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他们当中有五个人，9月27日清晨，在警察小队开枪齐射下丧命——三个在马德里附近，一个在布尔戈斯，一个在巴塞罗那。

在马德里西北霍约德曼萨纳雷斯村后面一个小山岗上响起的

行刑队枪声，也许是西班牙由国家出面杀人的最后几枪。不到两个月之后，批准死刑的国家元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也死了。在那个寒冷的9月之晨，死难者的父母和亲戚——在忍耐中经受考验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同新闻记者一起，站在一个距离刑场两公里的山岗上。他们能够听见枪声，在这些枪声下，他们的比较不能忍耐的儿子们死去了。二十二岁的物理系大学生何塞·路易斯·桑切斯—布拉沃，也能听到杀害他的两位朋友加难友的枪声，而他同时在刑场旁边等候着对自己的处决。在二十四岁的铸工温贝托·拜纳被枪毙后四十分钟，二十六岁的锻工加西亚·桑斯被枪毙后二十分钟，他最后被枪毙。三个人都拒绝让蒙上眼睛，也没有给绑在柱上，而是目视着行刑队，悠悠然地站立着，接受警察的致命枪击。特别是加西亚·桑斯的身体被打得血肉模糊。警察不让认尸。整整三个小时之后，当人们要把他埋葬在霍约德曼萨纳雷斯村公墓时，鲜血还从木头棺材里渗出来。鲜血在地上留下了斑斑红迹。桑切斯—布拉沃的家庭为把尸体运回老家穆尔西亚，为参加安葬，进行了长时间谈判。最后，这两项都被允许了。与此同时，霍约德曼萨纳雷斯村的乡村牧师还在浑身哆嗦。早晨五点半时，他被叫醒，告诉他必须出席对三个人的处决。西班牙军事法院的法律要求这样做。

警察被派来守卫刑场。而军队只派了几个代表。军队用十分可疑的军法程序把他们判处死刑，理由是谋杀警察，他们不是同谋犯就是教唆犯，判刑后则由民卫队和警卫队，即武装警察去执行，这样做，军队感到轻松一些。在这两个警察部队里，参加行刑队的人是自愿报名的。在巴塞罗那，当胡安·帕雷德斯在公墓的墙根下被枪决时，他的兄弟米格尔·帕雷德斯被允许在场。胡安身材矮小，被称为“特克西基”。枪声一响，他倒在地上，但他还高唱着内战时期巴斯克共和党人的战歌《古达利亚克》。致命的枪声打响的

时候，他的兄弟把两个手指伸向空中，构成“V”形（胜利的标志）。“特克西基”被押去赴刑时，还把一帧家庭照片交给他的兄弟。他在背面写着：“明晨，我死去的时候，我既不抱怨，也不落泪。我将在九泉之下给你们写信，并同你们大家再会。”然后他用巴斯克语写道：“我为祖国而死。”他的兄弟听到行刑队的一个民卫队员^在在行刑后说的一句话：“这家伙再也开不了枪了。”

三位在马德里被枪决的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的成员，临刑前不准他们互相道别。他们分别被关进一辆警车，走了三十公里，最后驶经田间道路。其中加西亚·桑斯孤独地在死牢里过了一夜，他没有近亲。由一位陆军少校担任他的义务辩护律师。少校把死讯告诉他之后，只在他那儿停留了一会儿。而不能参加匆促审判的辩护律师，则根本不能和犯人接触。在孤寂的死牢里，加西亚·桑斯几乎彻夜高唱政治歌曲。桑切斯一布拉沃有他怀孕的妻子陪伴，为了怕她作政治宣传，把她也关了两个多星期。这位二十二岁的大学生给他姐姐写了一封很冷静的信，他在信中对他那尚未降生的孩子及其前途表示担忧。他写道，他将安静地死去，而且意识到，他的死将有助于创造一个较好的西班牙。据一位律师说，死牢潮湿，没有家具。只是由于这位律师的请求才放了几把椅子。

早晨快到七点时，在马德里卡拉万切尔监狱门前，人们听见大声的叫喊和哭泣。桑切斯一布拉沃的母亲，一片绝望，被拖了出来。她大声疾呼：“他们正在杀害我的孩子。”姐姐叫嚷着有人要打她。此前二十分钟，拜纳七十一岁高龄的父亲和兄弟坐着出租汽车赶到了监狱门口，他们是从六百多公里外的比戈连夜乘长途汽车赶来的。通知下得太晚了。他们只能在他身边呆一刻钟。在穿过卡斯蒂利亚的长途夜车上，他们十分担忧怕来晚了。拜纳几乎通宵达旦地在写着遗言。

三十二岁的巴斯克机械师奥塔埃吉，在一个监狱牧师陪同下，

度过了他最后一夜。他是一位贫穷寡妇的独生子。他的律师因病留在圣塞瓦斯提安，未能前来。没有人预料到会处死奥塔埃吉。他一再为巴斯克与自由党散发传单，很明显他同枪杀一位政治警察的案子有牵连。他把这个警察的生活习惯告诉了后来的杀人犯，而他说，他并不知道他们的意图。

最高军事法庭对他的案子秘密地进行了复审（一种简单的检查程序），此事在处决前十二小时才公布。人们在期待复审时，曾经认为不会处决他。对死刑犯不用绞刑，而用枪决，也是在这之前的夜里才公布的。已经从省里带着绞架赶到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刽子手们尽管没有派上用场，还是得到了特别奖金。

在夏天的夜晚，有好几个穿制服的警察，在回家路上或在街头不知不觉地被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的成员干掉。这些牺牲者不曾审理过政治案件，不是“审讯专家”。杀害他们，也遭到反对派各政党的谴责。一批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的成员被捕，政府和军事法庭十分匆忙地进行审判。在一次仅仅持续两小时半的匆促审判中，三个小伙子和两个姑娘被判处死刑。他们的辩护人，以及候补辩护人都被军事法庭逐出法院大厅。被告和辩护人详细地描绘了政治警察的严刑逼供。9月27日处决的五人，即使根据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也只有两人是实际肇事者。另外三人只能算是同谋或教唆犯。

恐怖分子枪杀警察，国家下令枪毙那些可能或也许是恐怖分子的人。与此同时，西班牙的所谓政治阶级——除了极右派和极左派——却在没完没了地举行对话仪式和文明共处典礼。好象屡遭诅咒而苦难深重的“两个西班牙”——顽固坚持传统的西班牙和经常仓促推动更迭与变革的西班牙——终于能够相互交谈，甚至能够相互倾听了。似乎事事处处都向大家表明，这一半的西班牙人不再非把另一半的西班牙人的脑袋砍下来不可了。在莫特里科

伯爵家里的一次盛大婚礼上，左派激进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同佛朗哥的部长们交谈，长枪党党员同他们觉得特别可疑的进步教会领袖们交谈。莫特里科伯爵当时几乎还是一位反对党人物，三个月之后却成为外交部长。在《改革16》杂志的庆祝会上，政治犯的妻子们提醒部长们关心她们丈夫的命运，这些人由于非法工会活动，被判处几十年徒刑。每年接见外国新闻界时，将军们同共产党人，执政的政府成员同地下的社会党人进行了相当激烈的争论，但言辞几乎是友好的。有时也有青年知识分子或商人，请一位部长到他们中间，当面严厉告诉他：“不要再有处决，部长。西班牙流的血已经够多了。不要流血了，您们都应该扫清通往民主的道路。”这位部长没有象反恐怖法所规定的那样，下令逮捕质问者，而是喃喃地讲了一通现在只是法律的法律。一星期后又进行处决——情报部长宣布，“整个内阁团结一致，都赞同处决。”这样一来，就象大家所说的那样，他使他的同僚们的处境永远十分尴尬。然而，在国王的政府里，还有四个是那个赞同处决的内阁成员，其中也有那位被公开要求不要再流血的部长。处决之后，当批评的浪潮由国外涌回西班牙时，另一个绝非文明的西班牙突然出现了：反理性的十字军西班牙，它用咒骂一切外国的东西和普遍的进步，来为它年迈的国家元首歌功颂德。这一个少数好斗分子的西班牙，在新时代面前决不会善罢甘休。此外，它还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个传统可追溯到宗教裁判，天主教一体化和十九世纪好战反自由的西班牙反动派，它还拥有象阿尔瓦拉多长老一类思想家，他们为自己谬误的思维方式感到骄傲，扬扬自得地自命为“酸臭哲学家”。是他们，而不是象多诺索·科尔特斯那样聪明的保守分子，成为佛朗哥西班牙最重要政治家们的祖师爷。这些政治家在二十世纪中叶一直执政。前政府首脑卡雷罗·布兰科，在他的演说里经常招神遣鬼。诚然，现在魔鬼都改换了模样，他们“戴着共产主义，自由主

义和色情主义的面具”。

极右派领袖希龙忧心忡忡地提出了“真正自由”的清单：“欢呼祖国、热爱祖国的自由；在他自己的家园里发号施令的自由；生儿育女的自由……；永远报效祖国的自由。”在佛朗哥的国家里，加西亚·雷布尔将军一直把持着最重要的军事职位；他认为“政党是人民的鸦片，政治家是人民的吸血鬼”。这位将军的这些话，至少部分地和他的朋友佛朗哥不谋而合。在一部匿名发表的长篇小说里，佛朗哥早在很多年以前，就提醒要警惕“大学这个不信上帝和颠覆造反的温床”。象学识渊博的外交家费尔南德斯·德拉莫拉（他自命为哲学家）这样一类政府思想家，也在以不同形式炮制类似的东西。

这些人的西班牙，没有欢庆对话仪式。他们过去和现在——在佛朗哥统治下和在胡安·卡洛斯国王统治下——最喜欢在布拉斯·皮尼亚尔发表讲话的地方集会，例如，在新卡斯蒂利亚省会瓜达拉哈拉附近的一个山洞里。不久前，他们又坐在那里，喝着酒，唱着战争和祖国的歌曲。山洞已经变成一家饭店，后面用一堵石灰岩墙隔开，就在墙后马德里公证人布拉斯·皮尼亚尔被佛朗哥任命为国民运动委员会成员和议会议员。他是西班牙极右派最响当当的发言人。当天晚上，在一帮扛着旗帜、穿着制服的徒子徒孙的簇拥下，唐·布拉斯在瓜达拉哈拉一家电影院里，同五百名集会者会面——他身材矮小而浑圆，然而在仪态和姿势上，却效颦瘦高个的长枪党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这位国民运动委员会成员和议会议员，象学校教师向优秀学生兜售历史事件一样，简略地回顾了西班牙的近代史以借古喻今：西班牙是欧洲之魂。理由是：中世纪欧洲各国的香客，都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来朝拜哈科布斯陵墓。西班牙是这个大陆的灵魂，但不属于这个大陆，而属于伊比利亚—亚美利加。这里不久必将发生一场革命。即使属于欧

洲，那也绝不是自由民主党的欧洲，而是来自许多国家的、与希特勒德国一起在俄国战斗过的志愿军的欧洲。今日西班牙的奇耻大辱是：读马克思和马库塞^①著作的人，比读长枪党英雄莱德斯马·拉莫斯和奥内西莫·雷东多著作的人还多。如果大学生和工人示威游行的话，那末不严禁颠覆著作的政府本身也要负一定责任。当然，天主教堂的讲坛也布道颠覆。现代流行歌曲也很糟糕，缠绵悱恻，和平主义。西班牙青年必须重新歌唱战争和祖国的歌曲。如果西班牙人不愿再看到鲜血的话，东方的男性野蛮人就会到来，使他们的名誉扫地。其实，他们——东方的野蛮人——早已在这里，在共产党国家驻马德里的领事馆里，他们象讲坛上的牧师一样，煽动颠覆。

“瓜达拉哈拉的穴居人”，肯定只代表极少数西班牙人，尽管他们好斗成性，大吵大嚷。那两位女士和十六位先生认为，他们代表远为多数的西班牙人说话，而他们暂时不能论证这一点。这些人于1976年1月底在马德里一家大旅馆里，向新闻界表示：两大地下反对派阵线——“民主联盟”和“民主论坛”——首次在一起聚会。共产党或其他左派政党党员，也首次在马德里介绍了自己的全名和所属党派。在巴塞罗那，这些政党和其他政党的代表，一星期以前已经这样做了；“联盟”和“论坛”包括从基督教民主党人到左派共产党人的各反对党。他们宣布游行和工人集会的详细时间和地点。警察也在场，他们来到游行和集会场所，进行逮捕。这一点反对派是知道的。非法的反对派有意这样干，仿佛他们是合法的。这是对政府的挑战——也应该这样。无庸争辩，在这两个反对党阵线里，有民主欧洲的举足轻重的代表。是的，国王的第一届政府终于想把西班牙纳入这个欧洲。“联盟”在一年半之前举

① 赫伯特·马库塞，现代美国哲学家。——译者

行的记者招待会却要秘密得多。只有少数可信赖的新闻记者被“联盟”成员接去，用秘密的方法带到一个秘密地点。这个地点寓意颇深，是一个名叫“冒险”的咖啡馆，坐落在马德里的“危险大街”上。“联盟”领导想在那里“亮相”。但在这个保密地点周围，引人注目地布满了警察。“西班牙民主联盟”的成立仪式，不得不于几小时后在一个外国记者的住宅里举行。

在反对派各政党里，有来自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工人，知识分子，官员，有时还有企业家，贵族和少数小职员。他们云集一起，进行讨论，共同工作。而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和教授们。他们在政治上为贫穷阶级而奋斗，但却经常疑惑不解地反躬自问，他们是否确切地认识到了这些阶级的愿望和目标。在产业工人中，已经有一个由专业工人所组成的、坚强的政治领导阶层；他们本身是知识分子，然而又在工厂里工作，显示了强烈的阶级意识。他们在参加政治集会之后，同志同道合的资产阶级同志分手，返回郊区简陋的社会公寓，重又走进寒酸的住宅，这时，他们的确感觉到还存在着显著的阶级差别。

在西班牙的某些地方，准封建的生活方式还占据着统治地位。在那里，不同阶级之间也存在着似乎友好的关系；在安达卢西亚的一些大家族的周围，例如在赫雷斯德拉弗朗特拉的雪利男爵们那里。雪利男爵们要没有仆役就无法过地主生活。没有他们，这种欧洲残余的养尊处优的半封建生活方式也就不可能维持。仆役早已不是农奴。他们的举止没有半点儿奴颜婢膝。他们的行动具有自觉意识，甚至具有权威，当然，只能在他们的领域里。主仆密切并存，然而并不生活在一块。每人都呆在他自己的生活领域里。这些大家族生活在赫雷斯城里和周围的宫殿里。这些宫殿在建筑风格上使人想起英国的贵族官邸。在他们的土地上，在他们的巨大的田庄里，屹立着饰有花卉的白色别墅。同样在这些田庄里，农业

工人还部份地生活在茅屋里。赫雷斯所在地加的斯省，是大地主所有制的故土，是一个有显著社会差别的省份，是西班牙文盲最多的省份。直到前不久，农业工人的工资还很低。他们从日出一直工作到日落。中午，地主派人到地里给他们送去“凉汤”；这是一种用醋和西红柿做的汤——已成为一种家常菜，新鲜，解渴，还能充一充饥，而且很稀，吃过后能马上在烈日下继续劳动。

近几年变化很大。即使在赫雷斯，农业工人也短缺；很多人流入巴塞罗那、马德里或中欧。乡村贵族不得不支付很可观的工资，不然工人就罢工，葡萄就烂在藤上。政治面貌也改观了。殷实人家虽然还一直是君主政体分子；然而穷人却只有很少数是无政府主义者。加的斯省曾经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老巢。在周期性的暴动中，一无所有的人奋起斗争，主张激进的变革——然而毫无成就。这期间，部分农业工人改变了主张；温和的左派小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有很大发展。罢工是为了增加工资，不再是为了无政府主义。

赫雷斯的地主老爷们对马匹、葡萄美酒和女人感兴趣——而且顺序也是这样排列的。赫雷斯的真正主人——赫雷斯骑士——仅仅属于少数的十五个家族。人们喜欢叫他们为雪利男爵，而他们大多数也是男爵、侯爵或者伯爵。西班牙西南角上的古城赫雷斯德拉弗朗特拉，年年欢度两天节日周，这两大节日周是献给马匹和葡萄美酒的：春天的赛马节和秋天的雪利节。马匹——西班牙最漂亮的马匹——也属于雪利男爵们所有，属于德特里家族和多梅克家族。费尔南多·德特里在他宽绰的酒店里，向特邀客人们展示他那银光闪闪的骏马。阿尔瓦罗·多梅克邀请客人到他家族的田庄上，由他个人表演驯马术；他称自己骑坐的馈赠品为“舞姿多采的安达卢西亚骏马”。赫雷斯葡萄酒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西班牙酒。英国人特别喜欢喝，但因不会发 Jerez（赫雷斯）一词的喉

音，就给它取了个国际性名称：雪利酒。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血液，也流在这十五个家族的血管里。在这里，清醒的英国商人意识到自己同封建主义的生活格调结合在一起。在雪利贵族中，几乎没有艺术或文学的爱好。在地区首府里，男爵们的自觉的、有时是老爷式的举止，触发了长枪党的诗人弗克萨的灵感，使他写出刻薄的诗句：

一群虚荣而愚昧的牧民
——来自南方，
混身散发着
——马匹与牧场的气味，
这是一面虚假的
 安达卢西亚镜鉴；
他们把酩酊大醉
 作为自己的象征，
他们把注册商品
 当作家族的纹章。

文化和艺术肯定不是这十五个家族的事业，没有人会否定他们文明的生活情调。他们的举止自然，他们和其他社会集团的人有一定距离，但他们毫不矫揉造作。他们不尚豪华，不炫耀新得来的财富，但也不羞羞答答地隐蔽这种财富。族长何塞·多梅克有着一张野猫似的脸，被称为“塞普豹”。他在他那叫做《弗里亚斯王国》的巨大农庄上，实践安达卢西亚的好客精神；客人可以成天骑着烈性马，驰骋在那广阔的牧场上，想成为头牛士的年轻仆役们，会宰杀幼畜招待他。也许，这是一个伟大国家不合历史精神的特色，然而肯定是可爱而令人心旷神怡的特色；这个国家的对立面，尤其引人入胜。这是一些必将消失的事物——然而，也因此是某些西班牙朋友们确实不想弃之不顾的事物。在一些有古老传统的

地区，如在小农经济为主的老卡斯蒂利亚和北部，某些诱人的古代习惯也将很快消失。绝大部分西班牙人已经接受西方工业国家的普通生活习惯。的确，西班牙人将保留一些引人注目和感人至深的特点，如慷慨豪放，勇敢坚定，责任感，团结心，尊严感和好幻想。同样地，他们也将保留所有那些他们自称为“家妖”的东西：嗜好“甜蜜的无政府主义”，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偶尔演变为顽固不化，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喜欢感情用事和主观武断。无论如何，今天大多数的西班牙人，既不是封建主义的男爵，也不是右翼激进的“穴居人”；既不是一腔不平、忍无可忍的谋杀警察的罪犯，也不是为复仇欲所驱使的将军、部长和警察。但是，谁要取得发言权，或者更进一步想要取得参政权，谁就必须不厌其烦地听取大多数西班牙人的意见。

二、 弗朗西斯科· 佛朗哥将军的 长期独裁(1939--1975 年)

随着持续三年之久的血腥内战的胜利，1939年4月1日，在整个西班牙开始了佛朗哥时代。在战争期间，西班牙一分为二，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是半个西班牙的无可争议的铁腕人物。佛朗哥接受对一个饥馑的、贫困的国家的统治。一半西班牙人作为佛朗哥手下败敌，是新建立国家的潜在敌人。然而，他感到他的追随者们也不都是绝对可信的。他们在内战中组成了一个统一联盟，反对共同的敌人：共和国。反对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地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的工团主义者。但是胜利之后，他们要实现本集团和本党派的目标，他们主要想的是重新成为长枪党人，成为卡洛斯党或阿方索党的君主政体分子。有些人还想起他们只是为了保卫自己可观的私人财产才拿起武器的；另外一些人本想通过法西斯主义——浪漫主义的社会革命，来改变封建主义的所有制关系。

战败的共和国战士和民兵并不都在1939年4月1日放下了武器。在难以行进的山区，侯爵、无政府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以及短命的社会主义小组的游击队，开始了一场小型战争。这场战争几乎持续了十年之久，双方——游击队和地方警察（民卫队）——死了近一万人。在这种情况下，佛朗哥把赌注压在有目标的恐怖上。在内战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二十万左右的西班牙人被处死，或死于监狱的饥饿和缺医少药。根据国际司法小组的一项调查，1940年还有二十五万西班牙人蹲在监狱里；按规定，这些监

狱只能容纳一万五千人。大约有六十万西班牙人——更详细的数字没法调查——在内战期间和战后，逃往国外，他们大多数逃到法国和中南美洲。被处决的人和流亡分子大部分是有劳动能力的年富力强的男子——对这个国家是非同小可的劳动力损失。在逃亡难民中，有最著名和最重要的科学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西班牙的文化头脑的外流，对年轻的美洲西班牙语国家有好处，首先是墨西哥。

严厉的镇压不仅反映在内战以后死亡和政治犯的数字上。谁同情共和国，谁就得经常失业；高级官员不得不去当辅助工，挣扎着糊口，或者得不到晋升，而这要算是最好的遭遇了。个人的决斗和复仇行动，往往被赋予政治意义。要想加害某一个人，只要诬告他是“赤色分子”就够了。除了这个政权的铁杆追随者外，谁也不敢公开谈论政治。要想攫取邻居的官职或财富，最最简单的手段是告密。

工人的工资降到 1936 年的水平。数十万人，包括政治犯和被枪决人的子女，靠长枪党的福利组织“社会救济”的救济粮为生。偷运、黑市和贿赂的大时代开始了。在饥饿与苦难中，十分富裕的上层和非法致富的集团，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小偷和娼妓剧增，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佛朗哥政权的最初几年是“饥饿年代”，一想起就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早在 1939 年，佛朗哥就在同合众国际社的一次谈话中宣布了他的国家结构：“西班牙将象意大利和德国一样，建立极权制度的结构……将具有社团形式，这种形式有许多已经在我国存在。我们的政权将结束毒害过我国人民的自由主义机构。”事实上，西班牙建立了无数等级国家的机关：一个强制的工会，它仿效其他法西斯国家的榜样，在政府的控制下，把雇员和雇主拚凑在一块。自由意向的政治代表机构议会也成为一等级议院。但是，佛朗哥的

国家也只是在最初年代是真正极权的。它是极权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后来，则是威严而保守的，然而一直是坚定反民主的。

人们可以把这个政权的历史分为三个大时期：长枪党极权统治的开端时期（1939—1945年），制度化的保守天主教时期（1945—1960年）和技术贵族和开发规划人员的统治时期（1960—1973年）。阿里亚斯总理治下的佛朗哥政权的最后两年的特点是：小心翼翼的自由化尝试的失败，经济增长的嘎然而止，和警察镇压的重新强化。

三大时期的每一个时期，都竭力想找到思想基础和辩解的理由。在这个政权的初期，一种右派乌托邦意识形态统治着西班牙；在文化问题上，官方的西班牙反对自由主义，主张天主教一体化，反对科学，主张民族主义。但是，一直没有达到建立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的目的。长枪党作为国家政党，很快就失去了作用。佛朗哥有意识地从1936年7月18日创立的法西斯主义核心小组中，纠集机会主义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和有威望的长枪党分子，主要是党的左翼代表，被国家元首剥夺了权力，他们原来至少抱有这样一种愿望：实行“已经推迟的革命”，进行一些社会改良早在内战期间，佛朗哥就下令判处左翼长枪党人曼努埃尔·埃迪利亚死刑（后来赦免为监禁），有一阵子，他曾当过党的首脑。

胜利之后，佛朗哥对长枪党仍旧不信任。他给党规定了一种严格的等级和权威的结构，他本人作为党的头头立于这个结构的顶端。他让党章十分明确地规定他身为长枪党首脑的作用：“首脑具有绝对的权威，并可以充分行使这种权威。首脑只对上帝和历史负责。”这样，佛朗哥就一手控制了充塞着不问政治的官僚、已经黯然失色的统一的党。君主政体分子起初几乎没有制造什么困难；他们不能一致地从几个不同的王位要求者中选出一位国王。后来，主张君主政体的政治家提出抗议，他们就被发落到国外去过

流亡生活。国家元首、党的领袖和三军大元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巴蒙德严密地监视着，不许任何政治集团的任何一个人权力过大。谁要过分地追求权势，或者在政治家中高人一头，他就会失宠于佛朗哥。

佛朗哥特别宠爱他在摩洛哥和内战中熟悉的和矢忠于他的将军们。国家元首从军队中，从老的、主要是贵族大资本家阶层和右派政治家集团中选拔他的部长和亲密同事：阿方索和卡洛斯倾向的以及长枪党的君主政体分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则越来越多地从天主教行动会即“全国天主教宣传联合会”中选拔亲信。然而，所有这些政治家必须是佛朗哥的无条件的追随者，必须是佛朗哥分子。作为佛朗哥分子，他们必须接受几项重要的政治原则：拒绝普遍的选举权和三权分立；承认佛朗哥是党的首脑、西班牙的领袖，并拥有绝对的、不可分割的权力；赞成非常有限的新闻与集会的自由；优先照顾私人资本的经济利益，并保证给予国家资助；以工会全面依赖政府为代价，改善雇员的社会安全；警察的不可侵犯性和拥有对付政治颠覆的无限权限，他们是唯一的治安者和拥有控制监督一切的职权；坚决摒弃政治党派。

佛朗哥最重要、最精明的同事是他的连襟塞兰诺·苏尼埃尔，此人最初当过内务兼外交部长。1942年9月，塞兰诺·苏尼埃尔失掉了他的部长职位。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有利于盟国的转折，他的同情轴心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政策成了佛朗哥竭力谋求较大中立的累赘。佛朗哥也同情法西斯国家。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五个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战争初期，佛朗哥相信德国会战胜。尽管如此，他不得不违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要求西班牙参战的迫切愿望。饥饿无力的国家经受不起一次新的战争。早在1939年9月4日，西班牙就宣布自己是中立国，后来在1940年6月12日，又宣布——不很明朗——它是不进行战争

的国家。在国内，右翼极端分子中的积极分子要求参战，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从打败的大不列颠那儿夺回直布罗陀。

西班牙的政府代表团，由于“过分强调西班牙的中立”，遭到戈林的猛烈指责。西班牙政府指出它的供应困难，指出它必须从英国及其盟国进口粮食和其他生命攸关的物品。1940年6月3日，佛朗哥致函希特勒，对“亲爱的元首”表示赞赏，对德国人在斗争中取得的成就表示欢欣鼓舞，“我的人民把这一斗争……看作自己的斗争”。是的，现在正在反对着同样的敌人；西班牙人和德国人在内战时曾经共同反对这些敌人。但是，现在佛朗哥不想同希特勒并肩战斗。“我们在三年战争中所遭受的巨大变动……迫使我们采取公开中立的态度。”但是，西班牙的首脑愿在“您认为必要的时候”，随时为元首效劳。但愿希特勒在几个月后还能想起这句话。

10月23日，希特勒和佛朗哥在法国边境城市昂代会晤。三天之前，希姆莱到了马德里；盖世太保把两个在法国逮捕的西班牙共和国政治领导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前主席孔帕尼斯和社会党人苏加萨戈伊蒂亚，当作“骷髅的赠品”交给佛朗哥。这两人立即被枪决。希姆莱向西班牙人建议，强化镇压，加速实施处决。西班牙的政治警察开始同盖世太保合作。但是，希特勒在昂代鼓动佛朗哥参战却没有成功。西班牙首脑向德国元首提出了无法兑现的条件：他要求把法国在非洲的大部分殖民地让给西班牙。关于西班牙参战的决定就这样被推迟了。希特勒和佛朗哥互不同情，这是可以想象的。对佛朗哥来说，希特勒是“一个浮躁的、不自然的人，一个坏演员”；希特勒则把佛朗哥看作一个“没有政治家和组织家才能”的人。

当德国人进军苏联时，佛朗哥派一个西班牙师到东方战线，即所谓“蓝色师”，也称“西班牙反俄志愿军师”。塞兰诺·苏尼埃尔要求“剿灭俄国”；佛朗哥在一次演说时断言，同盟国已输掉战争。

西班牙声援“我们的轴心国同伴”。大不列颠作出反映，用经济报复对付依赖从英国进口的西班牙，威胁要占领卡纳利群岛。国社党德国的速战速胜变得越来越渺茫之后，西班牙开始采取一项中立政策。为了迎合同盟国，塞兰诺·苏尼埃尔被免去外长职务。

1942年12月20日同葡萄牙缔结了《伊比利亚条约》，强调两国中立。几天以后，佛朗哥采取一个进攻性步骤，主张德国与西方大国单独媾和，旨在共同反对苏俄。1943年12月，“蓝色师”开始退出东方战线。伦敦和华盛顿警告马德里不要支持德国；佛朗哥现在看到，同盟国将打赢战争，他为自己政权的前途担忧，于是他让步了。应丘吉尔的要求，他甚至越来越限制向德国供应象钨这样一类重要的军事性矿物。伦敦和华盛顿在战争结束后，对西班牙独裁者表示感激；它们拒绝莫斯科和巴黎的希望：进行干涉，推翻佛朗哥。

在西班牙国内，饥荒和苦难依然持续着，尽管从1942年末起，食品供应略有改善。处决的浪潮有所平息，1944年，“仅仅”还有一千起，每天三起。佛朗哥十分严厉地——用严刑和处决——对重建反对派的企图作出反应。无数从法国渗入的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蒙遭处决。共产党人基尼奥内斯的脊梁骨在审讯时被警察打断，他只能坐着被枪决（1941年末）。1942年春，佛朗哥在内战之后，首次敢于冒险在国内作长途旅行。他去安达卢西亚。在他访问的城市里，成千上万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在领袖到达之前就被投进监狱。佛朗哥几十年都不敢坐飞机，他害怕行刺；这位小心谨慎的加利西亚人，从未放松保障他人身安全的严格措施。

战争结束时，佛朗哥的统治陷入危机。早在1944年初，西班牙王族波旁家族的首脑唐·胡安就主张元首下野。同盟国胜利之后，山里的游击队又蠢蠢欲动。流亡在法国的西班牙人曾以巨大

的勇气和高度的牺牲精神，为把他们的客居国从纳粹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而奋斗。他们现在心急火燎地也要把西班牙从法西斯主义下解放出来。早在1944年秋，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就攻克和占领了比利牛斯山阿兰山谷的大部分，后来圣地亚哥·卡里略——今日的总书记——受政治局委托，下令撤出了队伍。1944年年底，马德里工人居住区发生了骚乱；长枪党分子和警察联合对付抗议的工人。

轴心国战败之后，佛朗哥试图迅速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政治形势，而又不放弃他政策的原则立场。1945年7月，他把几个长枪党分子逐出政府，起用了几个保守的天主教徒，他们属于全国天主教宣传联合会，表面上看来不象法西斯那样锋芒毕露。从那时起，天主教宣传联合会在这个政权的历届政府中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代表，其中就有任期很长的外交部长马丁·阿尔塔霍和卡斯铁利亚；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政府里，也有他们的代表。然而，佛朗哥改头换面的把戏并未给他带来多大好处。联合国还是决定不接受西班牙为会员国。毁灭性的判决从全世界象暴雨似地扫向这个政权。1946年3月，法国关闭它的西南边境；这样，西班牙就不仅在政治思想上，而且也在地理上被封闭了起来，游离于欧洲的其余部分。

愤怒的法国政府，用关闭边界来回答对十位共和党领导人的处决，他们是非法渗入西班牙的。三个西方大国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我们一致认为，只要佛朗哥将军在那里执政，西班牙就不可能同世界各国建立正常和友好的关系。”东西方共同战胜法西斯国家之后，在还没有闹翻脸之前，西班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遭到谴责的国家。

当然，英国和美国没有断绝同西班牙的贸易关系，这就使法国的措施没有产生毁灭性的经济后果。丘吉尔在这当中起了决定性

的作用；早在 1943 年，他就努力谋求同佛朗哥的利益平衡。4 月，联合国建议其成员国从西班牙撤回它们的大使和代办。佛朗哥和他的宣传家们一再端出共产党—犹太人—自由工团反西班牙世界阴谋的神话，说世界上只有西班牙这一个国家，它的居民自觉地担起了永恒的义务。几年以后，佛朗哥干脆把犹太人排除在他说的那个“反西班牙阴谋的三位一体同盟”之外，以免危及同他的新盟友北美人的关系。

据说，心怀叵测的外国同少数几个西班牙坏人勾结，而说后者是为强大的“反西班牙”组织效劳的卖国贼；这是极右派意识形态中的一个怪胎，它在民族母体内已经怀孕足月，必须象治疗恶性肿瘤一样，把它摘除掉。象毕加索和布尼乌尔、卡萨尔斯和马达里亚加等一些著名的同胞，都为“反西班牙”组织工作——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巴蒙德将军的与世隔绝的臣民天天听到的都是这一套怪论。

庇隆的阿根廷反对联合国决定的制裁，给陷入极大供应困难的西班牙送去大量的食品，尤其是小麦。庇隆拯救了佛朗哥——这不仅仅是庇隆主义的一个宣传口号。所以庇隆垮台后，他能够在西班牙流亡，并得到某种感恩，虽然佛朗哥不想同这位阿根廷人建立个人关系——特别是在后者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左之后。

西方大国和联合国要求西班牙民主化。佛朗哥以他自己的方式回答：他创立一系列机构，如摄政会议和王国会议。它们虽然不是建立在民主原则上，但是却给产生于战争的专制制度披上了合法的外衣。1937 年根据领袖原则制定的接班人法规，也于 1947 年被一项国家元首接班人的新法律所取代。通过这项法律，佛朗哥的国家正式成为一个王国——当然，佛朗哥在世时是没有国王的君主政体。因为佛朗哥是终身国家元首。第二条这样规定：“国家元首的职位授予西班牙和十字军征战领袖、武装力量大元帅唐·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巴蒙德。”十字军征战指的是国内战争。佛朗哥保留选择接班人的权利。接班人的法律给了佛朗哥组织一次有控制的国民表决的机会。据官方的材料，百分之八十二有选举权的人和百分之九十三参加投票的人投赞成票。1958年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原则的法律，1966年通过“国家组织法”，这样，就颁布了最重要的宪法法令。佛朗哥也想以他的制度的机构化来对付外国的批评。然而关于如何处置他的政治对手，这一直由他个人说了算。诚然，在那些年代，残酷的镇压稍有放宽——西班牙人的个人自由的范围有所扩大。

1948年起，新的世界政治形势对西班牙接近西方国家是有决定意义的。随着冷战的开始，对西方来说，西班牙的价值提高了，改善同佛朗哥独裁政权的关系变得重要了，民主的考虑不得不退让了。1948年2月，法国重新开放它同西班牙的边界。同年5月，西班牙同法国和英国缔结新经济协定。西班牙重又得到美国银行的信贷。1950年末，大使们返回马德里。两年之后，西班牙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1953年成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成员。

总的说来，1953年是佛朗哥政权在外交上最重要的一年。被蔑视的独裁制度终于又变成能够容忍了——至少对梵蒂冈和华盛顿是如此。8月27日，西班牙政府和教皇圣座签署一项条约。9月20日，西班牙和美国签订了关于国防、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的协议，即《马德里条约》。通过宗教条约，佛朗哥获得参与任命主教的权利；他给天主教牧师会、牧师学院、教会学校和大学，提供了一笔很可观的财政资助。当后来西班牙主教团越来越经常批评这个政权的不民主政策时，当时的政府副首脑卡雷罗·布兰科，1972年粗暴地指责主教们，要他们数一数教会从佛朗哥的国家得到多少钱：1939年以来共一百五十亿马克。随着宗教条约的签订，教会和国家的密切联系达到顶点，西班牙民族天主教取得了它的最大成

就——它的格言是：凡对西班牙（应该做：对弗朗哥政权）是好的，对天主教会也是好的。

与美利坚合众国签订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军建立四个军事基地——三个空军基地（托雷洪，塞维利亚附近的莫隆和萨拉戈萨）和一个海港（西班牙南部大西洋海岸的港口罗塔），后来在那里部署了北极星导弹。美国答应给西班牙经济和军事援助，1954年援助达二亿二千六百万美元。协定的签署对此前已经开始了的工业化产生有利的影响。西班牙的有产阶层相信这个政权的稳定，开始把他们的一部分财富在西班牙投资，而以前这些财富大部分流向外国。外国资本也对西班牙——当时是一个工资低得令人发笑的国家——变得有兴趣。

首批投资来自美国和英国，接着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来投资。通货膨胀率是高的。由于国家通过官方工会组织和政治警察严厉控制工人，工资的增长很缓慢。对于一切有产者来说，无政府主义的、法律难以控制的经济增长的发财时代开始了，疯狂投机倒把和在西班牙前所未有的贿赂成风的快乐时代开始了。新工业的生产率虽然很低，但是工资和税收都很低，国家又保护同外国的竞争，所以，即使效力很低，盈利也比先进工业国家高。当然不会长此以往，到了五十年代末，就只好实行一项十分激进的稳定计划。

1953年起，西班牙又逐步变成国际大家庭的一个正常成员。同大多数国家的双边关系有所改善。1955年，弗朗哥的国家加入联合国。此后，马德里要加入其他国际组织，就再也不会遇到困难了。七十年代初期，洛佩斯·布拉沃任外长时，西班牙决定同东欧大多数共产党国家建立商务和领事代表机构的关系。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别于1973年1月和3月，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然而南斯拉夫拒绝在马德里建立代表机构。弗朗哥

和铁托都是内战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家元首。在那次战争中，他们曾经在不同的阵线上战斗过。尽管华盛顿施加种种压力，西班牙从未断绝同古巴的外交关系。今天，古巴是西班牙在拉丁美洲最重要的贸易主顾。

西班牙在外交上对操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怀着特别的偏爱。这是一些操相同语言并且有长期相同历史的国家，除了进一步巩固正常的文化关系外，这些努力的成就是扩大西班牙的市场，并使拉丁美洲国家更乐于在联合国里支持西班牙的利益，尤其在直布罗陀问题上。围绕着直布罗陀争端，阿拉伯国家大多数也一致赞同西班牙的立场。为了不损害同阿拉伯世界的良好关系，马德里放弃了同以色列的正常外交关系。

直布罗陀曾经长期是西班牙外交政策所老生常谈的题目——当然也出于内政原因。直布罗陀是唯一的全体西班牙人意见一致的问题：即现时属于英国的这块险峻要地应该重新归还西班牙。固然，只有少数西班牙人打算为直布罗陀争端诉诸武力。伦敦也不乐意把直布罗陀直接归还给独裁者佛朗哥。此外，西班牙南端的悬崖绝壁上的居民，宁愿仍旧同英国联系在一起。

西班牙竭尽一切和平手段，但都未能成功。关闭边境和撤回西班牙工人，引起英国人，尤其是直布罗陀居民的不快，使他们明显地增加额外费用。但是，在长期谈判中，除了紧张的“共同思维”（洛佩斯·布拉沃语）外，一无所成。在佛朗哥政权的最后几年，西班牙政府甚至准备给直布罗陀居民以民主权利和自由；虽然它拒绝把这种权利赋予三千五百万西班牙人。

非殖民化政策较有成效。除了一些小事件——1957年同摩洛哥进行的伊夫尼战争和赤道几内亚独立后不久反西班牙人的骚乱——外，仍属于西班牙的小小殖民财富的交让进行得相当顺利。西班牙摇摆不定的西属撒哈拉政策，可能要对世界上酿成一个新

的不安的策源地负责。西班牙长年谋求加入欧洲共同体都未获成功。佛朗哥国家的政治结构与西欧民主国家的结构水火不相容。佛朗哥及这个政权的其他政治领导人(卡雷罗·布兰科,费尔南德斯·米兰达),愤怒地拒绝作出政治让步。

1957年组成的政府,第一次吸收天主教凡俗组织“上帝事工派”的成员参加。十几年间,上帝事工派的政治家们参与制订西班牙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上帝事工派一再声明不怀政治目的,不鼓励它的成员从事特定的政治活动。然而,在西班牙从事政治活动的上帝事工派的成员,大多数是专制的、不民主政策的热心卫道士,具有强烈的高人一等的思想。在经济政策上,他们竭力主张推行尽可能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经济。同时,他们也经常在社会政策上与长枪党发生冲突。

长枪党不可能或者不想给工人们实现他们的社会和经济要求的任何自由,长枪党人也几乎未能提高社会上弱小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但是,他们贯彻了一系列保护雇员的规定,例如使他们不被解雇。

五十年代末通过的稳定计划,在经济上是一项重大成就,这项计划主要是由上帝事工派的部长们负责制定的。比塞塔贬值之后,通货膨胀被紧急刹住,西班牙经济上的孤立宣告结束。许多不能赢利的公司不得不关闭。失业猛增;同样,很多工人流入中欧。开始时,无数家庭的收入下降到一半。

开发计划时代和上帝事工派成员洛佩斯·罗多教授政治上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的时代开始了——1973年,由于上帝事工派技术贵族的保护人卡雷罗·布兰科海军上将遇刺身死,洛佩斯的鸿运才告终结。在西班牙行政管理的重要位置上,无能的长枪党人和军人,由现代技术贵族取而代之,后者往往是在国外造就的。在与保守天主教徒—上帝事工派的技术贵族的长期争斗中,长枪党现

在是明显地败北了。虽然在历届政府中仍有长枪党人，但是无论如何，那些适应和同化了的政治家，同“纯粹长枪党人”有着很大的距离。几个“纯粹长枪党人”小组，成为忍气吞声的反对派，其追随者寥寥无几。天主教保守分子直到1969年还能在内阁中保持重要位置，卡雷罗·布兰科死后，他们再度大大失势。各种民主党人依旧被排除在西班牙的政治生活之外，他们被迫沉默不语，或在地下进行危险的斗争。

对外往来的急剧增长也促进六十年代的经济高涨，这对各阶层人民都有好处，虽然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社会金字塔的结构几乎毫无变化。然而一切阶级的生活水平均有提高——又是金字塔顶端的阶级比基层提高得快得多。但是，自从内战以来，西班牙第一次再也没有人忍饥挨饿——极少数社会边缘集团除外。不过，工人的社会要求和政治抗议还在增加，在大学里和知识分子中尤其如此。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人变得更为自信。很久以来，他们第一次有点小小的钱财积蓄。一周的罢工不再意味着全家立即挨饿。有些工人也在国外做过工，亲身体验过法国、比利时或德国的自由工会的工作。

内战之后，工人运动最重要的组织是“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的最孚众望的工人领袖，几乎全被判处过长期监禁：马塞利诺·卡马乔，胡利安·阿里萨，爱德华多·萨博里多。这些非法工会的首批领袖，是从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工人组织中产生的；在那些岁月里，西共的影响变得具有决定意义。1962年以来，罢工不断增加。西班牙报纸至少第一次被许可暗示，在阿斯图里亚，很久以来矿工一直在罢工，尽管报导是以漠不关心和歪曲真相的形式写的。

1963年，一个西班牙事件再次激起世界舆论的哗然：审判和处决共产党领袖胡利安·格里毛。在随后的岁月里，对政治犯进

行军事审判和处决的悲惨情景还在重演：没有辩护保障的军法审判程序，把辩护人逐出法庭大厅，被告关于政治警察严刑拷打的令人毛发悚然的证词，没有证据的判决，死刑犯的妻子和母亲对主教和外国报社记者进行的绝望访问，全世界各国国务活动家们的赦免请求，内阁里关于赦免或处决的长时间激烈争论，晨曦朦胧中把未被赦免的罪犯运出监狱，用绞架或枪杀处以极刑，律师和家属们关于最后一夜的报导，报上发表《遵从公理》的简讯，对被杀害者是否干过归咎于他们的罪行表示怀疑，等等。

在格里毛案件中，世界舆论第一次知道有一位名叫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的年轻部长，他想要在佛朗哥死后扮演最重要的政治角色。今天他已成为民主党人；当时他下令炮制最恶劣的、诽谤性的、骗人的宣传小册子。他设立一个特别政治法院，对付那些要求调查可能发生严刑拷打的人。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贝尔加明公开严厉抨击这位部长。他起初被赶到乌拉圭使馆，后来流亡国外。

但是，同是这位弗拉加也为西班牙缓慢的自由化采取了最重要的措施：1966年，他颁布新闻法令，废除预先新闻检查，用一套精心策划的预先警告、建议、施加影响、惩罚威胁和严厉惩罚的制度，取代全面检查。

在1965年7月组织的政府中，上帝事工派周围的强大部长集团同其他政治派别的内阁成员之间，如弗拉加·伊里瓦尔内，外交部长卡斯铁利亚，长枪党人、“国民运动”部长索利斯，终于爆发了一场权力苦斗。马特萨纺织厂的财政丑闻是导火索；据说，西班牙国家在这一丑闻中受骗走了五亿马克。有好几位属于上帝事工派或接近这个凡俗组织的部长，被怀疑卷入了马特萨案件。情报部长让报纸详细报导马特萨案件。对他和他在内阁里的朋友们来说，这一丑闻应该是对上帝事工派技术贵族们的决定性打击。然而他

错了。佛朗哥向来不乐意看到这个政权的家丑外扬。

1969年10月29日改组政府时，弗拉加和他的朋友们失掉了职位，两个由于马特萨事件而最犯众怒的部长也离开内阁；但是现在，大多数内阁成员来自上帝事工派或它的外围。这个所谓清一色的政府，管理这个国家近四年之久。佛朗哥为马特萨案件中被控告的前部长们发布特赦令，象从工业部调到外交部的洛佩斯·布拉沃等一些达官贵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免除受诉。马特萨丑闻从未得到彻底澄清。1975年5月，马特萨纺织公司的多数股东共被判处二百多年徒刑，1975年12月获得自由。

年事日高、身体日衰的佛朗哥，1969年7月决定解决接班问题。他提出让胡安·卡洛斯·封·波旁—波旁王子在佛朗哥死后成为国王。胡安·卡洛斯接受了；他父亲唐·胡安提出抗议，按照正统的王朝标准，唐·胡安是合法的王位要求者。为数寥寥的西班牙君主政体派重又分裂了。佛朗哥强调，这不是君主政体的复辟，而是“复兴”和重建7月18日的君主制度。这就是说：国王应把他的王冠归功于1936年7月18日佛朗哥反对共和国的起义。

波旁家族卡诺斯支系的王位觊觎者卡洛斯·乌戈·封·波旁—帕尔马，早在多年前就被佛朗哥驱逐出境。被选为接班人的王子胡安·卡洛斯完成了取而代之的任务。直到他被任命为国王之前，他对国内政治毫无影响。佛朗哥决定国策，在一切重要问题上，他依然独断独行。因为王子在私下谈话中一再发表自由的观点，佛朗哥对他不甚信任，因而颁布一项法令，让王子在实际上承担义务，应该接受佛朗哥的总理、极端反动的卡雷罗·布兰科。不过，卡雷罗·布兰科于1973年12月20日，在马德里市中，被巴斯克的社会革命自治组织巴斯克与自由党的暴徒们杀害。这样，八十一岁大元帅的接班计划中的主要一环就此断裂了。卡雷罗是佛朗哥最长久最亲密的同事。佛朗哥在半年前，才提拔他为自己的

第一任政府首脑。直至1973年夏，佛朗哥本人一直兼任两个最重要的职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原来并非诉诸暴力的巴斯克与自由党，已经给这个政权制造很多困难。佛朗哥的国家作出的反应是采取严厉的措施：从一开始就用镇压与公审。如1970年12月臭名昭著的布尔戈斯审判，审讯时，一个军事法官把弯刀对准被告，警察在法院大厅里用手枪瞄准被告们的头部，最后判处九人死刑。这些死刑判决由于国内外纷纷抗议，没有执行。

卡雷罗死后，佛朗哥出人意料地任命内务部长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为政府首脑。阿里亚斯多年来是很有影响的警察首脑，后来当了颇孚众望的马德里市长。他在1974年2月12日宣布一项自由化纲领；纲领没有实现。情报部长卡瓦尼利亚斯开始执行政府首脑宣布的纲领并让报纸有较多的自由，他是这样做的唯一的部长，但在九个月之后，阿里亚斯根据佛朗哥的指令把他解职了。在佛朗哥统治下，阿里亚斯政府执政的近两年，交替耍弄自由化声明和强化镇压措施的两手政策。同时，极左团体巴斯克与自由党和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的暴力行动增加了。当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开始几乎不加选择地枪杀警察时，阿里亚斯政府颁布一项反恐怖法令，它首先不是反对恐怖主义，而是针对持不同政见者和政府政策的批评者。1975年9月底，就有五个年轻的西班牙人，经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处决；按法治国家标准，这些审判没有任何证据——其中也有巴斯克人安赫尔·奥塔埃吉，即使起诉书也没有归咎他犯有暴力罪。

抗议浪潮席卷国外，人们袭击西班牙外交和商务代表机构的建筑物。已经命定行将就木的佛朗哥，再次利用外国的抗议，把外国对他政权的具体政治措施的批评，向那一部分闭塞无知人民，描绘成是欧洲对西班牙传统憎恨和嫉妒的恶性膨胀。1975年10

月1日，政府组织了最后一次所谓爱国的游行示威，佛朗哥再次谈论什么自由巧工团和共产党人反对西班牙的臭名昭著的共同阴谋。但是，与从前相比，民族主义的调子得到的附和减少了。1975年秋西班牙人民显示的政治成熟程度是他们的官方政治领袖所不愿意看到的。

僵硬的政治结构，对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是太狭窄了。西班牙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早就争取到较大的自由空间。因为，同大多数的独裁制度相反，西班牙在文化上并没有落后于它的邻国。这个政权早就不再具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它允许发表一切艺术和知识的见解——如果不是十分直接和着重攻击佛朗哥和他的政策的话。所以，在西班牙能够产生杰出的现代绘画。戏剧和电影困难一些。西班牙作家发展了暗示和比喻，真是独具匠心，尽管书刊检查和被迫自行检查肯定严重地损害了当代西班牙文学。躲避书刊检查的一条出路依旧是在伊比利亚—亚美利加语言地区发表在西班牙写作的书籍。政治流亡作家，在象阿根廷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里，也总能找到懂得他们语言的读者。

尽管困难重重，并且要顶住当权者的反抗，在佛朗哥逝世时，西班牙的大部分早已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在生活习惯和风俗习惯上，西班牙和法国或意大利也只有微小的差别。今天，在马德里、巴塞罗那或塞维利亚，年轻的西班牙人，如同在伦敦、巴黎或法兰克福的同龄人一样，生活悠然自得，不受传统和习惯的约束。不过，城市和平原地区农村的差别，地区差别，旧仍是相当大的。1960年以来，由于农村人口迅速外流，很多有趣的文化传统和习惯消失了。

1975年10月14日，在最后一次下令枪决政治对手的十八天之后，佛朗哥身患轻度流感。尽管如此，三天之后他仍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10月21日，他患了严重心脏病。后来，迸发了肺气

肿，肠胃出血和腹膜炎；三十二个医生和三次手术也拯救不了这位近八十三高龄人的生命，而只能延长他的痛苦的死亡过程。11月20日清晨，佛朗哥逝世。在对佛朗哥和西班牙如此重要的1936年的11月20日，几乎也在清晨，本世纪西班牙政治生活中的另外两位要人都在暴力下死于非命。长枪党的创始人和右派最重要的政治首脑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在阿利坎特监狱院内，在一支共和国枪决队的枪林弹雨下，了结残生；众望所归的无政府主义者领袖和马德里大学城战线的内战英雄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给自己队伍中的一颗神秘的子弹击中——事故或暗杀。

佛朗哥死的时候，西班牙是一个经济上危机四伏、然而已经相当发达的国家。这位独裁者逝世四个星期之后，西班牙的外交部长首次能够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坐到富裕工业国的席位上。然而在政治上，1975年末西班牙是一个不发达国家。佛朗哥把一个迫切需要和平、然而又是不和的国家，交给了他的继任人胡安·卡洛斯一世国王。

三、胡安·卡洛斯一世——所有西班牙人的国王吗？

西班牙的国王们没有带给西班牙人多少幸福。特拉斯塔马拉的统治是靠谋杀一个兄弟建立起来的。他们有好几个人发了疯；可能是特拉斯塔马拉公主霍阿娜这个疯子^①，把精神病的基因也带进了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的第一个哈布斯堡家族的国王查理五世，几乎无暇关照西班牙，但是，他需要很多西班牙的钱，去应付他帝国内部其他地方的频繁战争。最后几个哈布斯堡人的无能是可以想象的，他们长年累月地害着抑郁症，例如，由于对现实世界胡思乱想而变得精神恍惚。大多数西班牙的波旁家族也患抑郁症，虽然他们较为朴实的性情并没有被特别的幻想和亢奋的思想所摧毁。不过，这个王朝的几个成员——首先是妇女们——以穷奢极欲而著称。女王伊莎贝拉二世（1833—1868年在位）的政府首脑不得不经常提醒她，要略为限制情人的数目。在她活到近百岁死去时，她的最漂亮和最聪明的女儿欧拉丽亚公主，成为女权运动者，社会党人和共和党人。伊莎贝拉是一位既任性又仁慈而慷慨的女王。然而也正是伊莎贝拉二世给西班牙人带来无数悲剧性的纠葛。关于她继承王位的合法性的争端，导致了三场卡洛斯党人的战争。她在政治上的无能，是发表很多声明的原因，是几次起义——被血腥镇压——的原因，并导致对她的罢黜；而她的废黜又为1870—1871年德法战争提供借口，而且最终使西班牙共和国的首

^① 托莱多·霍阿娜（1479—1555年），1496年同哈布斯堡家族的菲利普·德尔·舍纳结婚，1504年继其母出任卡斯蒂利亚女王，直到逝世。霍阿娜在菲利普·德尔·舍纳死后，精神失常，故称为疯子霍阿娜。——译者

次尝试——很快就失败——成为可能。伊莎贝拉的孙子阿方索十三世允许独裁者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结束了为期十年的民主，从长远看，这又有利于共和党人的努力。1931年，阿方索十三世宁愿下野，不愿冒一次内战的风险。后来，他让他的前将军和朝臣们料理内战事务，而自己不加参与。除了性格倔强的怪物斐迪南七世(1808—1833年)外，也还有过一位波旁家族的好国王查理三世(1759—1788年)。而正是那位也许是波旁家族最有才智、并有权登上西班牙王座的唐·胡安·封·波旁—巴滕贝格未能成为国王。不适合当“上帝恩赐的领袖”，是因为他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1931年4月共和国诞生时，西班牙人兴高采烈，欢欣鼓舞，把新国家形式当作“美丽的姑娘”加以庆祝。当时，他们当中谁也不会相信，四十多年以后，他们会成为一个国王的黎民，不会相信，正是被他们驱逐出境的那位阿方索十三世的一个孙子，作为西班牙的统治者，搬进东方广场上华丽的王宫。君主政体绝不是受欢迎的；而是被漠然地接受了。1947年，佛朗哥进行一次“民意测验”；西班牙人“被说服”，赞同重新把他们的国家变为一个王国的计划。这次国民表决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秘密的，票数的统计是极其草率的。将近三十年之久，西班牙一直是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而且几乎没有君主政体派。

胡安·卡洛斯王子登基以后，信仰笃诚的君主政体分子不太多了，尽管胡安·卡洛斯没有很多好斗的敌人，从前，人们对他和君主政体制度漠不关心，有人认为，同顽固的老将军比较，现代化的年轻国王要好一些，两害相权取其轻。同时，胡安·卡洛斯近几年赢得了相当多的同情，普遍认为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但是，在他就任国王几个月之后，年纪较大的西班牙人还颇为熟悉的口号，又响彻几座大城市的街头——“打倒君主制度！”王子胡安·卡洛斯关于自由的言论，曾经唤起人们的巨大希望；而国王胡

安·卡洛斯一世的首批决定，却使他们感到失望。胡安·卡洛斯不能或不愿意把自由派的政治家，放在最重要的职位上。如果他遴选那些赞同他的——至少从前是如此——政治观念的人来执政，那么他的“统治多于执政”的格言，将会得到更广泛的赞同。因为这些观念比阿里亚斯和费尔南德斯·米兰达一类人的政治思想更加符合西班牙人民的意志，这两人被国王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西班牙国王作为国家元首，不拥有独裁者佛朗哥作为国家元首所拥有的权限。比如，胡安·卡洛斯不能在议会和政府的参与下颁布法律——也不能自由地选择他的接班人。佛朗哥却能这样干，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干。例如，这位“领袖”能够独断独行地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指令。但是，西班牙国王比欧洲立宪制的君主拥有大得多的权力：他不仅有“最高行政权”（宪法法令组织法第6条），“也通过部长会议执掌王国政务”（组织法第13条第1款）。因为政府不对议会——等级议院，而仅仅对国王负责，所以，如果它不同意国王的某一项决定，它就必须下野。国王也是三军的最高司令。当然，他的权限受“王国委员会”的限制——这个班子在佛朗哥统治下没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只起执行助手的作用，然而，它在君主政体下却利用自己很大的权力。王国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数由佛朗哥直接或间接任命。组成君主政体第一届王国委员会的成员，多数是反民主的极右派。佛朗哥政权给君主政体制度留下的政治立法，有一部分是矛盾的，而且相当混乱；不过，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目的是通过无数的法律限制和障碍，从内部给政权的民主化制造困难，如果不能完全阻止的话。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是波旁王朝的成员，然而也是独夫民贼佛朗哥的继承人。他发现自己陷入西班牙的巨大混乱之中——而且他也是很多西班牙人的没有把握的希望。胡安·卡洛斯·封·波旁—波旁，长期很严肃地为国王的“职业”做过准备。聪明的王储唐·

胡安的这个儿子，在罗马出生，在葡萄牙长大，十一岁时第一次到西班牙。他在圣塞瓦斯蒂安为高中毕业考试作准备，然后就学于各种不同的军事学院，最后在马德里大学哲学系和法律系听几门课的讲座。1963年，他和索菲亚公主结婚。她是希腊国王保罗一世的女儿，后来的匆匆而过的国王康斯坦丁的妹妹。他在政府各部见习过，听过无数私人教师的课。他父亲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他忤逆父志，接受弗朗哥让他当国王的建议，这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作为王子，他在多次出国旅行中已经正式代表他的国家，并且竭力给人留下他有民主思想的印象。他经常在西班牙各省旅行，这使他更加为人知晓。国王在军人中尤其感到怡然自乐，他的造诣主要在军事方面——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他达到了监护人弗朗哥所希望的成就。他的业余爱好，与其说在知识方面，不如说在体育运动方面。这位西班牙国王很快就赢得同情，尤其在普通人之中。他的举止十分自然，言谈话语给人一种开诚布公的印象。这正是西班牙人的本色，因而也特别受到西班牙人的好评。他不高高在上，趾高气扬，或故作自信。西班牙波旁家族最后几代人的明显特点是忧伤严肃，这也能在胡安·卡洛斯身上找到。遗传病和悲剧性事故等“波旁家族的命运”，也没有放过他家族中的近亲：国王的两个姐妹之一玛加丽塔公主是天生的瞎子；1956年，两位年轻的王子在玩手枪时，手枪走火，一弹打死了他的唯一的兄弟阿方索。

人们满有理由表示怀疑，经过半个世纪之后，由胡安·卡洛斯重新开始的君主制度实际上能否长久。胡安·卡洛斯可能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渡性国王，这对他来说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费利佩王子降生于1968年，他应该作为菲利普七世，继承胡安·卡洛斯一世国王的王位。但也可能是一个共和国，或一个极右的上校们的政权。犹如在西班牙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在新的君主政体下，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产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四、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 ——十全十美的政府官员

西班牙政府首脑卡雷罗·布兰科遭到行刺一命呜呼，卡雷罗内阁的内务部长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被佛朗哥任命为继任人，这大大地出乎西班牙人的意料。不到两年，佛朗哥死后，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重申对卡洛斯·阿里亚斯总理的任职，这又是一个出人意料。如果阿里亚斯在政府首脑五年任期行将结束时下台的话，几乎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意外。

阿里亚斯在1976年初自诩为“典型保守派”；事实上，他始终没有形成明显而可以捉摸的政治意识，基本的政治思想很贫乏。他是政治干部阶级的一位杰出代表。佛朗哥主义造就了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在佛朗哥政权中又起过巨大作用。阿里亚斯的一位部长这样评价他：“一位聪明的、处理政府事物十分精明的政治家，然而是一个没有政治幻想和没有深远想象力的人。”阿里亚斯一直是佛朗哥主义者，但也仅仅如此而已。他感到自己不受这个政权的无数势力集团的任何约束，而且被看成是廉洁奉公的。他聪明智慧，知人善任，与他的同事们开始实行一项小心谨慎的改良政策。他所敬重的佛朗哥不接受这项由内部开始的改革，这几乎成为他的一个创伤，使他不安起来。他起初反抗，企图挽救他的“开放政策”，然而终于放弃这种打算，同他那些更主张自由的同事们分道扬镳。关于义务，他抱有佛朗哥主义观念，这使他未能自行引退。一个佛朗哥的仆人是不会引退的——他等待着“感谢他的效劳”，即一直等到他被解职。卡洛斯·阿里亚斯内战之后当过军

事法官，长期当过西班牙的最高警察首脑，出任过佛朗哥的内务部长和总理，他总是正确地履行他的义务。在最后几年里，如果由他个人作主的话，他也许不会同意处决任何一个人，但是，在“上峰”认为处死刑是正确的之后，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也不可能认为是错误的。1908年，阿里亚斯出生在马德里老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曾是西班牙首都的一位好市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发扬主动精神，具有首创思想；他当马德里市长时颇孚众望。

根据法律规定，西班牙总理领导他的国家的政治。他不对议会负责，而仅仅对国家元首负责，国家元首在“王国委员会”的同意下，有权罢免总理。只要佛朗哥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实际权限就相当小。在一个“执政少于统治”的国王下，这个职位的重要性增加了。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也许不会成为西班牙民主化的重大障碍——但是，也不能期待他会提出改变政治结构的建议和倡议。

五、拥有二百个政党的国家 ——西班牙的政治派别

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领导着第一届君主政体政府。当几乎全部的政府成员说出他们如何设想未来的西班牙之后，总理也宣布自己的意见。阿里亚斯是独裁者佛朗哥的最后—任政府首脑，又是胡安·卡洛斯国王的第一任政府首脑。他对一家美国杂志说，1977年年底，西班牙将会有四至五个政党。几天之后，总理本人不得不自己出面更正：他指的不是政党，而是团体。几个在佛朗哥统治下、在巨大的“国民运动”内部被允许建立起来的所谓“政治协会”对此提出了抗议。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些协会终究也是根据这位阿里亚斯的建议成立的，他当时还是佛朗哥的总理。佛朗哥曾多次声明，西班牙将“永远不再”会有政党。1969年，国民运动委员会已经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一个关于未来政治协会的章程。几个月之后，同样这个全国委员会不得不重新收回这个章程。看来是上面命令它这样做的，这次又是得到大多数通过。国家元首佛朗哥拒绝签署这个章程，因为没有人能够向他解释政治协会与政党的区别。大元帅不无道理地揣想，计划的协会终将会成为类似他所憎恶的政党。

几年以后，阿里亚斯终于能够使—项协会章程付诸表决。但1974年允许建立的政治协会，不得不信仰佛朗哥主义，屈从严厉的控制。除了极少数例外：民主主义的政治家们，拒绝按佛朗哥和“国民运动委员会”所批准的模式组织协会。独裁者死后不久，几周前还被誉为未来政治家的训练班与仓库协会，就几乎不再起什

么作用了。“费迪萨”小组——政治研究股份公司——为王朝的第一届政府提供了最多的部长。“费迪萨”是由那些拒绝建立意识形态上受控制的协会的政治家创建的。

当波旁家族的胡安·卡洛斯王子接替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时，几个协会已被批准，另一些还在征集必需的二万五千人的签名；再有一些放弃了，因为它们的发起人满有理由地估计到，佛朗哥的寿终正寝也是政治协会的终结。

随着君主政体的开始，西班牙的政治呈显出一副五彩缤纷的景色。各种协会，地下党派（有几个已被容许），政治俱乐部，一个官方的工会和几个被禁止的工会，意识形态小组，尤其是极左派和激进右派的许许多多分裂小组，互相并存，杂乱无章。非法状态促进分裂。它们处于地下状态，当然无法证实其党员人数或追随者人数，因此也不能要求提供数字。因此任何一个政党都同别的政党一样具有同等代表性。既然处于地下，各党就不必达成政治实践的妥协，它们喜欢在意识形态上斤斤计较，因而往往变得吹毛求疵，引起分裂。政治实践，选举，联合和结成利益同盟，将会使很多分裂的派别重新聚拢在一块，使另外一些派别消失无踪。1976年初，在西班牙总共大约有二百个政治团体；诚然，其中有许多只是纯地方性的。

在佛朗哥统治下，极右的团体本来也是非法的，然而实际上，它们不仅拥有一切权利，而且还有特权。它们和政治警察紧密勾结，而且往往接受了平行警察的职能，在巴斯克地区尤其如此。象“基督王之战士”这类极右的武斗团体，总有一些积极分子是政治警察的成员。左派游行者亲身体会过，那些自称为“基督王之战士”或愤怒的观众如何袭击他们，在他们被捕后，又受到同一些人的审讯。公共秩序的热心卫道士们，一方面行使他们的“基督王之战士”的职能，然后又操起他们的主要职业，行使政治警察的职能。

“基督王之战士”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而是一种进行暴力行动的松散组合。马利亚诺·桑切斯·科维萨自诩为他们的领袖，他是一个饱经政治风霜的老长枪党人。最辛勤的积极分子之一是安赫尔·谢拉，几年前，他是派到左派组织“联合国科教文之友俱乐部”的警察密探，并且被揭发了。后来他被捕，借口是他破坏了展出的毕加索的珍贵原作。他很快又被释放，之后，有一段时间同一个部的情报间谍处合作。

极右派方面的政治团体有：“西班牙全国工团主义党”，“西班牙社会运动”，“全国革命运动”，“西班牙全国工团主义阵线”，“工团主义行动小组”，“欧洲之友西班牙支部”，“新生力量小组”与同名杂志，以及“麦斯特拉斯戈兄弟会”。

新生力量小组的头头、马德里公证人布拉斯·皮尼亚尔，被佛朗哥任命为国民运动委员会的成员。他和他的杂志对所有右翼激进团体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风格泼辣明朗的周报《新生力量》，在军队中也有很多读者；它发行近五万份。很多右翼激进青年参加各种团体的工作。在加泰罗尼亚活动的工团主义行动小组，袭击、破坏或烧毁无数被看成进步的书店。弗拉加·伊里瓦尔内当内务部长之后，1976年1月，第一次逮捕工团主义行动小组的成员。在巴斯克地区，成立所谓“反巴斯克与自由党”，对抗巴斯克的暴力自治运动“巴斯克与自由党”。“反巴斯克与自由党”搞诛家灭族；它暗杀了巴斯克与自由党一个领导人的一位政治上不好斗的兄弟，并在法国的巴斯克地区进行暗杀活动。因为与这些暗杀有牵连，西班牙的武装便衣警察被他们的法国同事拘捕。因为一次联合抢劫银行，整个领导被审判，右翼激进组织“伊比利亚十字架”解体了。这些十分活跃而追随者很少的小组，公开标榜信仰法西斯主义。几个政治协会在思想上同它们相距不很远。这些协会不是好斗的，反民主的，就是至少对议会民主抱着强烈怀疑的。这些协会

是：“西班牙全国阵线”，“西班牙全国联盟”，“公众阵线”，和形式上温和一些的“全国当代问题研究会”。“西班牙真理联合会”由几个声誉令人怀疑的人领导，该会有一个纲领，它使人想起法国小资产阶级领袖布热德的纲领。

在同样是相当右的“西班牙人民联盟”里，铁杆的佛朗哥分子和专制制度的领导干部互相勾结，声称其目的是在独裁者死后，尽可能多地保存佛朗哥国家的思想与结构。西班牙人民联盟的领导人，是老长枪党人索利斯和善于随机应变的极右分子阿道弗·苏亚雷斯。这两人都是进入君主政体首届内阁的部长——一个当劳动部长，另一个当国民运动部长。同样，国王从另一个协会“西班牙民主联盟”选了两名部长。这个政治团体自称是基督教民主党，由佛朗哥的前部长费德里科·席尔瓦·穆尼奥斯和阿尔贝托·蒙雷亚尔·卢克领导。诚然，与其说席尔瓦·穆尼奥斯之流是民主党人，倒不如说他们是基督教徒更能令人信服。基督教民主党欧洲联盟起初不承认西班牙民主联盟。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同盟，是决心大力支持席尔瓦·穆尼奥斯小组的第一个基督教民主党。正如西班牙民主联盟可算作西班牙的大的基督教民主党的右翼一样，“西班牙社会改良”协会可归入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人民党。但是，它在各个地下的社会党中，并未博得很多青睐。“西班牙社会改良”协会主席曼努埃尔·坎塔雷罗·德尔卡斯蒂略来自长枪党左翼，他诚心诚意地谋求从内部——从佛朗哥创建的制度的结构上——为在西班牙实现民主而斗争。相反，正是“西班牙民主联盟”的保守天主教徒，在佛朗哥的统治下，没有竭力争取国家民主化，虽然他们绝不是未来民主西班牙的敌人。按照长枪党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左翼长枪党组织“何塞—安东尼奥小组”，虽然一直严厉抨击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然而同时也接受了议会党派民主。它组织了自己的党，用了一个复杂的名字：“西班牙与全国工团进

攻联合会的长枪党”。这是长枪党在佛朗哥下令与传统的卡洛斯党人合并之前的旧名称。

政治俱乐部,政治研究股份公司和讨论小组,都想成为未来党派或哪怕是联合会的细胞,目的在于使其会员在政治前程上互相提携。这些组织大多数中间偏右,拒绝在结社法范围内同佛朗哥政权合作。“塔西陀”小组由于每周发表文章而闻名,文章从自由一保守立场出发,以小心而温和的腔调,批评佛朗哥政权的最引人注目的专制措施和暴行。塔西陀派的好几个成员成为国王第一届政府的国务秘书,另一些则是费迪萨的共同创始人。这届内阁还有两位最富于特色的部长也属于费迪萨:何塞·玛丽亚·德阿雷尔萨和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分别负责外交和内政。另一个政治俱乐部“戈察股份公司”也以谋求弗拉加这位政治家的支持作为主要任务。在巴塞罗那,中间派和中间偏右派聚集在“加泰罗尼亚俱乐部”里。由“利布拉俱乐部”产生的“民主党”,以司法部长的儿子华金·加里格斯·瓦尔克以及大学教授和新闻记者安东尼奥·丰丹为其首脑。“民主人民党”也想成为西欧式的自由党,它是出版家伊格纳西奥·卡穆尼亚斯创建的。长期以来,“西班牙君主政体派联盟”一直在为唐·胡安争取王位,他是西班牙波旁家族的头头,也是佛朗哥决定为国王的胡安·卡洛斯的父亲。这个联盟是君主政体团体中最自由的一个,它的领导人华金·萨特鲁斯特吉,尤其是海梅·米拉莱斯,长期同佛朗哥专制制度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1976年1月才成立的“自由民主联合会”,是好些较小的地方性自由协会的杂拌。还有无数基督教民主小组。“西班牙基督教民主联盟”,在佛朗哥统治时曾不甚合法,然而得到充分的宽容,那时它就已站稳脚跟,是一个小党,尽力争取乡村追随者。迄今为止,它的最有名的行动是在西班牙最小的省会索里亚举行一次党代会。这是最穷乡僻壤的省府。欧洲基督教民主党联盟承认

“欧洲基督教民主党联盟西班牙支部”为正式会员。它包括五个党——三个地方的和两个全西班牙的，其共同点是明确拒绝佛朗哥国家及其政治机构。三个地方团体中，数“巴斯克民族主义党”最强大。也许，在巴斯克地区选举时，它将永远赢得多数票。“加泰罗尼亚民主联盟”拥有公认的良好组织。在巴伦西亚地区，包括卡斯蒂利翁省、巴伦西亚省和阿利坎特省，基督教民主党人组成了一个“巴伦西亚地区民主联盟”。

第二共和国时代强大的右翼天主教政党“西班牙右翼自治联盟”的头头，组织了“民主人民联盟”。这个党大约代表那些自称为基督教民主党的各种派别的中间派。“民主左派”构成西班牙基督教民主党的左翼。它有一位闻名的领袖——教授和律师华金·鲁伊斯—希门尼斯，他在整个左派以及在大多数民主党的右派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民主左派”属于反对佛朗哥政权的两大反对党阵线之一的“民主论坛”。“论坛”于1975年6月11日成立，而“西班牙民主同盟”则于近一年前就已创建。属于“论坛”的最强大的组织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它是世界上最老的社会党之一，在内战爆发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党。它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在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右边的是“西班牙社会民主联盟”和由它分裂出来的“西班牙社会民主党”，它们在努力争取西班牙社会主义的极右派和左派自由党人。在“论坛”里，还有“卡洛斯党”，“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工人组织”的代表。卡洛斯党从前很右，现在属于民主左派。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工人组织是两个仅在巴斯克和纳瓦拉活动的强大的小组，成员多数信仰马列主义。革命工人组织原先是天主教牧师、尤其是耶稣教徒的机构，曾暂时脱离了“论坛”，因为它感到在佛朗哥逝世之后的几周里，“论坛”对待政府的态度过于宽容。

在“西班牙民主同盟”里，圣地亚哥·卡里略领导的“西班牙共产党”无疑是最强大的党，虽然这一点暂时还没有对同盟内领导职位的分配产生影响。属于同盟的还有“社会主义人民党”，党的首脑是很有威望和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铁尔诺·加尔班。1975年末，这个“社会主义人民党”，同一系列的地区性社会主义小组联合为“西班牙国内社会主义联盟”。在地区性的党中间，“安达卢西亚社会主义联盟”最为有名。地区性社会党领导人有阿莱杭德罗·罗哈斯·马科斯（安达卢西亚社会主义联盟）和“卡斯蒂利亚社会主义联盟”的何塞·比达尔·贝内伊托。“民主同盟”的成员还包括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律师，企业家——其中有拉斐尔·卡尔沃·塞雷尔和安东尼奥·加西亚—特雷维哈诺；前者是佛朗哥所禁止的《马德里报》的多数股份的占有者和“上帝事工派”的成员，后者是律师和商人。

“西班牙共产党”的左派中还有许多党，其中几个由于使用暴力手段而特别引人注目，然而另外一些近来明显地赢得了追随着。“西班牙共产主义红旗组织”是从共产党分裂出来的小组，它认为卡里略的路线太修正主义了。这个主要在加泰罗尼亚和安达卢西亚活动的“红旗组织”，近几年中又有一部分重新回到共产党里去。苏联对卡里略批评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感到恼火，一方面继续正式承认卡里略的党，同时又支持团结在内战时期的将军恩利克·利斯特尔周围的分裂小组“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爱德华多·加西亚和利斯特尔闹翻了，这个小组又进一步分裂。1968年由于对布拉格入侵的争论，这两人被卡里略开除出执委会。爱德华多·加西亚建立了自己的党，取名与利斯特尔的党相同。在流亡的老共产党人中，今天这两个小组的追随者已寥寥无几。爱德华多·加西亚住在巴黎，利斯特尔住在布拉格。莫斯科也看到，想通过利斯特尔创建一个依附于苏联党的西班牙共产党的企图已告失败。

从西班牙共产党的分裂中，也产生出若干马列主义小组，其中有几个至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的机构和政治家建立了暂时的联系，然而未从北京得到财政上的支持。1964年，从卡里略的党分离出一个小组，组成“西班牙共产党(马列)”。在意识形态上，这个党成为武装的“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的核心部队。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也吸收极左的、不属于西共(马列)的积极分子参加。在最近几年，有许多还很年轻的大学生和工人加入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他们原先属于其他左派政党，后来脱离了这些党，因为他们感到这些党无所作为，过于和平主义。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成为佛朗哥政权的手术室的藏龙卧虎之地，他们的思想形形色色，但是在争取用暴力手段反对独裁这一点上是一致的。1975年夏，流亡在巴黎的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的最高领导，指示它的国内行动小组杀害警察，至少有七个“民卫队”和“警卫队”(城市警备队)的队员，被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的成员不加选择地杀害。这些牺牲者没有一个是政治警察。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企图用佛朗哥统治下西班牙处于内战状态这个很难站得住脚的论点，来为不加选择杀害警察辩解。照此类推，那末所有的警察都应该被看作为一支敌军的成员。9月，八位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的成员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其中三人9月27日凌晨在马德里附近处决。按照法治国家观点，这些审判案不是无懈可击的。

1967年，对党的领导不满的西班牙共产党党员，成立了“西班牙国际共产党”。后来又改名为“西班牙劳动党”。“劳动党”也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在反独裁的斗争中不诉诸暴力。它在佛朗哥逝世前半年特别活跃而引人注目。它的党员显示出极大的勇气，相应地被捕的数字也很高。在民主同盟内，西班牙劳动党与卡里略的共产党密切合作；它在一些工人区里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大学和文科中学里。1975—1976年，巴利阿多里德大学的多数

学生都是该党的拥护者。一个较小的马列主义党是“新西班牙共产党”，它从前自称为“西班牙马列主义组织”。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部分马列主义党革命工人组织和西班牙共产主义联盟，主要活跃在巴斯克地区，后一个党由巴斯克的自治组织巴斯克与自由党的一部分产生，由于取名“共产党人”而闻名。1976年1月罢工时，它在马德里也显示出很有影响。同样，在这些罢工中，“共产主义左派”第一次起了作用；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小组，它在意识形态上还动摇于马列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之间。

象“革命工人党”一类托洛茨基派别，提不提无关紧要。“革命共产主义同盟”是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会员，它同巴斯克与自由党（第六次大会）合并为“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巴斯克与自由党（六大）”。

无政府主义已大大地失去了它在西班牙所具有的传统作用。在“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同盟”的大运动中，仅仅只留下了少数几个地方小组，而且大多数成员是在国外流亡的西班牙人“革命行动国际小组”与欧洲无政府主义暴力小组有联系，有几次绑架是由它们策划进行的。“武装斗争组织”和“伊比利亚解放运动”只在加泰罗尼亚活动。1974年3月，在逮捕伊比利亚解放运动的一个成员萨尔瓦多·普伊格·安蒂奇时，他开枪射击，杀死了一个政治警察，后来被用“丑恶的绞架”处死。

在加泰罗尼亚，由从前的“加泰罗尼亚工人阵线”产生的分裂小组和讨论小组，着重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上对大学生和青年工人施加影响，例如“做什么？”小组，或“真纛工人”小组，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工人小组”和“共产主义工人小组”。较小的左派小组数目甚多，政治警察能够轻易地暂时搜捕其中几个小组入狱。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组织得很糟糕，它的几个地方小组也被搜捕入狱。这样一来，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肇事后，可疑的肇事者往往很快就

被捉拿归案。1976年2月，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的很多省小组，处于瓦解状态。

极左派强大的思想影响也表现在某些所谓“民族主义”组织中，它们在各个不同的地区致力于自治，一部分也主张同西班牙国家完全分离。这些组织中最有名的是“巴斯克与自由党”，它的分离主义和暴力的派别自称为“第五次大会”〔巴斯克与自由党(五大)〕。在加利西亚，有“加利西亚人民联盟”，在加泰罗尼亚，有“加泰罗尼亚解放阵线”和“加泰罗尼亚地区民族解放社会党”的所谓“临时之翼”。除了加泰罗尼亚外，加泰罗尼亚地区民族解放社会党也在其他加泰罗尼亚语省份存在。

律师和大学讲师库维略，在阿尔及尔为“加那利群岛自治与独立运动”进行热烈的广播宣传。然而迄今为止，库维略在加那利群岛还未找到很多的追随者。

佛朗哥政权一开始就反对一切自治努力，甚至长期压制某些地区语言和文化。象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这样一些地区的自治运动，便同政治反对派进行合作。佛朗哥对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尤其不信任，因为他们大多数曾经站在共和国的一边战斗过。事实上，所有反对派团体也都因此表示，要给有自己文化和语言传统的地区以自决权；在加利西亚，在巴斯克各省和加泰罗尼亚语地区，许多政党都冠有自治团体的名称。在这些地区也形成了反对党阵线，其组织成分不同于全西班牙性质的协会“联盟”和“论坛”。在加泰罗尼亚，巴伦西亚和加利西亚，有些政党——好几个社会党——完全独立于全西班牙性的具有相同思想和方向的政党，其中有若干小组参加了“伊比利亚社会主义会议”。

1971年秋，在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很多反对派小组成立第一个最重要的地区性组织“民主大会”。1976年1月，成立“加泰罗尼亚政治势力代表会”。参加“代表会”的只有纯粹的加泰罗

尼亚政党。此外，参加“民主大会”的也有几个全西班牙性的派别。“代表会”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转变为加泰罗尼亚的临时自治政府。

纯粹的加泰罗尼亚政党有：自由党中间派小组“加泰罗尼亚民主左派”和“加泰罗尼亚共和左派”。在这两个党里，右翼自由派相当强大，尽管名称上冠有“左”字。“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被看作是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组织，其路线与意大利南尼的社会党人的路线大致相同；而“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与民主大会”则执行一条较右的社会民主党路线。这些小组在加泰罗尼亚享有盛名的政治领导人是：拉蒙·特里亚斯·法尔加斯教授（加泰罗尼亚民主左派），老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代自治政府领导下的加泰罗尼亚最高法院院长何塞普·安德鲁·阿维略（加泰罗尼亚共和左派），左派社会党人何安·拉文托斯（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和颇孚众望的何塞普·帕利亚奇（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与民主大会）。

佛朗哥死后，加泰罗尼亚“代表会”同早已被人遗忘的、生活在一个法国小村庄的“将军团”——共和国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主席接触。内战以来的漫长岁月里，巴斯克人一直意识到他们的流亡政府的存在。这个设在法国巴斯克地区的政府，主要由基督教民主党性质的“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代表领导，得到“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及若干工会的支持。1975年末，在巴斯克人视为神圣的瓜尔尼卡榭树下，巴斯克地区一些追随者较少的政党：“巴斯克共产党”，“劳动党”和“社会主义人民党”，成立“巴斯克地区民主大会”。六十年代开始以来，社会革命自治组织“巴斯克与自由党”在巴斯克各省，主要是吸引了大量的青年，尤其是乡村青年。巴斯克与自由党一直以“暴力对付人”，即暗杀因政治活动而闻名的警察和“审讯专家”，大多数居民虽然拒绝这种方法，但是仍支持巴斯克与自由党党员，如果后者遭到警察迫害的话。

在巴伦西亚和加利西亚，也有好些地区性小组结成各种同盟。

除了政府控制的“西班牙工团组织”之外，最有影响和最积极的工会是“工人委员会”。在“工人委员会”里，大多数最有名的工人领袖是共产党人，或是接近“西班牙共产党”的人。除了亲共的小组外，还有一批来自天主教工人组织的工会活动家身居委员会的要职。“工人委员会”一再声称自己在党派政策上是中立的。老的社会主义工会“工人总同盟”，从前有一段时间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会，五十年代由于没有积极开展活动，追随者因而锐减。在北部工业区，在阿斯图里亚和巴斯克地区，“工人总同盟”还是最强大的，而且，在人事上也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紧密合作。巴斯克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者——当然是那些和政党没有密切联系的人——组成“巴斯克工人团结会”。社会主义的“工会工人联盟”，在西班牙很多地区开展工作。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全国工人联合会”，虽然依旧存在，但它的影响同内战前相比已经是微不足道了，那时它同“工人总同盟”竞争西班牙工会的第一把交椅。

这里提到的比较重要的政治团体就约有一百八十个，它们在佛朗哥死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依然存在。在各种政治势力耍弄自由民主的把戏中，大多数分裂小组将要消失，加入思想上接近的较大的党，解体，或者默默无闻。几乎所有这些团体都属于五大政治流派：

1. 佛朗哥分子：从赤裸裸的法西斯右翼激进派，大多数的政治协会，直至君主政体的第一届内阁中的右翼。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他们想保持佛朗哥国家的反民主结构。

2. 保守右派和中间偏右派：保守的和自由的政治家，他们在佛朗哥的长期统治下，根本没有在政权机构中干过，或者只是零星地参与过某些事。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首届内阁里的改良主义部长们，属于这一大集团，他们是“费迪萨”政治研究会的要员，大

多数是新成立的各种自由党的创建者。

3. 基督教民主党人：他们在西班牙要比诸如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同僚左得多——尤其是在社会政策问题上。

4. 社会党人：从以北欧和中欧为榜样的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直至有强烈马克思主义印记的左派社会主义者。

5. 共产党人：西班牙共产党和无数分裂小组，其中有些小组重新加入伊巴鲁丽和卡里略的党。

除了这些大的政治潮流外，还有其他一些团体和政党，不过，它们永远不会属于西班牙最强大的政治势力。

右翼激进派，佛朗哥分子，民主的敌人

“没有佛朗哥，就不会再有佛朗哥主义”，历史学家和政府政治家们在独裁者在世时就这样预言过。相反，老长枪党极右派的发言人何塞·安东尼奥·希龙却认为，佛朗哥主义将比佛朗哥寿命更长，还将持续几十年，如果不说几百年的话。在西班牙，极右派支配政权几乎达四十年之久。温和的保守政治家，由于他们比较了解现实，也经常被拉拢过去；但是，如果他们阐发并想落实他们自己的、不合极右派口味的政治观念，其结果要么被佛朗哥解职（如情报部长皮奥·卡瓦尼利亚斯），要么必须公开放弃他们原始的谨慎的自由化纲领（如阿里亚斯·纳瓦罗曾经多次干过的那样）。

在西班牙的报纸上，用了一个德语词“碉堡”来形容极右派和极端保守的政治家。“碉堡”一词使人回忆起柏林碉堡，阿道夫·希特勒曾在里面负隅顽抗，妄图挽救自己免于不可避免的灭亡。为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的地位与特权，抗拒外来的一切影响和可能的革新，“极端分子”居住在十分舒适的“碉堡”里，躲藏在有小洞的厚墙背后，这些小洞与其说是窗户，不如说是枪眼。无论如

何，西班牙报刊漫画家们就是这样看待这些碉堡的。在“碉堡”里，肯定也住着与世隔绝的浪漫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已经是些没有危险的永远属于昨天的人了。然而在大多数人身上，在意识形态的粉饰背后，隐藏着确定的经济利益和具体的政治利益。爱国主义、宗教，经常引证的“永恒的西班牙价值”，它们被用来捍卫可观的财富和对国家政治施加直接影响。“碉堡”里发号施令的人，很少出任政府的高官显职；但是，某些政府成员在被“碉堡”头目召见时，却心惊胆战。不少部长感到自己的命运取决于极右铁腕人物的恩惠或宠信。

属于“碉堡”的人，有大银行家，经济寡头，大部分大地主和十分富足的家族。其中之一就是奥里奥尔家族，他们一家人就出了三个“王国委员会”的委员——而且这事发生在从独裁向君主政体过渡的时刻，此时王国委员会参与决定国家最高职位的人选。在传统的、自给自足时代就强大起来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向欧洲开放的经济之间，进行着明显的竞争，这种竞争促使进行公开的权力斗争。现代经济领导人主张国家民主化，它将为他们开放通往欧洲的大门，即开放通往欧洲市场的大门。那些还以自给自足时代的果实和国家的高额补助为生的资本占有者，错过了机会，他们躺在他们迅速聚敛起来的巨额财富上，高枕无忧；现在，他们担心每一种改变，因此宁愿龟缩到“碉堡”的保护墙后面。在“碉堡”里面，经济利益与最保守的政治家和军人们对于任何变动常常是病态和恐惧反应密切相联。这些极端保守分子，往往成为他们自己宣传的牺牲品。这个政权长年累月地宣传，适应欧洲就等于毫无秩序和混乱不堪，等于放荡不羁和共产主义，他们正是这种宣传的牺牲品。正是在一些将军身上，这些观念和缅怀内战结束后时代的思旧症相联系着，那时军人在国家里是最受敬重、最有特权和最有影响的人物。在很多属中小资产阶级的年纪较大的西班牙人

中，人们也发现害怕任何变化。诸如“自由”、“民主”、“政党”一类名词，立即会引起他们对最后相当混乱的第二共和国（1931—1936年）和国内战争（1936—1939年）的回忆。四十和五十年代学校里的片面教育和对历史的解释，如同长期孤立于欧洲邻国之外一样，有助于形成一种十分紧张、恐惧和敌视革新的思想方法。这样一种思想是西班牙极右派的沃土。当然，同德国纳粹分子相反，西班牙极右派不是对外侵略，不想象使徒似的匆忙征服和感化其他国家，而是为了自卫而力争同其他国家隔绝开来。天真烂漫、信仰笃诚的佛朗哥追随者，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政治事态感到失望，感到遭到了损失，遭遇了不公正，或者感到受了骗上了当。他们的愤懑把许多理想主义的长枪党人投入“碉堡”的防御阵地。

在西班牙，也没有任何人想当极右派。这个政权的统一党长枪党自命为“革命的”。今天，老长枪党人何塞·安东尼奥·希龙是“碉堡”的象征，他还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悬而未决的革命”，谈论着经过四十年之后依然悬而未决的革命。现在公开的法西斯小组也佯装成既不右，也不左，而是高高地超脱于两者之上。的确，极右派在居民中得不到太多的反响。根据最可靠的、还在佛朗哥统治下就举行的民意测验，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的西班牙人，选举那些支持长枪党或国民运动的党派。但是，各种倾向的佛朗哥分子在国家机关中有很强大的代表性，超过平均水准。没有思想原则的职业政治家，出于机会主义的原因，同佛朗哥的政策同流合污，而现在没有任何人会否认他们信仰民主，他们也属于佛朗哥分子。

属于佛朗哥之后的佛朗哥主义的，有三大集团：

1. 一些分裂小组的铁杆佛朗哥分子，如“欧洲之友西班牙支部”，他们选择希特勒的国家作为效法的榜样，还有《新生力量》杂志周围的那些人。他们的最有名的代言人是马德里的公证人布拉斯·皮尼亚尔。

2. 何塞·安东尼奥·希龙周围的“老战士协会”会员和长枪党人。在军队等级制度的上层,在各部的中等官僚中,在国家工会组织里,以及在乡、省的政府机构里和遍布全国的“国民运动”地方办事处里,这个集团的势力十分强大。

3. 大多数政治协会的会员,从相当右的“全国当代问题研究协会”到十分反民主的“全国阵线”,都想成为佛朗哥政权政治家的收容所。君主政体的首届政府里,也有好几位成员来自这些团体,其中有何塞·索利斯·鲁伊斯。

布拉斯·皮尼亚尔——为了上帝、祖国和法西斯主义

“当布拉斯·皮尼亚尔讲话时,撒但就生气,暴跳如雷”,这位能言善辩的马德里公证人的一位热心的追随者这样说。皮尼亚尔的演说是讨人喜欢的政治闹剧,然而这位右翼激进派代言人更象载入政治民间传说的一位奇人。皮尼亚尔令人畏惧,并有一些在佛朗哥死后依然留任官场的追随者,这些人主要是拥有最富有危险性权力的军人,他们掌握着刀枪。诚实的阿尔弗雷多·桑切斯·贝莉亚还当部长时,曾公开声称过:“如果发生困难,我们大家都支持布拉斯·皮尼亚尔。”桑切斯·贝莉亚所指的“大家”即所有佛朗哥分子。皮尼亚尔一手通天,佛朗哥曾任命他为国民运动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因而也是议会的议员。多年来,他一直反对一切自由化尝试,哪怕是畏畏缩缩的自由化尝试。对他来说,除了共产主义和自由垮工团外,自由主义是西班牙最大的敌人。在他的几乎所有演讲里,他总是刻板地重复这句话:“战争尚未结束。”他指的是内战,他还一直把内战叫做“十字军征讨”,并要求他的追随者时刻准备着“继续进行十字军征讨”。当然,其他集团的长枪党人非难他,说他卑鄙狡猾地躲过战争中一切可能作战的机会(如在“蓝色师”里)。布拉斯·皮尼亚尔赞成重新施实新闻检查,把同外国接触,

看成是和传染病人接触，认为会对西班牙的传统价值和西班牙人的道德健康造成恶劣的后果。皮尼亚尔将不可能是长枪党的首领——他再也不能到处出头露面。但是，他的人员将会被任何一个佛朗哥主义的政党所征募。天主教会的极右翼声援皮尼亚尔，教会的代言人是冈卡的主教格拉·坎波斯（“我也是一个法西斯分子”）。格拉·坎波斯和布拉斯·皮尼亚尔受到形形色色右翼激进的牧师兄弟会的支持。这些协会把上一次梵蒂冈会议看成是魔鬼的事业。象“基督王之战士”之类抱有政治动机的武斗团体，把这位好斗的公证人看作他们的思想顾问。

何塞·安东尼奥·希龙——要上山的老战士

佛朗哥逝世前一年，六十三岁的瘸腿的老长枪党人和前部长何塞·安东尼奥·希龙宣布，必要时，他将要以安达卢西亚土匪为榜样，到山里去为真正的学说的纯洁性而奋斗，为佛朗哥政权的精髓而奋斗。在这之前不久，希龙被选为老战士协会主席。据称，协会的五十万会员忠于他。然而，希龙的好战意图几乎未使任何人不安：希龙也好，内战时代的老战士也好，都不是处于打游击战的年富力强之年，而且有大多数不愿同希龙的政治有任何瓜葛。

希龙的各营并不在打游击。他不必到山里去，他坐在“王国委员会”里，他熟谙各种深谋暗算，深知这个政权的肮脏污浊。为数很可观的各部官僚和军官，盲目地对他言听计从。他为某些大资本家所畏惧。在佛朗哥统治下，希龙能够推翻部长。他的最有名的牺牲者是阿里亚斯首届内阁的第一任情报部长：有自由思想的皮奥·卡瓦尼利亚斯。在所有政治家中，希龙得到独裁者的特别恩典和最大的同情——这个政权的官方历史学家里卡多·德拉奇埃巴在佛朗哥死后不久，在一次对报社谈话时证实了这一点。何塞·安东尼奥·希龙是这个政权的护民官；但是他在这期间的演说首

先招来的是摇头，当然也引起害怕与恐惧，然而几乎未能激起任何热情。不过，何塞·安东尼奥·希龙还一直用深沉的颤音发出不祥的威胁（“这个国家还将不断出事”）。他是一个巧言善辩的部长，竭尽蛊惑人心、拉拢群众之能事。希龙年轻时曾是长枪党老巢巴利阿多里德长枪党民兵首领之一。当时，在内战开始时，在巴利阿多里德及其周围，被杀害的共和党人特别多。1941年至1957年，希龙当劳工部长时，为工人们有更多的社会安全准备了好几项法律和规定。在官场混事的漫长岁月里，他发了大财，尤其是在科斯塔德尔索尔流域地区，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那里。有一个时期，希龙的讲话在少数工人中还有影响。然而他作为长枪党社会倾向的所谓代表，大多数西班牙人早就不相信他了。早在弗朗哥在世时，何塞·安东尼奥·希龙就已首先成为这个政权的反民主思想的象征性人物——对西班牙人民来说，他成为一切右翼激进派的蹩脚的“教父”。

何塞·索利斯·鲁伊斯——“政权的笑面虎”

在意识形态上，希龙和索利斯这两个长枪党人难解难分；在个人关系上，他们是好朋友。但是，在对公众的影响方面，在政治素质方面，善于随机应变的职业乐观派索利斯，同忧郁的民主恐慌者希龙有着天渊之别。索利斯感到最惬意的是被人叫做“政权的笑面虎”，这是他特别喜欢的一个绰号。至于为哪一个政权微笑，在他看来是不甚重要的。希龙属于弗朗哥主义的过去，他只能通过大幅度的右转，或者通过暴力政变，才能重新到达政权的最高层。索利斯是能够垮而复出的少数弗朗哥部长之一，在被解职六年之后，他重新被请到政府里去，而且也留任君主政体政府的大臣，这事引起普遍的惊愕。

这位1913年出生于安达卢西亚卡布拉的军事法官，虽然没有

任何民主倾向可言,但是,他甚至在那些打上最明显法西斯烙印的职权部门(国民运动和工会),身兼双重部长要职时,也善于在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中间,争取到一些个人朋友。何塞·索利斯并没有总是把佛朗哥的西班牙和他本人的真情实况告诉他的外国民主朋友——这有什么关系呢?索利斯的话从来就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总是矛盾百出,充其量只能象他自己所说的,是些怪话。他时而声称自己是坚定不移的社会党人,时而又说是最后的自由党人和——当他近乎诚实的时候——一个能伸能缩的长枪党人。犹如希龙一样,他也善于解释,说西班牙的制度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它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而正好是两者的对立面,或者要是愿意的话,说它是两者的幸运的综合。当然何塞·索利斯也不想和大多数人唱反调。而且,索利斯是最适合于在自身矛盾的“国民运动内部的协会”里大干一番的人物:如果允许的话,就使协会变成政党;如果当权派希望通过它们阻止政党的诞生,那末就照当权派希望的那样干。大多数协会的纲领,特别是那个最大的而且是索利斯参加首创的“西班牙人民联盟”的纲领,都是一些政治意向声明的大杂烩,光怪陆离,空洞无物,犹如何塞·索利斯部长的演讲一样。在西班牙人民联盟里,各种各样倾向的职业政治家聚集一堂:从右翼激进的“碉堡”派,直到那些欢迎从政权内部来一场小心谨慎变革的人。他们的共同之点是政治出身:佛朗哥政权和长枪党官僚机构的高官显贵。如果所有那些想尽可能多保留佛朗哥主义的集团联合一致的话,那么,何塞·索利斯·鲁伊斯是这些不同的佛朗哥主义派别联合的最合适的催化剂。

佛朗哥主义右派中也有几个政治上光彩夺目的人物。他们的前途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应变能力和机敏程度;佛朗哥死后被任命为议会议长的托尔夸托·费尔南德斯—米兰达就颇具这些素质。

托尔夸托·费尔南德斯—米兰达——国王的“老师”

卡雷罗·布兰科是所有西班牙民主党人最凶恶、最顽固的敌人。费尔南德斯—米兰达是卡雷罗领导下的政府副首脑，卡雷罗暴死之后，他正好当了一星期的政府首脑。当胡安·卡洛斯一世这位有民主意向的国王再次起用他时，费尔南德斯—米兰达已经是一位政治亡人。这位国家法教授，作为修辞艺术家颇孚盛名。他迂腐地咬文嚼字和诡诈地偷换概念，如同他专横跋扈一样，都是臭名昭著的。作为未来国王的私人教师，他赢得了他的好评。在君主政体开始的最初几个月里，阿里亚斯总理不得不处于这种境地，只有在议会议长和国王从前的私人教师在场时，他才能够同国王商议重大的政治问题。费尔南德斯—米兰达是一位很机灵的政治家，对国王来说是一个忠诚的顾问，同时又是一位得力的好帮手。在意识形态方面，他感到自由自在，不受束缚。“我感到，我对我过去的一切负有责任，然而我的过去使我不必承担任何义务”，他在就任议会议长时这样声明过——措辞含蓄，但意思清楚。费尔南德斯—米兰达这位机敏的教授，在他的青年时代，有一阵曾经是社会主义者；后来，他感到在“碉堡”里犹如在自己家里一样，怡然自得。从“碉堡”迅速转入民主，对他来说顶多是个时间问题，然而决不会是个良心问题。

比利亚比尔德侯爵克里斯托瓦尔·马丁内斯·

博尔迪乌——“女婿”

在极右派的民俗学范围内，有一个名叫克里斯托瓦尔·马丁内斯·博尔迪乌的人，多年企图扮演政治家的角色；尽管他的婚姻对他特别有利，但却一事无成。他是比利亚比尔德侯爵，是弗朗哥的唯一女婿。这位侯爵的职业是外科医生，并且由于一次移植心

脏使病人死亡而闻名。也许更多的是由于在夜总会的各种斗殴而闻名。为了这位暴躁的“女婿”的女伴而发生武斗，已经是家常便饭，虽然西班牙人随后就能在他们的报纸上读到，侯爵在夜里再次用他的拳头，来捍卫祖国的荣誉和他的泰山、国家元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名声。

比利亚比尔德总想钻进政界：“只要祖国要我合作，只要我被召唤——我随时准备着。”然而没有人召唤他。当他参加竞选医务界在议会的席位时，他的同行们选举了另一个人。他的岳父、“上帝恩赐的西班牙领袖”，对独生女的丈夫的政治野心不甚赏识：“我要送你一本书，一本墨索里尼传。如你所知，他下令枪决他那已经成为政治家的女婿齐亚诺伯爵。”但是，当佛朗哥卧病临终之际，比利亚比尔德还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作为三十人医疗小组的头头，他协调抢救佛朗哥生命的斗争，以可能的方式参与决定佛朗哥的死亡日期，直接同总理、政府和王国委员会会谈。如果想使西班牙成为民主国家的企图取得持久的成功，那么，比利亚比尔德之流的政治前途将不会是美好的。然而如果象反对派所担心的那样，君主政体是独裁的继续——即使是带着比较友善的面孔——或者甚至发生右派政变，那么，这位女婿纵然没有伟大的岳父，也会成为玩弄政治阴谋（他颇善于此道）的中心人物，而且也可能是政权机构的中心人物。

让比利亚比尔德侯爵之流当权的话，西班牙的政治将很可能具有小歌剧色彩，然而对西班牙和欧洲却是绝对危险的。因为在比利亚比尔德们的背后，站着希龙之辈。侯爵迄今为止的政治言谈，同极右报纸《新生力量》的冗长的文章十分相似。佛朗哥死前一年，比利亚比尔德和他的政治朋友们，就企图按照他们自己的观念建立政府。所谓“侯爵的内阁名单”，是一堆由大言不惭的激进右派、半破产的企业家和声名狼藉的新闻记者组成的大杂烩。侯

爵的长女和阿方索·封·波旁·达皮埃雷结婚，他是胡安·卡洛斯的堂兄弟，有一段时期也受极右派支持，同后来的国王竞争王位。阿方索象胡安·卡洛斯一样，是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由于同佛朗哥外孙女的婚姻不甚符合门当户对的原则，而丧失了争夺王位之权。

除了希龙和布拉斯·皮尼亚尔外，极右派里还有一批有钱和有权欲的人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人物；如奥里奥尔家族的成员，欧洲只有少数家族能够这样把巨额财富同巨大的政治权力合二为一。右翼极端分子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专家，诸如外交家、前部长和作家费尔南德斯·德拉莫拉；他们也有自己的将军，如加西亚·雷布尔就是纳粹协会“欧洲之友西班牙支部”的座上客，或如伊尼埃斯塔·卡诺，他在卡雷罗死的时候，曾经下达指示：“对准敌人的心窝开枪，不管在哪儿遇到他们。”他的这项指示几乎引起一场小政变，总参谋长很快撤销了他的指示。

“碉堡”的一大坚固支柱是“西班牙全国联盟”协会。右翼卡洛斯党的“传统主义者小组”的大多数成员属于这个协会。包括奥里奥尔家族在内的右翼卡洛斯党人在想些什么，1976年1月14日马德里《城堡》晚报上发表的一项宣言说得一清二楚。他们在宣言里声称，共产党人借助已经有强大马克思主义势力的天主教会正在征服西班牙，他们紧急告诫人们，警惕欧洲成为社会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把政党称为西班牙的废墟。大多数西班牙人乃至若干当权的高级政治家支持大赦政治犯和让流亡者回国的运动。而在奥里奥尔家族及其朋友们看来，这乃是“共产主义和自由垮工团反对西班牙的阴谋”。

怀着这种深奥莫测思想的人，在西班牙当权达数十年之久；他们还一直占据着相当大部分的权力。而且，至少在今后若干年内，对一个生机勃勃的、然而长期被禁锢在一种不合时尚的政治结构

里的人民的发展、进步和民主来说，他们是十分现实的危险，尤其是如果他们同索利斯周围的能伸能缩的佛朗哥分子相勾结的话。

平民化的右派

一位新闻记者炮制了“平民化的右派”一词，并使之在西班牙普及。某些在佛朗哥死后重新当权的西班牙政治家，必须大大地感谢这位善于创新的记者。如果有“平民化的右派”，那么，必然也有“未平民化的右派”。事实上，多年内，右派在西班牙的所作所为，主要是非平民化的。西班牙右派不夸耀自己。直到“平民化的”这一附加语出现之前，理智的右派避免自称右派。平民化的右派不穿长枪党的蓝衬衫，不行法西斯的右手致敬礼，尽量避免在外表上沾染佛朗哥国家最引人注目的特征。社会党人对他们来说是会谈与谈判对象。共产党人对他们来说也是务必与之争斗的敌人，然而却未必一开始就把他们投入监狱。他们想大胆尝试，从政权内部进行改革，却不想把反对派要求的“民主变革”作为必不可少的前提。他们认为，从长远打算，与其用严厉的专政，不如用民主自由和自由工会来防止左派夺权更好。他们得到西班牙现代化工业部门的支持，这是依赖同欧洲合作的新资本主义。在这支队伍里，有无数在美国和西欧造就的年轻经理人员。他们知道，西班牙工人既不再满足于希龙的蛊惑人心的口号，也不满足于某一个索利斯的娓娓动听的诺言，而是必须从大蛋糕中，分一块大一点的给他们。新闻自由和政治党派，吓不倒这些至少在原则上准备实行改革的开明保守派。

“改革”也是这些政治家津津乐道的词语，原则上他们同欧洲的保守分子或右翼自由党人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会使人想起那个被佛朗哥滥用的“制度内部的自由”的话，他们将会十分乐意谈

论“制度内部的改革”。今天平民化的右派的无数政治家，曾经在领导岗位上同佛朗哥合作共事过；有些曾经当过部长，不过在内阁里属于比较温和的一翼；另外一些人这几年抛弃了这个政权的政治，何塞·玛丽亚·德阿雷尔萨一马当先，他有一个时期甚至属于反对派，后来出任君主政体政府的首任外交大臣。各自由党的政治家们，大多数一直小心谨慎地同这个政权保持着距离。1975年7月，一批杰出的政治家成立“独立研究协会（股份公司）”（费迪萨），他们装着要研究政治，因为在国民运动之外是不许搞政治的。他们既不曾参加非法的反对党，也不曾在国民运动范围内组织被认可的协会。不过，费迪萨的会员们迫不及待地搞政治，而且搞得很出色。因此，他们立即有四位部长和好几个国务秘书，进入佛朗哥死后的第一届政府，因而其代表份额比任何其他集团都大。

他们的代表实力也比各协会强；这些协会还是在佛朗哥统治下，应政府首脑阿里亚斯的请求成立的，它们起初以政权的正统论为依据，猛烈攻击费迪萨进行不道德的竞争。还有一个政治协会也属于平民化的右派：“西班牙民主联盟”；它的路线与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右翼大致相同。它的领袖是佛朗哥的前公众事务部长、保守的天主教徒费德里科·席尔瓦·穆尼奥斯；胡安·卡洛斯也从这个协会聘请农业大臣和宫廷事务大臣。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代表费迪萨的右派，虽然他本人认为自己是西班牙政治的中间派——双重意义的中间派。何塞·玛丽亚·德阿雷尔萨这位莫特里科伯爵，处于保守派和那些没有背上与佛朗哥政权同流合污臭名的自由党人之间。佛朗哥死后，金融家华金·加里格斯·瓦尔克和出版家伊格纳西奥·卡穆尼亚斯，立即建立各自的自由党；在加泰罗尼亚，在共和国时代很有影响的“共和党”又重新露面，共和国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何塞普·安德鲁·伊阿维略也同时成为它的头头。

平民化的右派一旦进入政府，他们就面临着一种风险：如果在同左派的争端中，他们采用同佛朗哥历届政府相同的手段，他们的民主形象将会很快被涂抹掉；如果所许诺的改革不能实现，他们就只有同极右派联合——这样一来，他们就再不是“平民化的”了。某些西班牙的民主主义者，看到新的比较温和的当权派和老佛朗哥分子之间只有很小的区别：“同样那些狗，只不过带上新的脖带”——安达卢西亚社会党人阿莱杭德罗·罗哈斯·马科斯是这样看的。

新的、现代右派，想通过“另外一条脖带”，来显得比老佛朗哥主义的右派突出。如果他们成功地使西班牙人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他们选举时的前景就不会太坏。西班牙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相当广泛的中产阶级；事实表明，这个中产阶级感到中右或中左党派最为亲近。

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

——专制的自由党人

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还是驻伦敦大使时，他加入了“费迪萨”，当时，这个政治股份公司的一些主席团成员，略带忧虑地以善意的嘲笑口吻说：“我们协会的一半成员，现在忙于遏止弗拉加，以防止费迪萨成为一个实行专制领导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政治家弗拉加实现其野心的俱乐部。”弗拉加的毅力和无穷创造力使很多西班牙人感到害怕：他的暴跳如雷与他当情报部长时对报纸和新闻记者的严厉惩罚，同样臭名远扬。当然，他废除了新闻预检，用他1966年颁布的新闻法取而代之，才使报纸有可能写出一些应该受到惩罚的东西。作为情报部首脑，他变得越来越专制，变得越来越不可一世。在电视屏幕上，他几乎每星期都以一种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可怕的千篇一律的形式，替佛朗哥政策的最

恶劣暴行进行辩护。1969年，他由于马特萨丑闻而失败，这不是因为他卷入了这个大诈骗丑事中，而是因为他允许报纸报导这一财政丑闻。弗拉加在内阁里的几个对手应对这一丑事负责。佛朗哥的少数几条坚定不移的原则之一是：政府的家丑不许公开张扬。为了再次强烈地显示这一点，“领袖”褒奖那些参与这一事件的同案犯，而惩罚那些揭露这一丑事的人。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弗拉加却从马特萨事件中捞到了好处；这一事件增强了他廉洁奉公的名声。在他被开除出内阁之后不久，弗拉加开始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特别抨击当时的副总理卡雷罗·布兰科海军上将的极右思想。弗拉加这位专断的部长，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一个自由党人，并且从此以后一直自称“中间政治人物”。佛朗哥在这类事件上是不开玩笑的，他半路上杀了出来。弗拉加因此又丧失了他剩下的几个政治职务。他看到，只要卡雷罗·布兰科还有发言权，他就没有政治机会了。他请求出任西班牙驻伦敦大使，以免长期在毫无成就的反对派中消耗自己。巴斯克与自由党杀害卡雷罗·布兰科海军上将之后，弗拉加·伊里瓦尔内重新活跃起来。他在许多西班牙城市作报告，在伦敦著书立说，论述现实的政治问题。转眼间，弗拉加成为西班牙最有名的政治家。阿里亚斯想说服他组织一个协会。弗拉加把自由选举和宪法改革作为他领导的协会的纲领要点。对此，佛朗哥说出了意料之中的“不”字；毫无影响的政府首脑阿里亚斯把独裁者的否决通知了弗拉加。

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从小就不得不进行艰苦的劳动。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生于西班牙最贫穷的省份之一加利西亚的卢哥。他父亲不得不到卡斯蒂利亚去当季节工，后来不得不象成千上万的贫苦的加利西亚人一样，流浪到古巴。他在那里同一个法国巴斯克人结婚，挣得一些钱财，返回他的家乡比利亚尔瓦。他有许多孩子，其中之一是1922年降生的曼努埃尔。曼努

埃尔学过法律，经济学和国家学，上过外交学校。当他才二十六岁就争取到一个国家法的教席时，他的老乡们就知道，“老弗拉加的儿子曼诺洛”不久就要当部长。今天，曼诺洛·弗拉加可以从他父母朴素房子的窗口，观看他的青铜半身塑像，这是比利亚尔瓦的农民和市民为了纪念他，在这个地方的主要大街上建立的。比利亚尔瓦的居民们为他们村庄里的这位聪明小伙子的成就而高兴。大多数其他西班牙人，今天还总感到弗拉加有点讨厌；他的同学令人惊讶地琢磨，为什么他们莫名其妙地叫他“怪胎”。孜孜不倦的工作力和高度的聪明才智相结合，敏捷的理解力和强烈的野心相结合，几乎必然会使他迅速地爬上最高位。

在组织国王的第一届政府时，弗拉加下了很大的赌注，并且赢了。他的条件实际上都被接受。他还把另外三个费迪萨成员带进内阁，而且有一位是他个人的亲密朋友和他的一位内兄弟；而危险的竞争者、“西班牙民主联盟”的领袖席尔瓦·穆尼奥斯不得不呆在外面。他得到德阿雷尔萨和加里格斯·迪亚斯—加尼亚瓦特两位部长的支持，首先命令警察不要采取太强硬的行动。因此，人们可以举行几次游行，而参加者没有立即被捕。但是，1月中旬罢工浪潮扩展时，弗拉加也采取了强硬的手段。从新的弗拉加口中，又能听到一些使人想起老的弗拉加的话语：“街道是我的”，内务部长弗拉加·伊里瓦尔内对一个要求游行示威自由的委员会这样说。“民主主义者的脑瓜，法西斯分子的驱体”，他的一个同事给他下了这样的定义。对许多西班牙人来说，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依然是一个谜——解开这个谜，就能对西班牙的前途作一些预言。因为佛朗哥死后，弗拉加一马当先，成为西班牙的铁腕人物。

在全国各地，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影响的集团支持弗拉加。军人仍然是西班牙的实权派，在他们中，他比其他任何一位文职政治

家享有更多的威望。的确，他开诚布公，心直口快，与他完全不同的加利西亚同乡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永远不会原谅他的这些性格。在佛朗哥的奴颜婢膝的部长圈里，弗拉加是唯一敢于当面同“上帝恩赐的领袖”大吵大嚷的人。他的“请您住口，我的将军”，使整个内阁吓得打颤。据说，狡黠的小心谨慎和乐于搞阴谋诡计是加利西亚人共有的特性，对政治家职业来说这些特性是很有用处的，但是弗拉加却根本没有。在西班牙，用阴谋诡计进行统治的时间太长了。弗拉加的最突出的特点——基本政治思想明朗，有勇气和有毅力——肯定是他的国家的政治十分迫切需要的。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的新的自由信仰还有待证明；他在佛朗哥死后的艰难时刻，接受内务与警察部之职，这就证明了他的勇气。他的政治纲领已经在独裁者逝世之前几个月就提出来了，并在报刊文章里同所有对此感兴趣的西班牙人见面。纲领的最重要之点——自由选举，司法独立，社会市场经济，一定限度内参与决定的权利——同西欧各自由—保守党派的纲领是一致的。

何塞·玛丽亚·德阿雷尔萨——对外政策上的一位开明的自由党人

在11月阴沉沉的三天里，莫特里科伯爵何塞·玛丽亚·德阿雷尔萨可以感到自己是君主政体的首届政府首脑。国王决定任命伯爵，但是极右派开始走出“碉堡”蠢动起来。一个旨在反对德阿雷尔萨的运动在幕后展开了。正统佛朗哥分子觉得莫特里科伯爵是一个危险的自由党人。正如全体西班牙极右分子的大师卡雷罗·布兰科海军上将经常说的那样，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样坏。胡安·卡洛斯让步了，他起用佛朗哥的最后—任政府首脑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做他的第一任首相。何塞·玛丽亚·德阿雷尔萨成为外交大臣。

德阿雷尔萨 1964 年退出这个政权的政治，有一个时期被看作是反佛朗哥的民主反对派的头头之一，这使“碉堡”感到他是十分可疑的。在此之前，他是佛朗哥派住布宜诺斯艾利斯、华盛顿和巴黎的大使，接着，他多年成为国王胡安·卡洛斯的父亲唐·胡安的最有影响的顾问；后来，胡安·卡洛斯对他越来越言听计从。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入，能象伯爵一样代表西班牙那部份有教养的、世故的和自由的贵族。他是君主政体政府的第一个宣布要实行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大臣。1974 年，德阿雷尔萨差点儿加入“民主联盟”，在他进入内阁前不久，他还宣布允许共产党存在。后来，他也接受他的政府的路线，立刻宣称卡里略的党是极权的，至少眼下对西班牙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用“至少眼下”这个限制词，使自己有别于他的内阁同僚，他们想使共产党人永远处于地下。德阿雷尔萨成为君主政体政府的外交大臣时，已经为民主做了一些事情。这对他作为大臣进行首批出国之行很有裨益。他在旅行时，到过欧洲共同体各国的首都。多年以来，西班牙一直在努力谋求参加欧洲共同体。佛朗哥粗暴拒绝使他国家的政治结构适应欧洲民主国家的政治结构，这妨碍了加入共同体，甚至妨碍了和它联合。德阿雷尔萨并不否认政治困难——这同他的前任们正好相反，他们想把西班牙经常在布鲁塞尔失败的原因，向他们的人民解释为欧洲共同体国家的所谓经济嫉妒。莫特里科伯爵现在是乐观的。“最大的障碍存在于政治领域。我相信，君主政体政府走上通往民主社会的道路，以及在现时宪法法令范围内继续发展代议机构的坚定决心，将足以保证这一政治进程不会持续太久。也许两年足矣。”到那时，西班牙的经济可能已准备就绪，能够在欧洲共同体内部更好地进行竞争。

西班牙也想进入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尽管美国一再催促，很多北约国家还是一直反对。成为北约的成员，将使西班牙承担义

务，这会大大地增加军费开支；然而，军队领导期待，一旦加入北约防务联盟，对培养军官和士兵将得到很大的好处。比较年轻的军官，对于同其他西方国家的伙伴们进行交流和更多的联合演习感兴趣。在葡萄牙经历了动荡和难以逆料的发展之后，西班牙在战略上对北约变得更为重要了。

自从推翻凯塔诺政权以来，同葡萄牙的关系没有引人注目的恶化。里斯本成为西班牙政权的对手们的巢穴，西班牙政府忍让求全。1975年9月，在一次反处决的抗议行动中，西班牙驻里斯本的大使馆遭到彻底的破坏，对此，葡萄牙政府提供了种种方便。西班牙政府对待革命的葡萄牙的态度十分正确；诚然，发生过无数次惨杀在葡萄牙访问的西班牙人或外国人的事件，而大多数事件却是西班牙边防警察擅自干的。西班牙努力谋求同它在伊比利亚—亚美利加昔日的殖民地建立特别良好的关系。墨西哥从来不承认佛朗哥，而一直承认第二共和国的流亡政府。即使跟墨西哥，也有无数的非外交的接触和很多密切的私人联系。为了保持同卡斯特的古巴的外交和经济关系，马德里冒着同华盛顿发生冲突的危险。美国海军舰队甚至射击西班牙船只，因为它们没有遵守华盛顿对古巴实行封锁的规定。1974年，古巴是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最大贸易主顾。西班牙人在过去的殖民地——特别是在古巴，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很受居民的爱戴。作为人民——完全撇开他们的政权，西班牙人在美洲操相同语言和有亲缘文化的国家里，享有良好的声誉，这是在更新了的外交政策范围内实现紧密合作的有用基础。

重新调整西班牙的外交政策，也含括调整同美国的关系。在佛朗哥独裁时期，华盛顿是西班牙唯一的真正同盟者；美国人的地位相应地是强大的。象德阿雷尔萨这样的政治家们，虽然不想脱离同美国的同盟，但却想通过与西欧国家的密切合作作为补充，以

此来略为遏制一下美国的占统治地位的影响。在关于延长军事基地协议的最后几次定期谈判时，西班牙人就已经表明了这种自觉的态度。照官方的说法，美国在西班牙四个军事基地上有使用权，它们是：马德里附近的托雷洪空军基地，塞维利亚附近的莫隆空军基地和萨拉戈萨空军基地，以及西班牙大西洋沿岸南端罗塔海军基地。实际上，这里所谈的是纯属美国的军事基地。直布罗陀问题在宣传上被佛朗哥政权利用了。为西班牙夺回直布罗陀是佛朗哥政策中唯一的所有西班牙人都赞同的目标，即使他们从未准备为此付出巨大的牺牲，乃至冒一次战争风险。任何一届西班牙政府，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都将要求收回直布罗陀。英国人最重要的论点之一是：不能把习惯于民主制度的直布罗陀居民，交给一个独裁制度。然而，面对一个民主的西班牙，就不能再援用这一论点了。

在北非摩洛哥的海岸上，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个城市的居民大多数是西班牙人。几个世纪以来，这两座城市处于西班牙占领之下，有一段时间一直用来放逐犯人——因而被叫做“监狱”。这两座城市从来不属于1956年西班牙撤出的西属摩洛哥保护地。西班牙违背撒哈拉居民的意志，把从前西属撒哈拉殖民地的最大和最重要的部份交给摩洛哥人之后，摩洛哥人起初曾经收回对这两座城市要求的权利。但是，尽管有种种娓娓动听的友谊誓言，马德里同摩洛哥王国的关系依然是紧张的，犹如本世纪开始以来两国关系一直是紧张的一样。佛朗哥的西班牙，没有推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大多数外交部长——马丁·阿尔塔霍，德卡斯铁利亚，洛佩斯—布拉沃——是这个政权最自由派的政治家；他们在出国访问时，能够相当出色地代表这个政权的比较友好的方面。所有这些人当中，最好的肯定是何塞·玛丽亚·德阿雷尔萨，这位莫特里科伯爵在他任职之初，就不怕难为情地贩卖一种还根本没有的商

品，西班牙的新民主。

马塞利诺·奥雷哈，早年得志的 天主教徒与自由党人

德阿雷尔萨请了一位年轻的巴斯克政治家来当国务秘书，此人就是马塞利诺·奥雷哈·阿吉雷，把“平民化的右派”这张标签贴到他身上，犹如贴到伯爵本人身上一样合适。奥雷哈是“塔西陀”和“费迪萨”小组的领导人之一。在“全国天主教宣传协会”的主席团里，他也占有一席。他是一位在共和国时代被杀害的保守政治家的儿子，他坚决主张所有西班牙人和解的政策。在“国民运动委员会”里，他代表西班牙最富有而且同时是最反对佛朗哥主义的省份吉普斯夸，他是少数敢于经常投反对票的强悍人物之一。奥雷哈个人非常富有，但在社会政策方面，他却具有现代的、进步的和现实主义的观点。

皮奥·卡瓦尼利亚斯——对专制制度来 说太聪明而且也太可惜的人

1935年出生的马塞利诺·奥雷哈作为一个中间偏右的政治家，具有美好的前程。皮奥·卡瓦尼利亚斯比他大十二岁，奥雷哈是卡瓦尼利亚斯的国务秘书，在解除卡瓦尼利亚斯职业时，他同部长的几乎全部同事一样，辞职抗议。如果国王真的一心一意地实践通向民主的路线的话，皮奥·卡瓦尼利亚斯在君主政体的首届政府里，就会有一个位置。卡瓦尼利亚斯只当了近十个月的情报部首脑，就成为“极端派”最深恶痛绝的人。随着他在1974年10月被解职，阿里亚斯总理预先想得天花乱坠的开放政策即告结束。卡瓦尼利亚斯在这个政权中，担任过一系列要职，却没有十分献丑。他在有关佛朗哥的言论中总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佛朗哥逝

世前半年，他比德阿雷尔萨更为明确地公开要求独裁者下台。皮奥·卡瓦尼利亚斯出生于庞特维德拉，西班牙民间传说认为，所有最狡猾的加利西亚人都出生在那里。他是佛朗哥政权造就的所有政治家中最聪明的，不仅他的朋友们持这种看法。在这个政权很多变成自由党人的政治家中，卡瓦尼利亚斯是最可信的一个。此外，他来自一个左派自由党人家庭；他叔父是流亡诗人拉蒙·卡瓦尼利亚斯，写过反对佛朗哥独裁的辛辣诗章，在那个政权下诗遭到禁止。在费迪萨内部，卡瓦尼利亚斯集团的一个要员是外交家和国务秘书伊格纳西奥·阿吉雷·博雷尔。全国最大的政治周刊《变革 16》的出版人贡萨莱斯·塞亚拉和国营工业管理公司“全国工业局”的前任头头弗朗西斯科·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也属于费迪萨的左翼。在塔西陀的成员中，最近特别出人头地的有：胡安·安东尼奥·奥尔特加·迪亚斯—安布罗纳（以敏锐的政治分析著称），外交家拉斐尔·阿里亚斯—萨尔加多和情报部的国务秘书加夫列尔·卡尼亚达斯。

费德里科·席尔瓦·穆尼奥斯——肯定是一个 基督教徒，也许也是一个民主党人

多年以来，费德里科·席尔瓦·穆尼奥斯一直被看作是西班牙典型右派最有前途的政治家。这当中很容易被忽略的是，席尔瓦是有影响的经济和政治集团用宣传手段有目的地有计划地塑造出来的政治家。与此相反，他在公众场合露面时和在较小范围的讨论中，往往使人感到失望。席尔瓦是佛朗哥的少数提出伟大纲领的部长之一，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1965—1970年当公众事务部长——提出的纲领，几乎在计划时间内实现，他的美名也应归功这一事实。西班牙的汽车司机，满怀感激地回忆起费德里科·席尔瓦·穆尼奥斯这位公路建造人。他由于和内阁多数派的

政策相左，而自愿辞去部长职位——在佛朗哥的西班牙，这种事罕之又罕——进入了反对派行列，这给人留下了印象。当然，当他从同一个政府那里接受一个西班牙薪俸最高的职位（康普萨国营石油垄断组织的主任职务）时，他自己很快地又抹掉了这种好印象。

在外表上，费德里科就象一个典型保守派——他本人也想充当这号人。此公年龄五十开外，矮墩墩，圆浑浑，有气无力，并且经常使人感到没精打采。他觉得他本人应该是西班牙典型右派的领袖，而且自认为这是完全理所当然的，并且相信，他将来也还将如此。很久以来，他就是“天主教全国宣传协会”主席团的成员，在那里代表着右翼。1976年1月底，席尔瓦·穆尼奥斯领导的协会“西班牙民主联盟”宣告，它将变为“一个政党或一个大的政治派别”，“目的是为在西班牙建立西欧模式的多元民主制度而奋斗”。西班牙民主联盟没有被“欧洲基督教民主党联盟”所承认；因为它终于接受了在国民运动范围内协会的不民主的章程的条件。然而，西班牙民主联盟在它公开宣布信仰多元民主之前，就得到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同盟的支持。1975年9月30日，席尔瓦在马德里的《ABC》报上声明，他的协会将接受基督教社会同盟的党的结构和工作方法，“因为我们的团体在意识形态上同基督教社会同盟相一致”。

虽然“西班牙民主联盟”的领导，几乎完全由专制制度的高级政治家组成，但是，这个天主教右派团体却想从长远考虑，谋求同诸如“民主左派”和“民主人民联盟”这些基督教民主党联合；这两个反对党曾为反对佛朗哥政权战斗过，得到欧洲兄弟党的承认。君主政体的首任农业大臣比尔希利奥·奥尼亚特，在西班牙民主联盟的领导内部，显得特别致力于谋求基督教民主党的统一；他是一位在社会政策上具有比较进步思想的人。蒙卢亚尔·卢克也是西

班牙民主联盟的领导成员，他是佛朗哥的少数认真地争取实行税收改革的财政部长之一。改革规定加重富有阶层的负担。这项改革工作结束之前不久，蒙卢亚尔被解除财政部长的职务。阿方索·奥索里奥·加西亚被看作是席尔瓦的最强大的对手和“西班牙民主联盟”的有影响的党的思想家，佛朗哥死后，阿里亚斯把他提拔为宫廷事务大臣。奥索里奥曾长期是“塔西陀思想与讨论小组”的右翼人物，当“塔西陀”持明确的改良主义态度时，他脱离了小组。在西班牙民主党人中，野心勃勃的奥索里奥明确宣布信仰佛朗哥主义，并为佛朗哥歌功颂德。还在1975年1月，奥索里奥在一次同《ABC》报的谈话中说：“在所有政治家中，我最赞赏佛朗哥。我过去一直这样说，今后也将要这样说。”在一个民主的西班牙，他发表这样的宏论，将找不到什么朋友。

曼努埃尔·坎塔雷罗，长枪党 出身的社会民主党人

同“西班牙民主联盟”一样，“西班牙社会改良”也声明愿意把自己建成一个协会，因为组织政党还被禁止。西班牙社会改良的无可争议的领袖是曼努埃尔·坎塔雷罗·德尔卡斯蒂略。在过渡时期之前和过渡时期，他是西班牙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坎塔雷罗给自己下了一个结论：“长枪党出身、具有共和党人的基本态度和社会党人的意向。”关于长枪党与社会主义问题，他写了一本书；这位长枪党人企图在一个民主党的纲领里，把长枪党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结合起来。他是一位流亡的社会主义者的儿子。“西班牙社会改良”的成员大部份是这个政权的政治家，然而有比较进步的观点，尤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上，他们不是自由国家的敌人。坎塔雷罗的党乐于成为一种纽带，连结政权中的温和派和反对党中的改良主义小组。坎塔雷罗把将来同其他社会民主党

和自由党小组结合，看作是值得争取的目标。虽然没有任何人怀疑他的好意和值得尊敬的动机，但是曼努埃尔·坎塔雷罗·德尔卡斯蒂略愈来愈遭到右的和左的方面的攻击，因为在他谋求右派和左派两个敌对阵线和解的时候，势必要改变他们的传统势力地位。

华金·加里格斯·瓦尔克，官方的西班牙 与现实的西班牙之间的纽带

“自由主义是西班牙历史上最强大的潮流之一，是西班牙人民的特点之一。”1976年初在成立“自由民主协会”时，外交家恩里克·拉罗克发出这个起初使某些观察家感到意外的论断。拉罗克放弃他在外交部的高级职位，以便全力以赴争取把无数的自由党小组和个人合并为一个大党。事实上，在上两个世纪中，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曾经起过重要作用；大多数西班牙人肯定是地道的自由主义者，尽管少数举足轻重的人喜欢持好战的反自由的立场。佛朗哥在世时，华金·加里格斯·瓦尔克就同他的朋友们以及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一起建立“利布拉”自由协会，1975年12月，该协会变为“民主党”。他是君主政体政府的首任司法大臣的儿子和首任外交大臣的女婿。加里格斯出生于一个著名的大学教师、法官和外交家的家庭。他本人以及他的兄弟们在商务上同美国大公司紧密合作过。对华金·加里格斯·瓦尔克来说，他父亲和岳父参加的政府开始走向民主的道路，但太慢了，太摇摆了，太没有保障了。他一再要求加快这一个过程，“以使官方的西班牙能一下子就同现实的西班牙接触”。“民主党”的纲领相当于欧洲典型的自由党。新闻记者和教授安东尼奥·丰丹和大工业家华金·穆尼奥斯·佩拉茨也属于党的最高领导。丰丹是天主教凡俗组织“上帝事工派”的自由成员，是民主晚报《马德里》的主编，1971年10月，

该报被佛朗哥政府断然查封，禁止出版。

外交家和出版家伊格纳西奥·卡穆尼亚斯把他的“民主人民党”看得比“民主党”左一些。在佛朗哥统治下，卡穆尼亚斯也已经同左派反对党人甚至共产党人，有过良好的接触。西班牙严肃的政治周报《瓜迪亚纳》是属于他的。他的党特别努力在全西班牙争取吸收自由职业者参加其组织，1976年初，该党加入自由党国际。

在“西班牙民主联盟”里，也有几个右翼自由党的政治家。这是一个反对派阵线，力量最强的是“西班牙共产党”。象拉斐尔·卡尔沃·塞雷尔和安东尼奥·加西亚—特雷维哈诺一类政治家，他们的左派同盟者喜欢称他们为“经济界右派”的代表。卡尔沃·塞雷尔有着变幻多端的政治生涯。在战争期间，他站在共和国一边战斗，而且与桑切斯·贝莉亚在同一个单位，后者后来成为心胸狭窄的极右分子和情报部长。长期来，卡尔沃·塞雷尔在政治上一直是很右的。直到五十年代末，他的著作和无数文章一般都是慷慨激昂的战书，这些战书从整个天主教的立场出发，向形形色色的自由党人挑战。后来，卡尔沃本人慢慢地也成为一个自由党人。他成为《马德里》晚报多数股份的占有者，一个时期也是该报主笔，并使这家报纸成为自由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喉舌。卡尔沃从前的朋友桑切斯·贝莉亚接受情报部长职务后，禁止这家报纸出版。他在国外的报刊上发表几篇尖锐抨击这个政权的文章，由于逃往巴黎，才免遭逮捕。从前，他被看作是上帝事工派的权威的意识形态专家；后来，除了丰丹外，他成为在这个天主教凡俗组织里最著名的自由党人。他认为，在西班牙建立民主，不应该放弃与共产党人的合作。

卡尔沃的政治朋友加西亚—特雷维哈诺是马德里的一位杰出的律师和金融家。他在短短几年内捞取了巨额的财富。他的商业活动同他的政治野心一样，除了引起赞扬外，也给他招来大量各种

政治出身的私敌。

何塞·马里奥·阿尔梅罗不是民主联盟的成员，他是几家美国大企业的律师和顾问、西班牙最大的非国营通讯社的社长。但是，阿尔梅罗同联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犹如他同几乎所有西班牙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团体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样。阿尔梅罗是一个政治上机灵并深受爱戴的自由党人的典范。在今日的西班牙，这种人比人们设想的要多得多。

中间偏左的基督教民主党人

西班牙的天主教会阶级，不十分想建立一个明确地自称为基督教民主党的政党。西班牙的主教们不想只有一个天主教党，由它垄断一切。他们期望从温和的右派到中左派的好些政党，都对教会的利益敞开大门。在至少有七个以基督教民主党的思想为基础的政党中，只有一个也许也是最小的党，在名称上用了“基督教的”一词，然而，在这个国家的有强烈宗教信仰的省份里，这个词吸引着很多选民。五个党——三个地区性的和两个全国性的——参加“基督教民主党欧洲联盟西班牙支部”；这是一些在独裁统治的艰难岁月里，就已经为民主而奋斗过的政党。在国内战争中站在共和国一边的地区里，今天，各基督教民主党的力量最为强大。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信奉基督教的居民参加政府当局的政治组织的人要多得多，如参加“国民运动”。当然，基督教民主党人也能期望在那些他们的组织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主要是农村地区，争取到很多选民，因为在那些地方左派政党的吸引力还不很大。支部里的五个政党之一的主席何塞·玛丽亚·希尔—罗夫莱斯说：“政治上，我们首先是民主主义者，然后才是基督教徒。我们不要求任何一位想加入我们党的人要有洗礼证。我们是基督教人

道主义范围内的民主主义者。”1976年2月初，五个党在马德里召开联席工作会议，会上决定了一项原则纲领。各基督教民主党在纲领里要求，明确地同佛朗哥独裁机构作“民主的决裂”。基督教民主党人同各左派政党一样坚决要求大赦政治犯，让流亡的西班牙人能够返回祖国，在西班牙实现民主自由和尊重人权，召开立宪会议，制订新的民主宪法。所有五个党都主张允许共产党存在，但如何同共产党人合作，共同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有小小的意见分歧。“民主人民同盟”反对同西班牙共产党和其他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策略上的联盟；其余四个党由于它们属于“民主论坛”或“加泰罗尼亚民主大会”和“加泰罗尼亚政治势力代表会”都缔结了此类同盟。一旦有了民主自由，就结束同其他不同意识形态团体的合作。现在的合作并不意味着准备建立人民阵线。五个党拒绝“产生巨大社会差别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求建立“国营企业、自治企业和私人占有公司能够互相并存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至于讲到社会政策纲领，西班牙基督教民主党人肯定属于世界上基督教民主党的左翼。这不仅是由于西班牙依然一直存在着巨大的对立，而且肯定也同下述情况有关：西班牙天主教派里的有产阶层多数都与独裁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最有名的政治家起初是民主党派所无法接受的。何塞·玛丽亚·希尔—罗夫莱斯·伊克里尼奥内斯是共和国时代相当右的天主教政党“西班牙右翼自治联盟”的领袖，今日属于中间偏右派，他也拒绝同“西班牙民主联盟”的领导人进行谈判。西班牙民主联盟享有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同盟的特殊恩惠。西班牙基督教民主党的这位生气勃勃的教长对此表示遗憾，但并不感到惊奇。“在世界上的基督教民主党的光谱上，基督教社会同盟终究将排在极右边。”

支部各个党要求建立一个邦联国家，各地区的自治权至少应该象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那样广泛。在中央集权的西班牙，在佛

朗哥的统治下，赞成区域自治已经被看作是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因此这几乎是一项革命的要求。支部里三个地区性的党，应该保持充分的独立。1976年2月在代表大会闭幕的群众大会上，“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发言人胡安·阿胡里亚格拉说道：“我们在内战中屈服，然而并没有被打败。”这位巴斯克基督教民主党人也不怕提起一个最困难的题目：分离主义的暴力组织“巴斯克与自由党”。

今天，巴斯克与自由党一般被看作欧洲无数的左派激进恐怖小组之一；但是，这个组织产生的历史恰恰是一出佛朗哥错误的地区政策的教育剧。虽然，吉普斯夸和比斯开这两个巴斯克省份的居民是特别善良的天主教徒，在内战中却站在反教会的共和国一边，因为共和国曾许诺给他们制订一个自治章程。因此，在佛朗哥的西班牙，这两个省份被叫做“叛徒之省”长达三十年之久。巴斯克的语言和文化比加泰罗尼亚遭受更为严厉的压制。孩子们往往由于不会正确地使用西班牙语，在学校里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而遭到严厉的惩罚。“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老党员，受到他们的青年小组的责难，说他们对反抗压迫无所作为，或把他们的行动局限在毫无成果的宣言上。党的青年小组建立“巴斯克与自由党”组织，它首先组织游行，随后也用暴力消灭内战胜利者在巴斯克的象征，把巴斯克的旗帜挂到教堂的钟楼上和公共建筑物上。从一开始，警察就非常残暴地对付那些起初十分老实的“巴斯克与自由党”的成员，警察的严刑拷打和恣意枪杀，导致“巴斯克与自由党”的迅速激进化——包括意识形态和具体方法的激进化。后来，不受控制的分子也加入组织，既有警察的密探，也有确实没有政治动机的冒险家。巴斯克与自由党杀害了很多政治警察，民卫队的“审讯专家”，警察密探和佛朗哥政府首脑卡雷罗·布兰科。今天，巴斯克与自由党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斯克国家，除了西班牙的巴

斯克地区外，法国的面积较小的巴斯克地区也应属于这个国家。然而，想同西班牙国家分离开来的，只有少数巴斯克人；没有西班牙国内的广大市场，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工业和经济将会十分困难。

地方主义，自治主义，分离主义——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都要求更大的区域独立自主——对任何一届政府来说，都将是一个难题，即使对一个民主政府也是如此。在加泰罗尼亚，加泰罗尼亚语优于西班牙语，正愈来愈成为第一语言。虽然在加泰罗尼亚的某些大城市里，半数居民不会说加泰罗尼亚语，或者说得很不好，因为他们是外面流入的人，在很多公众集会——甚至足球比赛——上所有通知和布告都已使用地方语言。操加泰罗尼亚语的人不仅分布在加泰罗尼亚，而且分布在巴利阿里群岛，巴伦西亚地区的大部份和法国鲁西荣的一些地方。在安道尔，加泰罗尼亚语是国语。加利西亚地区也有自己的语言：与葡萄牙语很近的加利西亚语。按语言史的标准，加莱科—葡萄牙语是一种单一的语言。也许，只有一种宽宏大度的邦联制度才能够保持西班牙国家的统一；除非人们在将来也想竭尽一切手段——其中包括暴力和恐怖——来实现这种统一。事实上，所有民主党派都宣布赞同建立联邦国家——西班牙君主政体当然依旧是中央政府。

共和国的右翼天主教政党“西班牙右翼自治联盟”的大多数追随者都转向佛朗哥一边；反正他们从来不是笃信的民主主义者。不过，共和国里西班牙右翼自治联盟的部长之一希门尼斯·费尔南德斯教授，五十年代就把一个天主教民主主义者小组纠集在自己的周围。这位有名望的教授的朋友们，采取了一种在当时几乎是耸人听闻的立场，即人们可以是一个信仰笃诚的天主教徒，但纵令如此，仍可以是佛朗哥独裁的对手。1958年，在希门尼斯·费尔南德斯周围建立了一个小组，取名“基督教民主左派”。这个小组的成

员不得不从事地下工作，被罚款，几个蹲过监狱，另外一些人被放逐——然而一直没有遭受象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所遭受的那种严厉惩罚。当时的这些年轻人，今天大多数已成为“民主左派”的领袖，有几个向左迈进成为社会党人，另外少数人继续参加右翼团体。“民主左派”在中产阶级中，在信天主教地区的专业工人中，在自由职业者中，在农村和在妇女界中，找到了它的追随者。在党的名称上放弃了“基督教的”一词，其原因，一方面，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因为——用一个党的领导人的话说——想避免同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中的右翼党派混为一谈。“民主左派”的无可争议的第一号人物是鲁伊斯—希门尼斯。

华金·鲁伊斯—希门尼斯，通往 民主的笔直道路

华金·鲁伊斯—希门尼斯是当代最有天才和最多才多艺的西班牙人之一。他是马德里—阿尔卡拉大学法学系的正教授，他的政党的主席。作为律师，他为政治犯辩护，从西班牙工人领袖卡马乔到智利共产党头头科尔巴兰，他都辩护过；他领导很活跃的主教委员会“正义与和平”，同梵蒂冈的政治家们商议大事。乍看起来，鲁伊斯—希门尼斯身上的某些东西似乎也是矛盾的：他过去是长枪党人，现在是左翼民主主义者，他过去是佛朗哥的部长，短短几年之后却成为专制制度的尖锐批评者。他曾为争取教会和国家明确分开而奋斗过，但是作为驻梵蒂冈大使，他对1953年的不幸宗教条约作出很多的贡献，这个条约使西班牙的教会和国家相互依赖，使它们成为同一个压迫政权机器的两副脸孔——对某些西班牙人来说是这样。鲁伊斯—希门尼斯终于成功地同共产党人合作，而又不致丧失某些极右的佛朗哥分子的敬重和友谊。在所有这一切上，身材魁伟的教授绝不是机会主义者。相反，鲁伊斯—希门尼斯

从很右发展到相当左，其道路是笔直的。他具有基督教弗朗西斯教派的耐性和众所公认的善良品格，这使他成为一位只有很少私敌的西班牙政治家——尽管他多年来一直坚定而明确地谴责佛朗哥政权以及胡安·卡洛斯治下继续实行的独裁。鲁伊斯-希门尼斯为这个政权效劳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华金·鲁伊斯-希门尼斯1913年出生于马德里省，是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政治家的儿子，三十五岁时就当上了西班牙驻梵蒂冈的大使，后来，佛朗哥任命他为教育部长。当他未能实现他的大学自由化计划时，他辞职不干了。他创办《对话札记》杂志，很长时间，它一直是西班牙最大胆和最有影响的政治出版物。几乎所有著名的知识分子和从温和的右派到极左派的所有政治家，都在鲁伊斯-希门尼斯的杂志上发表言论。它成为西班牙反对派的第一个共同论坛。过渡时期和民主开始的艰难时期，本来必将是属于象鲁伊斯-希门尼斯这类政治家的时代，这样一些威望和信任远远超出本党派的人物的时代，前提是过渡的年代将成为西班牙人和解的岁月，正如多数居民所希望的那样。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米兰达是一位多年为基督教民主党的目标而奋斗的积极战士，海梅·科尔特索是一位受理政治案件的有名望的律师，他们俩在党内是鲁伊斯-希门尼斯的最重要同事。

何塞·玛丽亚·希尔-罗夫莱斯，佛朗哥的上司——未来的政治家

另一个西班牙全国性的基督教民主党主席希尔-罗夫莱斯，是独夫民贼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的上司中唯一还健在的西班牙人。很多年以后，他成为佛朗哥无情的政治对手。后者当时已是将军，但还不是独裁者。他很轻蔑地发表对佛朗哥的看法：“我同佛朗哥的关系？一个上级对一个下级的普通关系，一直很冷淡，

我从未同情过将军。”当第二共和国行将结束的时候，三十八岁的希尔—罗夫莱斯还只是西班牙右派的一名才气横溢的年轻人，而比他大五岁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作为总参谋长，已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了。希尔—罗夫莱斯领导的西班牙右翼自治联盟的大多数，1936年加入起义军。希尔—罗夫莱斯否认曾经参与佛朗哥周围的将军们的起义准备工作。无论如何，他没有参加战事。战争期间和以后的十四年，他是在国外度过的，一段时间担任当时的最后一位国王^①的儿子和后来的国王^②的父亲唐·胡安的政治顾问。1962年，他同其他温和的西班牙民主党人一起，参加在慕尼黑举行的西班牙反对派代表大会，并因此被佛朗哥重又流放两年。之后，他重新成为马德里高收入的很红的律师；若有政治领导人和政府有名人物卷入任何形式的财政丑闻和诈骗案件时，他总是出场替被告辩护。何塞·玛丽亚·希尔—罗夫莱斯是二十世纪西班牙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佛朗哥分子们畏惧他的政治知识和他熟悉这个政权的很多隐私。他年事已高，却还要求同佛朗哥和国王胡安·卡洛斯的政治家们公开辩论——然而迄今为止，还无人敢于同希尔—罗夫莱斯进行较量。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位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在一个真正的议会里，终究是一位伟大的辩论演说家，而佛朗哥统治下的唯唯喏喏议会除了徒有其名外，同真正的议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的党“民主人民联盟”，在想思上十分接近从前的西班牙右翼自治联盟，但是却适应了变化了的社会要求。与此相适应，希尔—罗夫莱斯的新党的纲领，特别在社会政策问题上，比老的西班牙右翼自治联盟要左得多。新党相信，在过去西班牙右翼自治联盟势力强大的领域——如在信仰天主教的资产阶级里，在社会地位上升的人中间，在小城市里受传统影响和有名望的

① 指当时的国王斐迪南七世。——译者

② 指现任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译者

人士中，在农村——也能找到自己的追随者。希尔—罗夫莱斯在党内最重要的同事是他的长子何塞·玛丽亚·希尔—罗夫莱斯·伊希尔—德尔加多。

在专制统治的最后几年和佛朗哥死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是支部里组织上和党员人数上最强大的党。在共和国里，它是在巴斯克地区遥遥领先的多数党。1960年逝世的巴斯克政府主席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就在他已经过着流亡生活的漫长的岁月里，在他的家乡也依然一直极受尊敬。当然，今天有着更多的来自西班牙其他地方的人，生活在巴斯克的工业城市里，如毕尔巴鄂，维多利亚，巴拉卡尔多。大多数非巴斯克的工人，将不会选举具有明显巴斯克色彩的党，特别因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有时不得不深受难以容忍的巴斯克人的优越感之苦。不过，“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在城市中产阶级和农业居民中，同样一直是强大的。现任巴斯克流亡政府的主席何塞·玛丽亚·德莱萨奥拉，曾多次秘密到过西班牙。党的领袖胡安·阿胡里亚格拉，战后经常身陷囹圄。

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的基督教民主党——“加泰罗尼亚民主联盟”和“巴伦西亚地区民主联盟”——在它们的地区里，同历来有影响的左派政党有着激烈的竞争。安东·坎耶利亚斯和维森特·鲁伊斯·蒙拉瓦尔是两党有能力的、在他们的地区有威望的领导人。所有基督教民主党团体都把社会党人看作是它们理想的联合对象。

社会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

据少数可靠的没有全部公布的民意测验，在各种意识形态和无数的政治派别中，四分之一以上的西班牙人，优先选择那些贴有

“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标签的党派。因此，只有一个大的基督教民主党才能同一个联合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竞争头一名的位置。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在西班牙有着悠久而伟大的传统。“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是欧洲最老的社会党之一，在1936年春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它是最大的政治组织。在本世纪，很多重要的西班牙政治家是社会主义者：党的缔造者帕勃罗·伊格莱西亚斯，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德高望重的教授和议会主席胡利安·贝斯特罗（他拒绝在失败前离开西班牙，并由于缺乏医疗照顾，在佛朗哥的监狱里很快就死于非命），革命左翼领袖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和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政府首脑胡安·内格林。社会主义工会“工人总同盟”在数十年间，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会之一。佛朗哥的西班牙匆忙谋求同社会党执政的国家合作之后，近年来，这个政权再也不把“社会主义”一词当作洪水猛兽了。“社会民主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这一争论问题，在西班牙已经讨论过了，而且远比社会党国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历届会议研究这一问题为早。在西班牙，主要是那些不是传统社会主义出身的政治家，选择“社会民主的”作为他们创建的党的名称。自称为“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人民党”，在葡萄牙取得明显的竞选成就之后，这个人们喜欢的形容词的吸引力增加了。当然，“社会民主的”葡萄牙民主人民党，首先在中右派和右派中找到自己的选民，这在各社会党中，引起对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信仰的强烈不信任。社会党人也正确地责备各社会民主党，说它们迄今在工人中缺乏基础。最重要的社会民主党“西班牙社会民主联盟”，是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的结合体。它的第一任主席作家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从前是长枪党的领袖，后来是很有胆识的现政权的对手，1975年夏天逝世。之后，党分裂了。里德鲁埃霍之后的西班牙社会民主联盟的第二号人物安东尼奥·加西

亚·洛佩斯，成立了“西班牙社会民主党”；左翼追随加西亚·洛佩斯，自由派依然留在老的党内。已经提到过的民主的长枪党人曼努埃尔·坎塔雷罗的“西班牙社会改良”，也想成为社会民主党。地区性的社会民主党中，“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与民主协会”被看作是最强大的，何塞普·帕利亚奇是它的颇孚众望的和机灵的领袖。帕利亚奇着重以北欧和中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为榜样。欧洲各国五花八门的党的名称，都贴上“社会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标签；在西班牙，这两个词被简单地分别看作“不太左”和“比较左”的标志。从前很右的卡洛斯党的纲领终于也打出了“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费迪萨”的一系列成员都标榜自己是“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包括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还有“塔西陀”的成员也一样，如阿里亚斯—萨尔加多。

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党与西班牙的社会党的联合问题，双方都经常要求认为是必要的。然而首先，各社会主义小组之间必须联合。两个全国性的最强大的社会党是西班牙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人民党；第一个加入民主论坛，第二个加入联盟。在西班牙社会民主党内部，有一个多年任党的书记的罗多尔福·略皮斯领导的分裂小组。略皮斯小组主要在某些国内战争期间到墨西哥流亡而大多数已经发家致富的人中，在法国的流亡者以及在西班牙国内较老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找到自己的党羽。略皮斯的小组由于在国内战争期间和战后有与共产党人打交道的不愉快的经验，所以是强烈地反共的；在年轻的政治家们领导的“正式的”西班牙社会民主党里，反共色彩业已消失，或者只是谨慎小心地表示对特别狡猾的共产党党魁卡里略的不信任。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工会组织“工人总同盟”的总书记托马斯·森特诺于1944年被政治警察折磨致死。今天，这个党的总书记费利佩·贡萨莱斯正为当权的政治家们所追求。再也不许

逮捕西班牙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佛朗哥统治的最后几年，他们已不象共产党人受到那样残酷的迫害。君主政体政府的首届大臣们，只要他们是属于“平民化的右派”，都把“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看作一个可能的伙伴，或左派的重要对手。由于这一恩宠来自错误的方面，党的领导人感到有些不舒服，然而终究不是他们乞求来的。在社会党国际内部，西班牙社会民主党同它的伙伴们相比较，是一个很左的党。在全党中，最左的是安达卢西亚的党组织；费利佩·贡萨莱斯来自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北部的西班牙社会民主党小组比较强大，也有较多的积极追随者，主要是产业工人，而在马德里和安达卢西亚，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高级职员和官员占的比例非常大。费利佩·贡萨莱斯得到巴斯克各小组的支持，当然当选。这使他在党内的地位强大起来。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原则纲领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必将消亡”。这个党如果当权，将进行一系列的国有化。“然而，我们不是为原则而原则地赞同国有化，因为这将附带导致官僚主义，但是我们认为，国家必须立即把六至八个大银行实行管制，或者如果愿意的话，实行国有化。这些银行迄今一直妨碍着以合理的方式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作斗争。因为这些银行掌握着西班牙的货币银行，而不是反过来由国家货币银行控制整个经济进程，把全国的要求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我们也要求对外国投资进行管制，比如，在化工、制药和食品等方面，现在根本没有这种管制，这是一种耻辱。那些对于西班牙命运攸关的部门，不许落到外国人手中。”费利佩·贡萨莱斯作了这样的声明。

在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里，有社会民主党人，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党是社会主义的和民主的。人们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从它的缘起和它目前的党员成份来看——如果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它进行历史和政治分

析的基础的话，然而并不意味着党员必须教条主义地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贡萨莱斯的这种说法，同葡萄牙社会党的头头索亚雷斯在同一题目上的言论，几乎同出一辙。只要这个政府不是自由选举产生和国内没有民主自由，“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拒绝同政府进行任何合作。贡萨莱斯在1976年初的一次谈话中说，“如果我们的党被现在的不民主的政府承认合法，而其他的党派，如共产党等尚不合法，我们党将利用这种合法性，为争取一切党派的合法化而奋斗。”对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来说，同卡里略的共产党合作，现时只有一个可能性：“试图就从专制到民主的过渡时期达成制订一个民主纲领的协议。”但是，共产党必须看到，它显然不能象党的首脑圣地亚哥·卡里略想象的那样，即可能是共产党，同时又是社会民主党。在社会党领导人心里，依然一直担心卡里略依仗他那明显的修正主义纲领向社会党的势力范围突进。“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不仅想成为一个劳动工人的政党——它力争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民党。因此，它警惕一切形式的宗派主义。当然，这个党将一直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这也是不同的社会状况产生的一个后果，是还要大得多的社会政策引起的一个后果。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把自己看作西班牙社会党大家庭的最重要部分，还期待主要通过其他社会主义小组的成员加入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实现社会党的联合——然而，不能简单地排除其他实现联合成为一个社会党的其他可能途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是西班牙加入“社会党国际”的独一无二的西班牙政党，这从组织机构和财政上，大大地增强了它的力量。在弗朗哥专制的最后几年中，大量杰出的天主教左派民主人士参加了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今天，这个党可以期待很多常做礼拜的天主教徒加入党组织。从前，“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经常不断地受到国内天主教会的猛烈攻击；相应地，当时党也比较反教会。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最后自

称为“工人党”，它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和这个国家的南部，加强自己在工人中的影响。尤其在较新的工业区。这个党和它的工会“工人总同盟”，几乎没有追随者，那儿没有社会主义的家族传统和地区传统。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西班牙共产党和受共产党强烈影响的“工人委员会”，由于大胆地为工人的社会要求而奋斗，赢得了很多追随者，而当时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把时间都化费在主席团的争论和关照它的流亡中的传统成员上。昔日的无所作为，今日得到惩罚。当然，由于政府对各社会主义小组越来越宽容，使社会党人比共产党人在组织发展上更为跃进。1976年1月底，党的第一书记费利佩·贡萨莱斯声称，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从未象今天这样团结一致——当然，也没有一个党象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那样，它的主席团几十年间一直闹不团结。就在第一书记几乎是慷慨激昂地谈论党的领导团结一致的同时，弗朗西斯哥·布斯特洛退出主席团——执行委员会。他感到，在主席团里，他的大多数同事在佛朗哥死后太过分地走向右的路线了。

费利佩·贡萨莱斯，最老的党的 最年轻的领袖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书记不是工人，而是工人家庭出身。他父亲从新卡斯蒂利亚到安达卢西亚的最大的城市塞维利亚，经过艰苦的劳动，挣得几头奶牛；牛奶的收益足以使他养家糊口，并使他的一个孩子费利佩上大学：在塞维利亚学法律，在比利时学几个月经济学。这位1942年出生的贡萨莱斯，在塞维利亚大学讲了几年劳动法，直到政府认为他的政治活动，对一所国立大学来说是无法忍受的。费利佩·贡萨莱斯在塞维利亚的“红区”——布埃纳维斯塔工人区——生活了二十年。他同其他律师在塞维利

亚和马德里开办事务所，由于参加罢工或由于个人的政治态度而被解雇的工人们，常到他们的事务所里求教和要求替自己辩护。塞维利亚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小组，在1970年前后得到显著的增强。

贡萨莱斯1974年在法国的絮伦当选为第一书记时，他仅在党内和塞维利亚闻名。不到一年之后，他是欧洲新闻界最常提到的人物之一。对第一书记其人的兴趣同对这个党的兴趣是相一致的——很多观察家把它看作是西班牙未来最重要的政治力量。费利佩·贡萨莱斯具有出色的政治领导才能。他是一个非常精心细致的演说家，擅长深入浅出地分析复杂的情况，使之通俗易懂，而又不简单化。贡萨莱斯对各个不同的民众阶层有着强烈影响，赢得了同情。加之他思想敏锐，风度自然，而又平易近人，这就使得他特别适于参加公开辩论和群众大会。在党内，费利佩·贡萨莱斯勿宁说属于左派，他的政治思想和他的社会分析都打上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烙印，虽然不能说完全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恩里克·穆希卡·埃尔索格在党的领导机构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他有反对政府的丰富经验（从前，他是共产党党员）和组织天才，肯定也因为他代表这个党的老巢之一巴斯克省份吉普斯夸。马德里的律师巴勃罗·卡斯特利亚诺，有一个时期曾是党的代言人，不过自从贡萨莱斯当选以来，他主要照料社会主义工会“工人总同盟”。象贡萨莱斯一样，来自安达卢西亚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积极青年政治家，还有书商阿方索·格拉和医生路易斯·亚涅斯，后者任全党对外联络书记。格雷戈里奥·佩塞斯—巴尔瓦出身天主教徒，他是政治犯们和很多人们喜闻乐见的报纸评论家们的辩护律师。“工人总同盟”内部的工人领袖中，拉蒙·鲁伊瓦尔在整个西班牙的工人中享有极大的威望；他来自比尔巴鄂，曾在监狱里度过了二十个春秋。金属工人尼古拉斯·雷东多也在狱中

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他也是比尔巴鄂人，最后当选为“工人总同盟”的第一书记。

西班牙最有名的社会党人士恩里克·铁尔诺·加尔班教授不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铁尔诺·加尔班是“社会主义人民党”的奠基人和主席。这两党之间，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在社会主义人民党里，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铁尔诺在知识分子中的吸引力和他作为大学教师的威望（即便佛朗哥政权1965年把他开除出大学之后也仍然如此），“社会主义人民党”在大学里，甚至在西班牙的外交界，也有较多的追随者。很多外交家是铁尔诺的门生。尤其在安达卢西亚，这个党也拥有有组织的工人小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负责人和铁尔诺·加尔班之间的个人关系，几乎一直是紧张的，流亡国外的略皮斯还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首脑时，情况也是如此。铁尔诺不同意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的主要由于个人的不快经历而产生的强烈反共主义。铁尔诺党的工人们，大部分也参加“工人委员会”；在工人委员会里，共产党人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当“社会主义人民党”同共产党人和其他反对派组织一起，建立“西班牙民主同盟”时，党失去了一些资产阶级阶层的同情者。诚然，铁尔诺·加尔班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样，想在他的党同共产党人之间划上一条明确的界线。铁尔诺的党没有被“社会党国际”承认为伙伴党，因而其财力比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要弱得多。某些材料表明，1976年初，“社会主义人民党”拥有四千多名党员。党的纲领宣布赞同民主的社会主义，不反对资产阶级革命争得的民主自由，力争分阶段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化。党章规定要为西班牙所有社会党的统一而奋斗。佛朗哥死后不久，社会主义人民党同一些小团体，主要是地区性小组，联合为“社会主义联盟”，它感到这种合作使自己比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强大了。

恩里克·铁尔诺·加尔班, 西班牙廉洁

政治的象征性人物

如果西班牙在今后几年内成为共和国的话, 几乎没有哪一个人能比恩里克·铁尔诺·加尔班教授更适于当国家总统了。可以肯定, 没有任何一个别的西班牙人, 能够得到居民的大多数乃至平民化右派队伍的赞同。他的朋友们叫他“老教授”, 这与其说是由于他年事已高(他生于1918年), 勿宁说是出自对他的尊敬; 对于很多西班牙人来说, “老教授”代表了一系列特别高贵的品质、举止和天资的罕见的结合, 例如, 绝对的廉洁奉公, 创造性的智慧, 政治上的耿直, 文职人员的果敢和朴素的生活作风。1948年, 铁尔诺·加尔班和后来当佛朗哥的情报部长和君主政体政府的内政大臣的弗拉加·伊里瓦尔内一起, 竞争一个国家法的教席, 这两人当时都成为正教授。弗拉加放弃教学工作, 就任高级政治官职; 而铁尔诺·加尔班声明声援不光为大学要求更多自由而游行示威的大学生, 这之后他于1965年被终身开除出西班牙的大学。在此之前, 他在萨拉曼卡的讲课和讲座, 有很多外国大学生和年轻的科学家去听; 也经常有警察去听, 警察把这位教授的讲授录下音来。在被开除出大学之后, 铁尔诺·加尔班靠给外国高等学校作报告和私人授课为生。他发表了很多法学、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 然而也发表了一些关于文学和美术问题的重要论著。铁尔诺作为演说家和辩论家, 以他的语言精确和条理清晰著称, 给人留下印象。铁尔诺·加尔班和他的党加入“民主联盟”, 因为他认为, 一切反对派团体应该尽可能地共同进行反对佛朗哥独裁的斗争。他支持让共产党人完全合法, 然而坚决反对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合并或紧密联合。

总书记劳尔·莫罗多是“社会主义人民党”无可争议的第二号人物。莫罗多象他的师傅和老师铁尔诺一样, 是国家法教授, 在他

求学期间和教学活动的初期，警察和佛朗哥的历届政府就给他制造了无数困难。党的副主席之一哈维尔·保林诺·佩雷斯，在监狱里度过了数年时光；他父亲在内战中被佛朗哥的追随者枪杀。“社会主义人民党”的另一位副主席曼努埃尔·莫拉，也不得不在流亡中度过很多岁月，他是医生，来自马略尔卡。主席团成员弗朗西斯科·博维略和多纳托·富埃霍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前者是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负责情报工作；后者是医生，西班牙最有名望的心脏病专家之一，领导着党的对外联络部。党的同情分子中有若干著名教授，如社会学家埃利亚斯·迪亚斯和卡洛斯·莫亚，以及外交部司长费尔南多·莫兰这样的外交家，此外还有一些高级军官。

一位亲王领导下的从极右跳到相当 左的卡洛斯党人

许多西班牙人还一直难以接受认为卡洛斯党人信仰社会主义的见解。卡洛斯党人——也称传统分子——很长时间属于反教会和极端保守的右派，在上一次国内战争中，他们反对共和国的左派政府，而且也反对共和国作为国体。卡洛斯党人的部队属于最勇敢、最大胆的佛朗哥战士。卡洛斯主义是波旁王朝内部由于继承问题的争端而产生的。1933年斐迪南七世逝世时，国内的大部份地区，尤其是北方，不承认他的女儿伊莎贝拉二世为女王，而宣布已故君主的兄弟唐·卡洛斯亲王为查理五世国王。除了北方自治的省份外，也有反自由的专制主义的团体聚集一起，作查理五世的后盾。卡洛斯党人在十九世纪进行了三次内战，都未能把他们的王位觊觎者扶上西班牙王座。他们希望经由佛朗哥而达此目的，然而佛朗哥决定选择阿方索支系。卡洛斯党人感到自己被佛朗哥出卖。1968年，他们的王位竞争者卡洛斯·乌戈·封·波旁—帕

尔马被驱逐出境,这时,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转而采取明确的反佛朗哥政权的立场。卡洛斯党内青年团体的影响越来越强,党越来越向左转,在向社会主义的进军中,丧失了一系列优秀的党羽。卡洛斯·乌戈亲王不再坚持君主政体的国体了。他也是卡洛斯党人的最重要的思想家。对很多卡洛斯党人来说,“伊比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他们政策的目标。届时卡洛斯·乌戈将根据西班牙人民决定采纳什么国体,而成为联邦总统职位的候选人或王位的候补者。在佛朗哥政权的最后几年中,一些卡洛斯党人同左派巴斯克暴力组织巴斯克与自由党相互勾结。卡洛斯·乌戈·封·波旁—帕尔马同荷兰公主伊蕾娜结婚;他的号召和他经常在法国出版的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是声讨佛朗哥政权和一切想继续推行独裁制度的人的最锐利的檄文。卡洛斯党人也象另外一些社会党派别一样,要求实行“企业自治社会主义”,由工人和职员对企业实行全面自治。无疑,纳瓦拉和巴斯克地区乡村里的卡洛斯主义的徒子徒孙们,并不都知道他们的党大大地向左急进了——在卡洛斯党人的群众大会上,很多人还一直只喊“上帝、祖国和国王”万岁,此外,另一些人 also 高呼民主与社会革命万岁。但是,尤其在纳瓦拉和吉普斯夸两省,依然有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无条件地追随他们的党,追随卡洛斯主义。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别的西班牙政党,象“卡洛斯党”那样在人民中有牢固的基础,尽管这种基础也局限在某些地区。而且,卡洛斯主义与人民的联系,早被卡尔·马克思所认识和赞扬,这在1849年的《新莱茵报》上是记录在案的。卡洛斯党人的无可争议的领袖是卡洛斯·乌戈,即1930年在巴黎出生的乌戈·封·波旁—帕尔马亲王。他父亲是哈维尔·封·波旁—帕尔马亲王,卡洛斯党人称之为“哈维尔国王”,他参加法国抵抗运动,被纳粹投入集中营。卡洛斯·乌戈在巴黎和德国研读经济学,在若干国家的煤矿业部门工作过,也在西班牙工作过。他访

问过许多共产党国家(中国,古巴,南斯拉夫),了解它们的经济结构。自从被驱逐出境后,他一直生活在法国南部。党的总书记是何塞·玛丽亚·德萨瓦拉;吉普斯夸省的当选全国议会议员的加夫列尔·苏维亚加也是党的主席团成员。

西班牙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拥有特别多的有才华的政治家,若在民主国家里,将会前途无量。西班牙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安东尼奥·加西亚·洛佩斯,是老社会党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出身,他在美国学习了现代经营管理法,被认为是优秀的经济和财政专家。加西亚·洛佩斯同一些西班牙军事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的最亲密的政治同事是曼努埃尔·迭斯—阿莱格里亚——1974年根据极右派的建议被佛朗哥解职的同名总参谋长的儿子。在安达卢西亚,年轻律师阿莱杭德罗·罗哈斯·马科斯(安达卢西亚社会主义联盟)颇孚众望。罗哈斯·马科斯出身于塞维利亚的一个殷实而闻名的家族。当他的伯父托马斯·加里卡诺任西班牙内务部长时,他被判处多年监禁,因为他在报告中批评佛朗哥的政策。后来,把徒刑改为放逐。罗哈斯·马科斯一连好几年都不能去看望他的故乡塞维利亚城。象罗哈斯·马科斯一样,社会学家何塞·比达尔·贝内伊托(卡斯蒂利亚社会主义联盟)也是民主联盟的一个领导人。比达尔·贝内伊托曾是上帝事工派的多年成员,而今天他是这个天主教凡俗组织的一位学识渊博的对手。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这位独裁者的几位最亲密的同事就是出身于这个团体。社会党的政治家——包括无数地区性的社会主义小组的领导人——的数目之多,与社会主义思想在西班牙人民中得到广泛的赞同是相一致的。

动摇于莫斯科和民主之间的 西班牙共产党人

何塞·玛丽亚·德阿雷尔萨就任佛朗哥死后首届政府外交大臣前不久，就不反对允许西班牙共产党的存在，“如果它尊重宪法的议事程序的话”。另外一些不久后到政府任职的政治家，当时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但是，君主政体首届内阁不得不屈从军人们的压力，大臣们——其中包括德阿雷尔萨——几乎用同一种腔调声明道：不能容许西班牙共产党存在，因为所有共产党原则上都是极权的。圣地亚哥·卡里略领导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在过去几年内，竭力避免给人是一个极权的不民主政党的印象，然而，大多数西班牙右派不信他们这一套。同“社会主义”一词相反，“共产主义”一词在西班牙军队中，尤其在上层，以及在大多数公民中，依然是一个刺激性的字眼。让共产党处于地下，使之成为一切不满分子藏身之地，使之可能与极左分子结成同盟，这更富有危险性，这一点西班牙政府比较聪明的人也是知道的。在自由选举中，共产党人在西班牙极可能依旧是一个较小的政党。同他们在民主联盟里合作的铁尔诺·加尔班估计能有百分之八的选票。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认为，他的党将会得到不满五分之一的选票，虽然西班牙国内的好战党员数目大致已达十万。尽管有严酷的迫害，在所有西班牙社会团体中，都还有共产党人：在产业工人和知识界，尤其在大学里，在律师，记者，演员和教师中势力最强。在几家优秀的西班牙周报里，大多数编辑同情共产党，计划出版新的杂志，这些杂志应该合法出版，分期分批地成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在几乎所有西班牙的日报里，在政府经营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编辑部里都有共产党员。在政府机构里——当然是绝对秘密的，在国

家控制的工会组织“工团”里，在几乎所有的政府各部里，包括在很高的职位上，也都有卡里略党的党员。在产业工人中，十年来共产党的追随者增多了，这要特别归功于参加共产党的工人的勇敢和献身精神，也要归功于党对罢工者的财政资助。共产党的工人领袖参加最积极和最有影响的非法工会“工人委员会”。在关于保卫工人的利益和权利的合作问题上，共产党人和天主教牧师也在进行初步接触。在工人委员会里，共产党人与工人牧师紧密合作，有些牧师经常为共产党提供教会场所作集会之用。在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有几个信仰虔诚的天主教徒，其中有在西班牙闻名的作家阿方索·卡洛斯·科明。在“工人委员会”里，超越于党派利益的天主教工人领袖，往往比他们的共产党同事，采取更为激进和更为革命的态度。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世界》被复制后，送给无数的西班牙家庭。共产党在巴塞罗那省力量最大，象在整个加泰罗尼亚一样，它在那里也叫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其次是在阿斯图里亚，在马德里，再其次是巴斯克地区；在诸如塞维利亚和巴利阿多里德等城市这样一些新兴工业区，以及在安达卢西亚的若干省里的农业工人中，它的重要性也日益增长。西班牙共产党虽然自1939年以来一直处于地下，蒙遭严酷的迫害，还是西欧第三大共产党。最近几年，它对苏联和苏联的党进行了最尖锐的批评，这对一个处在地下因而也是贫穷的党，需要有特别的勇气。西共最明确地谴责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冒着莫斯科因此支持分裂党的风险。“俄国人想搞垮我的党”，不久前，圣地亚哥·卡里略在巴黎的一次谈话中还这样说。卡里略早在意大利党之前，就推行比较独立于莫斯科的路线。

库尼亚尔领导下的葡萄牙党的政策，从一开始就遭到卡里略的谴责。“请你们不要相信阿尔瓦罗·库尼亚尔，不管他现在装扮得多么民主，葡萄牙党的方法仍一直是十分东方式的”，1974年12

月他在里斯本的一次私下谈话中这样认为。几年来，卡里略就这样信誓旦旦地表示，他的党将遵守民主的议事规程，只通过选举进入政府。既然在可预见的将来，共产党人不可能成为西班牙最大的政党，于是他就寄希望于左派政党的可能的联合上。把“自由的协约”作为反对派反佛朗哥的共同纲领的尝试，是卡里略的主意，他至少参与负责创建民主联盟；很久以来，他就一直谈论着西班牙人的和解。1976年2月初，他对马德里《瓜迪亚纳》杂志说，革命是极不可能的，只有当专政继续着，没有别的通往自由的道路，才有可能革命。共产党人希望并坚信存在着其他和平道路。

共产党人在西班牙不可能很快就独揽大权，因此，他们竭力争取民主自由，使自己摆脱非法状态，这在策略上也是正确的。由于他们坚决进行反对佛朗哥独裁的斗争，共产党人在西班牙赢得了明显的声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将是一个选民大党，它在国家的重要机关和舆论机关拥有党员和同情者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说明它将会是一个选民大党。这一点卡里略是十分明白的；不然，他就不会被看作是西方所有共产党中最明智的首领。

西班牙共产党于1921年11月成立。它由两个从“社会主义工人党”分离出来的小组合并而成。几个党的领导人来自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工会，例如多年任总书记的何塞·迪亚斯。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个党一直只不过是一个分裂小组。1934年，它有两万党员。在1936年2月内战前的最后一次选举、也是迄今西班牙最后一次民主选举中，共产党人赢得左派二百六十七个席位中的十六个席位。党把这一结果看成是一大成功。在内战中，由于苏联的帮助，也由于自己的良好组织，共产党人大大地扩大了他们的地位和影响；一部份社会党领导人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因为他们感到后者的能力和作用在战争时代是必不可少的。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夺权斗争中，首先十分残酷地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工团主

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工会工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至少是西共的苏联顾问们——也不惜从肉体上消灭马克思主义工会工人党的人员；苏联秘密谍报人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上校，同共产党控制的军事情报机构军事情报局的西班牙籍成员一起，负责暗杀马克思主义工会工人党的头头安德雷斯·尼恩和国际旅的很多成员。共产党人1937年夏天在巴塞罗那进行的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内战中的内战”，杀死了四百人——大部份是无政府主义者——杀伤了三千人。内战之后，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游击队外，共产党的游击队也在山里坚持了数年。若干从国外派往西班牙的共产党领袖，身负重新组织党机构的任务；他们被警察发现并处决，他们是：1941年的克尼奥内斯；1943年的卡雷拉斯；1963年的格里毛。其他人，如作家豪尔格·森普鲁恩（化名为费德里科·桑切斯从事地下活动），在国内负责了一段时间后重新返回法国。在国外的党的领导人——尤其是直到1942年依然任总书记的何塞·迪亚斯和多洛雷斯·伊巴鲁丽，即“帕西奥娜丽亚”——经常遭到在西班牙工作的共产党人责备，说他们轻率地牺牲了很多党员。流亡国外的党的领导和在国内最困难条件下工作的共产党人之间，发生过严重的意见分歧。由于党的最高领导的粗心大意，在西班牙经常有共产主义小组落入政治警察手中。象克尼奥内斯这样一些党的烈士，由于批评当时的政治局，即今日的执行委员会，而被谴责为机会主义者并受到抨击。

1948年，党认为反政府的暴力斗争已毫无前途，遂放弃了这一路线。从那时以来，共产党人企图通过总罢工，或同其他团体包括资产阶级反对派团体结成同盟，通过和平道路，推翻现政权。这就使得党的领导被责备为是修正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并导致六十年代的多起分裂事件。1964年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当时费尔南多·克劳丁——党的第三位重要领袖，仅次于“帕西奥娜丽亚”和

1960年当选为党的书记的圣地亚哥·卡里略——尖锐地批评不断号召总罢工的毫无成就的策略，以及佛朗哥政权行将结束时党内公开采取的机会主义路线。克劳丁和费德里科·桑切斯（真名叫做豪尔格·森普鲁恩）也非难卡里略过去的错误，例如社会革命尚未成熟时就不必要地牺牲了很多好战的共产党人。卡里略从前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而克劳丁的资格要比他老得多。克劳丁和森普鲁恩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者，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来又被开除出党。不过实际上，卡里略接受了克劳丁和森普鲁恩的很多论点，基本上是越来越沿着两位被革出教门的人所开创的道路在前进。后来，建议这两人重新入党，然而他们拒绝了。克劳丁是一部国际共产主义标准著作的作者，今天又生活在马德里。他象长篇小说作家和世界著名电影剧本作者豪尔格·森普鲁恩一样在1976年初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那时以来，西班牙共产党越来越坚决地宣布赞成在西班牙实现多元民主。应该经由政治和社会民主的阶段，达到社会主义。要求对一切生产资料实行监督，然而不一定要实现国有化。关于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西共领导叫得比其他党都响。根据正式材料，西班牙共产党依靠自己党员的党费维持财政开支。事实上，这类党费满足了开支的大部分，但是，人们私下从党的领导人那儿得知，西班牙共产党也得到几个兄弟党（即意大利的党，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他们由于坚持独立自主而激怒莫斯科）的资助。西共在犹豫了一下之后也接受了法国人的支持，而且也获得古巴人的援助，这主要可能是由于两党有着紧密的友好关系。当然，近来捐赠和党费大大增加，因为收入不坏的西班牙人在“党”的成员中的数字不断增长；在西班牙的很多地区，如果人们谈到“党”，那么，指的总是共产党。

圣地亚哥·卡里略,同时是共产党人和 社会民主党人吗?

西班牙政治警察的头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次指责共产党是一切可能发生的暴行的教唆犯。“然而我并不想断定,说唐·圣地亚哥总是知道这些罪行的。”他小心地补充说,而且在党的总书记的姓氏前面冠以“唐”的尊称。共产党人唐·圣地亚哥,也许正是由于政府的宣传丑化了他的党员,因而在西班牙才出了名。1976年2月初,在君主政体下,发生了首次新闻检查,原因是《瓜迪亚纳》杂志发表了卡里略的长篇答记者问。西班牙人不许读这篇答记者问,倒不是因为卡里略特别恶毒地攻击了佛朗哥或他的接班人们——而是可能因为他发表了一些十分合情合理的看法。如果西班牙人能够把这位共产党领袖的答记者问,同他们的总理阿里亚斯的纲领性演说比较一下的话,他们肯定不会有别的想法。而只会认为卡里略是一位更为聪明的政治家。圣地亚哥·卡里略1914年生于阿斯图里亚的希洪;阿斯图里亚是一个一直保持着生动活泼的革命传统的省份。他父亲文塞斯劳·卡里略是工人,后来当了议员,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位很有影响的政治家。圣地亚哥·卡里略十八岁时就当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总书记。1934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并。合并前的谈判,社会主义者方面由卡里略率领,共产主义者方面由克劳丁率领。三十年之后,卡里略把克劳丁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开除出共产党。1936年年底,卡里略转入共产党,同他一起转入共产党的还有社会主义青年团主席团的半数成员。内战期间,卡里略被任命为马德里城的公安特派员。1954年夏天民主联盟成立时,政府掀起一场反对共产党总书记的气势汹汹的运动,谴责他应对枪杀无数政治犯(即所谓帕拉库埃略斯的死难者)负有罪责。政府没有文

献材料可资佐证。卡里略冷静地回答对他的指责：“罪行？是的，在佛朗哥分子威胁性的进军之前，我下令从监狱里接走政治犯，运往巴伦西亚。在我已管不到的马德里城外，不受控制的极左派势力掌管运输，枪杀了犯人。人们可以责备我没有派一个连队把犯人护送到巴伦西亚。但是，我们在马德里需要一切部队来保卫首都；在那些日子里，除了通往巴伦西亚的公路外，佛朗哥的军队包围着整个城市。”不管怎么说，这也许是内战中无数再也无法确定责任的暴行之一。

左派在西班牙失败之后，卡里略首先到法国，然后到苏联，美国，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又在巴黎。他成为党的最有影响的组织家，五十年代初期，与克劳丁一起，遭到诸如比森特·乌里维和恩里克·里斯特尔这样一些很有威望的内战时代的老共产党人的攻击。赫鲁晓夫在苏联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开始非斯大林化，从而拯救了卡里略和克劳丁。“帕西奥娜丽亚”早已预感到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里将刮起新风，她撤销斯大林主义者乌里维在党的执委会——设在巴黎——的职务。1968年，当仅次于卡里略的主席团里最有影响的成员里斯特尔和加西亚仰仗苏联的帮助，想推翻卡里略时，“热情之花”多洛雷斯·伊巴鲁丽，在犹豫了一下之后，决定在激烈的权力之争中支持总书记。一个苏联外交官和情报人员在稍后的一次私下谈话时公开承认，莫斯科是里斯特尔的对立党的接生婆。期间，苏联党的领导看到里斯特尔小组的失败，佯装仿佛早已忘怀了这件事。相反，卡里略并没有忘记苏联人当时的分裂尝试。“我们确实不想在西班牙实行人民民主制度。除了南斯拉夫外，整个东欧的共产主义是红军的作品，因此理所当然地要受其控制。”今天，卡里略在党内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在上一次选举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时，几乎只有卡里略的人当选。现在西共总书记在巴黎流亡，他有机关公务用车

和随身保镖。在蓬皮杜时代，警察还跟踪他，他有时不得不藏匿起来，在一些共产党郊区市长保护下，他的确是非法地居住在法国。早在佛朗哥逝世之前，“唐·圣地亚哥”就在巴黎接见西班牙的著名政治家，包括很右的人；他们也想详细了解一下，卡里略有何计划，他究竟是何许人。

党的名誉主席多洛雷斯·伊巴鲁丽在1976年1月庆祝她的八十寿辰。寿典在罗马举行，很多宾客来自西班牙。在她青年时代，这位巴斯克矿工的女儿，由于热情洋溢的演说天才，得了个外号“帕西奥娜丽亚”，即热情，因为它还有“热情之花”的意思，人们——尤其是党内同志——也乐意用它来赞喻她的牺牲精神。多洛雷斯·伊巴鲁丽曾生活在莫斯科，不加批判地和别人一起推行了斯大林主义，然而后来又转入党的改良主义一翼。她不仅在西班牙共产党人中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已经被看作世界共产主义的传奇式英雄。

加利西亚人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和知识分子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是总书记的亲密顾问，在执委会里起着重要作用。伊格纳西奥·加列戈至少有一个时期是第二号人物，他往往比卡里略采取更正统的立场。在国内，路易斯·卢西奥·洛瓦托和罗梅罗·马林是最重要的人物中的两位，还在佛朗哥统治下就被捕了。洛瓦托供认自己是执委会委员，1972年，被判处二十二年监禁。内战之后，他已经在狱中度过了十九个寒暑。西蒙·桑切斯·蒙特罗一般都在马德里作为党的代言人出现；1945至1975年之间，他被囚禁了十五年。加泰罗尼亚共产党总书记格雷戈里奥·洛佩斯·赖孟多经过了漫长岁月的地下活动之后于1976年初首次公开露面。新闻记者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圣路易斯伯爵——主要在工人委员会里活动，在党内被看作是有前途的人物。

六、非法工会——工人委员会 及其它组织

政府控制的正式工会机构是西班牙转变为民主国家的最大障碍之一。只要西班牙没有自由工会，它将不可能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极右分子，尤其是长枪党出身的佛朗哥分子，特别卖劲地企图挽救现在这种垂直式的工会体系“西班牙工团组织”，而它终究是等级国家的最后残余之一。因此，除了在地下逐步重新恢复从前的社会主义工会和无政府主义的工会组织外，也产生了新的工会——当然也是非法的，受到政治警察的迫害。五十年代末期，“天主教行动工人兄弟会”的成员们，成立了“工会工人联合会”。工会工人联合会在几年之后，就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和非教派的工会，为若干国际工会组织和设在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所承认。工会工人联合会是西班牙三个重要的自由工会之一，与工人委员会和工人总同盟齐名；在巴龙的领导下，工会工人联合会在“伊比利亚社会主义大会”里，在政治上同一些地区性社会党合作，同样地，这些政党既不属于论坛，也不属于联盟。最有成就的工会组织是工人委员会。它的第一个宣言产生于1966年；四个想把这个宣言递交给当时的劳动部长的工人遭到逮捕，其中就有马塞利诺·卡马乔。

受到敬仰和尊重的，被捕次数最多的

马塞利诺·卡马乔

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马塞利诺·卡马乔主要在狱中度过。国王登基实行大赦，他才获得自由，随后又被捕，拘留几天，其

原因只有警察知道。获得释放之后，有好几个月，卡马乔是西班牙最大的新闻人物之一。他参加的讨论会的听众会比任何别的集会都多。他在加泰罗尼亚的几天里，新闻记者开着录音机，寸步不离地陪伴着他，唯恐漏掉唐·马塞利诺的一句话。很多工人已经尊敬地称呼他唐·马塞利诺了。很多他的政治对手也尊敬这位活跃的白发苍苍的铣工。他出生于老卡斯蒂利亚的索里亚的一个小村。当他由于从事工会活动被控告时，他所在公司的董事长在法庭上为他辩护。据起诉书称，他所在的公司是他煽动工人进行破坏活动的场所。在后来全部案件中华金·鲁伊斯—希门尼斯都是卡马乔的律师。鲁伊斯—希门尼斯后来成为一个左派天主教政党的主席，当然不再担任他那著名的委托人所在公司的董事长。工人委员会往往被称为共产党工会。对佛朗哥时代的法院来说，它们是“西班牙共产党分店”，对君主政体的内务大臣弗拉加·伊里瓦尔内来说，它们则是“共产党的工具”。卡马乔这样评论内务大臣的论断：“弗拉加是不对的。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毕竟是我，而不是弗拉加先生是工人委员会的共同创始人。在工人委员会里，有各种不同政治态度的工人代表：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左派基督教民主党人，卡洛斯党人，也有比共产党还左的人和很多无党派工人。当然，各政党有某种影响，这种影响是同这些政党在工人运动内部和对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影响相一致的。然而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工会成为一个政党伸长了的臂膀的话，对工会本身是非常危险的。是的，在工人委员会内部，我们不隐瞒我们的政治态度，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态度写在自己的额头上，因为我们首先是工会工作者，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活动在工会里面。”同马塞利诺·卡马乔和至少是工人委员会里最有名的领导人、也许是大多数的领导人最为接近的党，是圣地亚哥·卡里略领导的共产党——这实际上并不是什么秘密。同样地，在工人委员会里也有一些领导人肯定不是共产党

人，如工人牧师加西亚·萨尔维，或一千零一名与卡马乔一起卷入著名案件中的一二个工人。在这个国家的北部，在加利西亚，在桑坦德和在巴斯克一些地区，几乎没有共产党人位居工人委员会之首；相反，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卡里略政策的追随者却占统治地位。在这两个西班牙最大的城市里，近来共产党左派组织（革命工人组织，西班牙劳动党，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急剧增长。当共产党的压力太大时，往往产生分裂。某些工人委员会过分依赖西班牙共产党，也是建立工会工人联合会的原因之一。

对卡马乔来说，工人委员会是崭新的工会形式。它们是在禁止自由组织任何工会的时代由工厂里的工人大会自发产生的。因此，工人委员会是从前的“工人代表会”和古典的工会组织的综合。在工人委员会里，官僚主义化的危险性要比现时欧洲的工会小得多。参与决定生产的节奏以及以后参与决定投资的权利，也是工人委员会奋斗的目标。不过，在这过程中，应当同基层组织，即各厂的大会和委员会协商，基层组织应该拥有共同决定权。

除了卡马乔外，胡利安·阿里萨，爱德华多·萨博里多，西普里亚诺·加西亚，阿道弗·皮涅多，也是工人委员会最著名的领袖。工人委员会赞成自愿联合为一个统一工会。这个工会可以兼容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而又不必完全放弃各自的特性。“然而，象葡萄牙共产党和它的朋友们那样，用法令建立统一的工会——这个我们不干，而且也搞不好。”无论如何，马塞利诺·卡马乔就是这样讲的。

七、军人——依然是实权派

教会和军人是昔日佛朗哥独裁的最强有力的支柱。直到独裁者逝世时，军队依旧如此。君主政体政府里的军人们，试图阻止哪怕是谨小慎微的自由化的努力——而且往往获得成功。将军们是佛朗哥给他的继承者们遗留下来的无数抵押品之一。西班牙的军人们不想自己去搞政治，然而他们想在一切政治决定上有发言权。君主政体首届内阁的第一副总理德圣地亚哥—迪亚斯·德门迪维尔陆军中将在他被任命不久，就发表政治演说，向极右派保证，西班牙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他显然感到自己是极右派的代言人。佛朗哥政权委托军队两项重要任务：“在同别国可能的冲突中保卫国家；对内，保卫宪法规定的秩序。”从来没要他们去执行第一项任务——就整体而言，他们也是被佛朗哥挑选出来主要为完成第二项任务的：保卫专制制度。仅仅是一支单一政治方向军队的存在，就是佛朗哥对付政治对手的最好威慑武器。军人们通过军队编制的警察部队《民卫队》和《警卫队》，通过审判政治犯的军事法庭，明确地接受内政的任务，甚至往往接受最不讨人喜欢和最肮脏的工作。佛朗哥死后，将军们感到自己是宪法所规定的秩序的保障者，他们立即要求，只有全民投票才能修改宪法法令，这样一来，就连最畏惧缩的改革都被大大地推迟了。

西班牙有一千二百多名将军，他们大多数政治上属于极右派，或者至少是信仰笃诚的佛朗哥分子。很多人没有受过多少政治训练，陆军将领和海军上将们的整个知识水平都不高——几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除外。所谓自由的将军——最有名的是曼努

埃尔·迪埃斯—阿莱格里亚·古铁雷斯——只是少数，他们大多属于总参谋部。所有的将军都参加过内战，很多人参加“蓝色师”，同纳粹德国并肩反对过苏联。当然，正是那些作为年轻军官在“蓝色师”呆过的将军们才是受过最良好教育的。他们在世界大战之后经常出国，很了解其他西方国家部队，并且由于他们对世界有所了解，所以一般都已不再属于最右翼。西班牙军队的领导由这么一些陆军将领和海军上将组成，他们参加起义时是青年军官，立过效忠的誓言，参加过右派的暴动。这在他们那儿根本不存在任何良心谴责的问题；他们坚信，归根到底是极端混乱的共和国背叛了自己的原则。然而，也许正因为他们都参加过暴动，所以他们十分看重“部队团结”的价值。怀疑这种坚如磐石的团结，已被大多数军人看成是罪恶。因此，佛朗哥的末年，当年轻的中级军官对将军们，尤其是对独裁政治提出批评的时候，军队的最高领导作出了十分严厉的反应。

葡萄牙“武装力量运动”反凯塔诺独裁的政变成功，使西班牙的将军们感到不安，尤其是因为相当多的西班牙军官开始对葡萄牙事件发生兴趣，有几个人还同葡萄牙“运动”的领导成员建立了接触。但是在西班牙，永远不能期待会发生以葡萄牙为榜样的那种暴动；西班牙的军官不必进行殖民战争，他们不存在着象他们的葡萄牙同行所面临的良心问题。西班牙人不必把士兵拿去送死——为了一次人人都知道是打不赢的战争。“民主军人联盟”的军官们——九人被起诉，一个逃往国外，其余的经过数月监禁之后又被释放——从未计划过政变，他们充其量只是想防止武装部队成为极右派，成为“碉堡”用来反对民主和民主党人的工具。被控告的军官都经常同四个以上的伙伴相会，对政府的政策发表批评意见。在西班牙，四人以上的军官集会必需经过有关上级批准。在1976年春天，“民主军人联盟”拥有五百名会员；此外，至少还有同

样多的同情者。西班牙武装力量拥有二万五千名中下级军官。从尉官到少将之间的大部份军官，主要对技术有兴趣，而对政治则兴趣乏乏；诚然，同将军们相反，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人同情极右派。阿里亚斯政府违背当地居民的意志，把西属撒哈拉交给摩洛哥，这在军队内部引起了严重的信任危机。驻扎在撒哈拉的军官在此之前曾受政府委托，在土著居民中宣传撒哈拉独立。佛朗哥政权的全部机构中，军队被认为是最为廉洁奉公的。西班牙军官在公众场合的举止是十分文质彬彬和谦恭有礼的。军事法庭在政治审判案中，进行了很多严厉的、按法治国家的原则来看是站不住脚的判决，这就玷污了军队的名誉。很多军官反对军事法庭有权审判平民政治犯。另一些军官则干脆把坐镇法庭看成是他们军事任务的一部份，驯顺地作出需要他们作出的判决。对于政治警察或民卫队进行严刑拷打的供词，军人们的处理比民政特别法官们要宽大得多，而军事法院对案件的判决却几乎总是要严厉得多。

1976年，海陆空三军共有三十万人；陆军二十二万，海军四万七千五百人，空军三万三千五百人。此外还有准军事的警察部队；民卫队（乡村警察）整整九万人和警卫队（城市武装警备队）四万人，它们受陆军将领指挥，然而调动它们得经过内政部同意。

西班牙的国防开支比大多数欧洲国家要少一些。当然，近来职业军官的薪俸显著提高，现在，月薪在二千西德马克（一个尉官）和四千西德马克（一个将军）之间——其他补贴计算在内。

西班牙分为十一个军区，每一个军区任命一位上将作为司令官，每省除了文职省长外，也有一个将军作军事总督。除了伊尼埃斯塔·卡诺，加西亚·雷布尔和佩雷斯·比尼埃塔——三人都是国民运动委员会和议会的成员——不再积极活动外，民卫队头头安赫安·坎帕诺，政府的第一副总理德圣地亚哥—迪亚斯·德门迪维尔，陆军大臣阿尔瓦雷斯—阿雷纳斯，总部设在马德里的第一

军区司令官科洛马·加列戈斯，总部设在塞维利亚的第二军区的司令官梅里·戈尔东，这些人被认为是最有影响的极右将军。迭斯—阿莱格里亚两兄弟，空军大臣卡洛斯·弗朗科，总部设在巴利阿多里德的第七军区司令官维加·罗德里格斯和休达的司令官古铁雷斯·梅利亚多等人被看作是比较主张自由的将军。

八、西班牙的教会——不再是政权的支柱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西班牙人声称自己信仰罗马——天主教。但是，常做礼拜的天主教徒的百分比要小得多，而且各地区十分不同。在纳瓦拉省，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做星期天的礼拜，在另外三个巴斯克人居住的省份里，几乎有同样多的人做星期天的礼拜；在巴塞罗那省，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在马德里和西安达卢西亚（塞维利亚，加的斯，韦尔瓦），也不会多多少。在这个国家的南部和东部，本世纪的前半叶，首先是下层人民对天主教会疏远了，在农村也一样。上教堂做礼拜是殷实人家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大多数居民在洗礼、婚礼和丧葬的时候很少需要牧师。在安达卢西亚或穆尔西亚城乡，牧师属于绅士，生活完全脱离多数居民。在老卡斯蒂利亚和巴斯克地区，社会差别一向没有这么显著，在内战前，牧师也紧密地同全体人民生活在一起。在这些地区，共和国时代和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发生过反牧师的暴行——在安达卢西亚，新卡斯蒂利亚和穆尔西亚，却几乎天天发生此类暴行。在新卡斯蒂利亚或安达卢西亚是“赤色分子”杀害牧师。而在巴斯克地区，大多数天主教神职人员是被那些为“上帝、教会和祖国”而战的佛朗哥军队所枪杀，因为他们同人民一起站在共和国一边。内战之后，与军队的情况相似，天主教会长期在政治上是一个忠于政权的统一阵线。但是，同军队相反，教会在佛朗哥逝世之前很久，就同现政权及其政策保持着距离。梵蒂冈第二次宗教会议之后，从教坛上就很少听到对佛朗哥和他的政策的歌功颂德。不再只是个别牧

师，而是官方教会，甚至是主教上层，开始关心工人灵魂之救助，也开始关心工人群众的凡俗问题——社会问题。主教们搬出他们的宫殿，居住到工人区去。1968年，西班牙主教会议第一次要求工会自由。牧师们和反对派组织的合作——在巴斯克地区特别经常出现这种合作——使佛朗哥国家的警察和司法当局面临着难题。西班牙和梵蒂冈签署宗教条约之后，未经有关主教的批准不能逮捕神职人员，也不能对他们起诉。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警察和政治司法部门愈来愈把这些规定置之脑后，而这又重新导致马德里和梵蒂冈之间的严重冲突。1974年3月，阿里亚斯·纳瓦罗的第一届政府因为不喜欢毕尔巴鄂主教的一次布道，企图粗暴地把这位教长驱逐出西班牙，教廷和以天主教为国教的西班牙之间的关系达到了最低点。

从前，西班牙的反教会主义总是来自左的方面——至少在西班牙民族天主教还控制着教会领导权的时候是这样。民族天主教曾经认为民族的含义与教会的含义是一致的。马德里民族天主教的极右牧师文南西奥·马科斯，不久前对他的主教说：“我首先是西班牙人，其次是长枪党人，再其次才是牧师。”民族天主教失去了大多数西班牙主教的宠爱之后，教长们和他们的教会受到极右派的攻击。现在，右翼激进派及尼亚尔和希龙的党羽，把要求吊死主教或枪毙主教的口号制成横幅标语，扛着走上大街，走过教长们的官邸门前，举行示威。

人们可以从西班牙的天主教看到这个国家的整个政治状况：有以昆卡的主教为首的右翼激进的兄弟会，有在共产党领导岗位上工作的天主教徒，有同社会革命暴力组织巴斯克与自由党合作的巴斯克地区的牧师，真是五花八门，花色齐全。实行新的礼拜仪式而同时传播进步思想的基层教区受到了尊重。在巴斯克地区——但不仅在那里——牧师们经常从教坛上要求他们的善男信女

们，“揭竿反抗不公正的国家”，或把政治警察驱逐出弥撒典礼，他们猜得很对，这些家伙并非出自宗教原因，而是由于职业缘故，前去参加礼拜的。在主教会议里，批评政府的“中左派”和社会政策上持进步主义的“左派”加在一起现在构成为可靠的多数，而这期间，极右派已经变成极少数了。极右派的代表，除了昆卡的主教格拉·坎波斯外，还有萨拉戈萨的大主教坎特罗，阿利坎特—奥里维拉，奥伦塞和瓜达拉哈拉—锡根萨等地的教长们。西班牙总主教、托莱多的红衣主教马塞洛·贡萨莱斯经常袒护他们。属于称为“进步主义”一翼的有帕伦苏埃拉（塞哥维亚），阿尔加亚和塞铁恩（圣塞瓦斯蒂安），门德斯和拉劳里（潘普洛纳），阿劳霍（蒙多涅多—埃尔费罗尔），贡萨莱斯·莫拉莱霍（韦尔瓦），奥塞斯（韦尔卡），副主教伊尼埃斯塔（马德里），以及主教会议的秘书亚涅斯副主教。塔兰孔红衣主教（马德里）和胡瓦尼红衣主教（巴塞罗那）以及阿尼奥维罗斯主教（毕尔巴鄂），往往支持“进步派”。在今日的西班牙，教会政治是整个政治的高级流派。

穿着红衣主教袍子的政治家维森特·

恩里克—塔兰孔

1971年，维森特·恩里克—塔兰孔还是托莱多大主教，当他就任西班牙主教会议主席时，他不得不负责西班牙教会内部好几项重要的发展工作。他不得不把已经开始了的教会脱离政府的运动进行到底，达到教会和国家完全分离和实现使徒业务现代化。也许没有任何别的人能比塔兰孔更适于完成这些任务，他是一个具有伟大政治天赋的教会人物。很多西班牙人认为，他们是他们国家里最聪明的政治家，因此，对他披上一件天主教僧侣的法衣感到遗憾。塔兰孔在教会内部遭到来自左的方面的攻击，而更经常遭受来自右的方面的攻击。然而，这位红衣主教成功地防止了教会的

破裂。塔兰孔 1907 年生于地中海边的布里亚纳，在一个乡村的小教区当了近二十年的主教。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他从事研究，撰写了关于神学问题和使徒实际业务的书籍。1964 年，他已训练有素，前来就任革命的阿斯图里亚的大主教职位。塔兰孔秉性朴实；他的开诚耿直使他能很容易同人民接触。他是一位人民喜欢的主教，一位最有能力和最令人敬畏的教会政治家和外交家——这些品质的结合，极其难能可贵。恩里克—塔兰孔总能找到他的杰出同事来完成他的艰难使命，其中有他的一些副主教，而尤其是聪明的、政治上有经验的基督教徒何塞·玛丽亚·马丁·帕蒂诺。

九、在专制下艺术家和科学家的 有限自由空间

佛朗哥死后没几天，那时还没有新政府，成千马德里人集会，参加招待电影导演胡安·安东尼奥·巴尔登的晚宴。巴尔登在多年前就拍摄几部优秀的、至少对西班牙是重要的电影。巴尔登是“马克思主义者”，人们在西班牙还不得不这样说，因为不许他们说得更确切些。晚宴成为政治示威，刚刚释放的政治犯，被禁止的左派“西班牙民主联盟”的反对派政治家和塔马梅斯教授，都在会上发表演说。与会者高呼“自由”与“大赦”的口号长达十分钟，打断了演说者们的讲话。穿便衣的政治警察站在大厅里，不过他们没有干涉，没有把他们的穿制服的同事叫来，取缔这个用政府的语言和司法规程衡量是非法的和颠覆性的群众集会。

在西班牙知识分子和政治几乎一直是纠缠在一起的。乌南穆诺和奥尔特加一加塞特也许是本世纪前半叶西班牙哲学家中最著名的两位，他们一再发表对日常政治的看法，撰写宣言，竞选议员。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被放逐和流亡。当然，如果知识分子从事被禁止的政治活动，他们要比工人、职员或其他可尊敬的职业代表，少遭苦难。这一点在举行巴尔登招待会时又得到了证明；因为与此同时，警察正在毫不手软地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和举行政治示威的人。佛朗哥的最后一届政府，是以禁令、逮捕和特别活跃地挥舞橡皮棍棒而告辞的。

政权和知识分子，是一个陈旧的、谈论很多的、最好保密的问题，是一处没有愈合伤口，触动它，马上就会引起这个政权有教养

的政治家们激烈的、往往是无法控制的反应。这个政权——佛朗哥的独裁制度和这个独裁制度所遗留下来的一切——没有使用知识分子。但是，这个政权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蔑视知识分子的；它在知识分子里没有朋友，自己也感到是一种缺陷。况且，也曾经有过为这个政权而献身的知识分子。诚然，这个政权当时还不仅仅是“佛朗哥主义的”——亦即思想意识空虚，精神境界很低，因为它纯粹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

在西班牙佛朗哥主义早期，长枪党有一个对知识分子有吸引力的领导人——虽然有点昏头昏脑，他就是被共和党人枪杀的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莱恩·恩特拉尔戈，安东尼奥·托瓦尔这伙人既是长枪党人，又是知识分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就成为佛朗哥及其政策的对手。佛朗哥国家在最初几年之后，就放弃他原来的思想基础，也就是说，再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需要捍卫了。这事对西班牙知识分子来说，也许是幸运。这样，他们不必被迫捍卫某些特定的原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当时西班牙狂热反动的天主教会，曾企图填补意识形态的空白。在这个政权最初的公开法西斯年代之后，国家把书刊检查和其他控制知识分子的机构，大部份交付给教会的人员，他们满怀热情地献身这一任务。

这个政权——西班牙的政治领导，曾经努力争取脑力劳动者的好感，虽然实际上总是一无所获。六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写信抗议政治警察虐待罢工工人。当时政府的情报和内务部长弗拉加·伊里瓦尔内，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对这封抗议信作出反应。他慌慌忙忙地企图论证，很多签字者无权自称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这位部长认为——出版的书籍和文章太少了。西班牙的艺术家、科学家和作家们再次看到自己受到他们所不欢迎的政府的严肃对待。

执政者对知识分子突然作出感情冲动的反应，是出于变态的自卑感。西班牙共和国是一个教授的共和国，知识分子的共和国——这是它的幸运，或者可能是它的不幸。国内战争共和国失败之后，几乎所有有名望的精神生活的伟人都离开这个国家。很多作家和科学家被内战的胜利者、被佛朗哥的新国家投进监狱；另外一些人被迫长期沉默。这个政权曾长期企图掩盖它也感到丑恶的知识分子的“出埃及记”。由于缺乏比较好的，三流人物就被捧了出来。佛朗哥的最后几年，曾经多次试图用宽宏大量的方法，把西班牙艺术和文化界的最有名人士，请一部分到国内来。但是，毕加索和卡萨尔斯葬身异乡，森德尔只有一次短期回国探望，布尼乌埃尔仅仅是定期地在佛朗哥的国家里工作。

内战之后，也还有很多科学家、艺术家和政论家到国外去，因为在国外有更多的工作自由和言论自由。然而大多数人留在西班牙，一步一步地争得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在西班牙，作家和科学家如果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历来要比其他多数国家有更多的听众，这对他们是有利的。因此，这个政权也不敢全面丑化知识分子。佛朗哥国家的代表永远不会异想天开，用联邦共和国某些政治家的方式，普遍地给作家们起上一个牲畜的名字，把他们比作狂吠乱叫的狗。

很多西班牙的知识分子，感到争取更大的自由也是自己的义务。在游行示威，罢工和抗议政府的暴行的行动中，他们大多数都站在最前线。有时这种行动甚至取得了成果，例如1970年臭名昭著的布尔戈斯案件，当时由相当多的作家、新闻记者、牧师和大学教授发起的抗议运动，拯救了六个巴斯克青年的生命。

反对党和工人运动也希望，由不太冒险的知识分子来充当反抗的先锋队和突击队。政治上肩负了使命，可能会妨碍某些重要的科学和艺术作品的产生。但是，在漫长的独裁统治的岁月里，很

多知识分子对政治感到厌倦——退而不问政治，作为对长期没有取得政治成果的反应。然而，大多数人依然默默地同情昔日的战友；他们至少还一起在抗议信上签名，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个政权本身曾长期试图用技术贵族来取代它所没有的知识分子，向西班牙人民颂扬技术贵族，把他们吹捧为我们时代的现代化知识分子。在经济急剧增长和工业化的年代，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在天主教凡俗组织上帝事工派里可以找到许多人才。上帝事工派概念的精髓，主要是他们能够进行目标明确的有益的思维，能够对财政成就作出加尔文教派式的鼓动人心的高度评价。精明强干的、仅限于自己领域的专门人才——明达事理的、一般都非常渊博的脑力劳动者——对国家经济的上升无疑作出了值得注意的贡献。只是他们无法取代具有活泼自由思想的、视野超出自己范围的和采取明确立场的知识分子。机敏的技术贵族们，在政治和科学的重要岗位上，大多数无所作为；他们很快就丧失了威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丧失了影响。

除了短暂的狂热革命期和充满希望的突进时期，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在政治的权力机构里进行合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一旦一个政权开始稳定，他们就站在外面，保持着距离，持批判的、等着瞧的态度。俄国革命驱使它的诗人们自杀，许多艺术家流亡和进入集中营；希特勒德国把他们赶去见死神或驱逐到国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和其他革命一样没有知识分子参加策划和进行行动；他起初还能耐着性子，几乎有十年之久允许知识分子持批评态度，甚至离经叛道。然而后来，知识分子在古巴不得不缄默不语。

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在漫长的岁月里，根本不许他们发表批评意见。后来，他们被限制在一个艺术和科学的特别居住区里，政治上属于一个没有成果和不会引起共鸣的反对派，因为不许他们同

人民接触。在佛朗哥时代的最后十年，政府乐于利用这期间居住在特居区的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作为招牌拿到国外去炫耀。作为交换，它不要求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作出让步；因此，比如专为参加国外举办的电影节而拍摄的影片，完全可以包含批评——虽然不很直接的批评——西班牙政权及其政策的内容。这样一些作为西班牙正式送去参加电影节并获奖的影片，例如布尼乌埃尔的《维里迪亚娜》，后来禁止在西班牙的电影院上映。

最后，政府也从财政上支持出版社出版西班牙左派的经典作品。大学讲师和学院院长，大多数是左派作家，同他们的长枪党前任们相反，他们至少对自己的工作在行一点。导演巴西略·马丁·帕蒂诺在同一天里收到两封政府公函。在一封信里通知他，说他很荣幸，将用他的电影《给贝尔塔的九封信》代表西班牙参加一个大狂欢节；在另一封信里要求他，在某一天不呆在自己家里，因为国家元首佛朗哥的汽车计划从他住宅窗外的大街上驶过，而他，可敬的电影工作者帕蒂诺，由于持有批评政府的思想，对西班牙的元首和三军大元帅的安全是个危险。

佛朗哥政权的文化政策大多数是自相矛盾的，往往是荒谬的。然而在最后几年，允许知识分子积极活动，至少没有阻止先锋派艺术作品的产生，尽管这类作品与支撑着这个政权的原来的文化理论和艺术理论是针锋相对的。

因此，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有一种起初对外国来说是令人惊讶的现代绘画，也有一种包括很多有趣作者的文学。西班牙电影不得不同政治困难和经济困难作斗争；在电影业里，官方喜欢制作相当浅薄的影片，批判现政权的青年导演则试图摄制更好的作品，两者之间多年来一直是泾渭分明的。除了电影，要数戏剧遭到的检查最严厉——其原因无非是由于演出能对聚集在一起的观众产生令人畏惧的直接而迅速的效果，由于执政者们过份害怕“公

共秩序会遭到破坏”。马德里依然一直是世界上戏院数目最多的城市之一。二十多个舞台，大多数没有国家补助，它们天天上演，主要是现代作者的剧作。同时，适应首都资产阶级观众口味的轻松的街头戏剧还一直占统治地位，虽然最近几年有文学价值的话剧比重不断地在增加。大多数省级大城市没有自己的剧团，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剧团，也不大去作访问演出。

大城市的音乐厅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当然，举行的音乐会也不太多。在安达卢西亚和其他有安达卢西亚移民的城区，安达卢西亚歌舞剧非常活跃，被用来抗议和批评一些日常小事。克里斯托瓦尔·阿尔夫特和路易斯·德巴布罗是现代西班牙作曲家，今天，他们的作品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现代音乐演奏会的节目。作家、画家和作曲家，在西班牙乐于结成集团，进行共同的事业——联合反对书刊检查和反对国家妨碍自由创作——往往也是结成社团的一个重要原因。

两个小组在当代西班牙绘画中起特别重要的作用。“道—阿尔—塞特”^① 1948年在巴塞罗那成立，这是西班牙内战之后超现实主义的重大突破。1957年，作家和画家在马德里建立“埃尔帕索”^②小组，这个小组把政治行动和艺术活动结合起来。它那轰动视听的宣言不但要求革新西班牙的艺术环境，而且要求革新社会和政治环境。“埃尔帕索”是咄咄逼人的，反对自矜博学，政治上是革命的。这个小组的二十个艺术家，既认为强有力的直接表达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也感到必须首先在他们的国家里，创造克服视觉艺术危机的条件。他们想避免使又一代即他们这一代的西班牙艺术家，再度被迫流亡国外。到国外去的正是上一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他们为西班牙的绘画再次争得世界荣誉：巴勃罗·毕加索，胡

① 西班牙语 Dau-al-set 的译音，意为“骰子的第七面”。——译者

② 西班牙语 El Paso 的译音，意为“道路”。——译者

安·格里斯，胡安·米罗，萨尔瓦多·达利等人，都是青年时代就从西班牙到法国去的。毕加索和立体派画家胡安·格里斯据说从没有回过西班牙。这一代的伟大雕塑家也葬身异国：1942年胡利奥·贡萨莱斯卒于巴黎；二十年之后，阿尔贝托在莫斯科逝世。

1972年早逝的曼努埃尔·米利亚雷斯也属于“埃尔帕索”小组，他是用明显不协调的颜色（黑鞋油、白石灰、红干血）在麻袋布上画裸体人物的艺术家。路易斯·费托的画色彩鲜艳，形式凝炼。多面手安东尼奥·绍拉同曼努埃尔·里维拉以及拉斐尔·卡诺加尔一样，由于参加“埃尔帕索”而闻名。拉斐尔·卡诺加尔经过了抽象画时代之后，优先选择暴乱的群众画面、城市场境和个别人物作为他的艺术内容。“埃尔帕索”成就卓著。在整整三年中——这个小组没有存在更长的时间——它的成员名扬四海。1958年在威尼斯艺术节上，来自西班牙的新抽象艺术使世人耳目一新。从那时以来，批评家们，艺术商们，收藏家和博物馆馆长们，经常拜访西班牙。在随后的年代里，很多西班牙画家，在圣保罗，东京，匹兹堡等地重要的国际展览会上获得大奖。

在巴塞罗那建立的团体“道—阿尔—塞特”几乎比同名杂志早成立十年。加泰罗尼亚人安东尼·塔皮埃斯和莫德斯特·奎克萨尔特属于这个小组。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和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胡安·何塞·塔拉茨也是加泰罗尼亚人，他是这个小组的中心人物。塔皮埃斯包罗万象的作品早就被认为是欧洲抽象画的一个顶峰。何塞普·吉诺瓦尔特也在巴塞罗那工作，他没有参加“道—阿尔—塞特”小组。他是由社会现实主义，经抽象派，达到西班牙新达达主义的。

除了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外，巴伦西亚也是一个重要艺术中心；“埃克维波纪事”的成员来自巴伦西亚。“阿普斯亚”是马德里的一个新团体，演员、作家、作曲家（阿尔夫特）、主要是画家结成了这个

团体。赫诺维斯也是“阿普斯亚”的成员，他象主要在国外工作的阿罗约一样，是由于他的政治上富有进攻性的绘画而闻名。巴斯克人阿古斯丁·德伊瓦罗拉参加政治活动而被囚禁多年。右翼激进派烧毁他的画室，他的许多画被毁。

爱德华多·奇利达也是巴斯克人，他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雕塑家。他有时也由于政治原因而遭受迫害。然而他在政治上的困难小一些，与此相比，他的重型铁塑像的国际声誉要大一些。在圣塞瓦斯蒂安附近奇利达的乡下锻工场里，现在生产着最昂贵的塑像。铁也是另一个巴斯克人、年纪较大的豪尔赫·德奥特萨最喜欢用的材料。与德奥特萨同代人的还有阿拉贡人巴勃罗·塞兰诺。他除了几何抽象雕塑外，还创作了一种以混乱的物体为对象的作品。他把“肠子、耳垂和犄角”称为一个周期，他想以此来表现我们时代的人生。

内战前就逝世的巴勃罗·加加略，近来又对很多雕塑家产生强烈的影响。诸如房屋的栏杆和无数介乎艺术和铸像之间的小雕塑，使欧塞维奥·森佩雷在七十年代出了名。画家达里奥·比利瓦尔瓦和生活在巴黎的何塞·奥尔特加，也在这些年月里出了名。在西班牙的建筑师中，费萨克和萨恩斯·德奥伊萨创作了引起十分重视的作品。萨恩斯·德奥伊萨以他的马德里“白塔”住宅钟楼而著称；何塞·路易斯·塞尔特以他在加泰罗尼亚的建筑而著称（在他的哈佛建筑前后）。在巴塞罗那的蒙特胡伊奇，塞尔特创作的、1975年落成的米罗亭，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现代博物馆之一。高迪是现代派和新巴洛克派的建筑师，他对加泰罗尼亚建筑师的影响再度增长。当然，在经济与对外交流繁荣时代的成百万新建筑物中，建筑学上成功的作品是货真价实的珍品。

内战的结束对西班牙文学意味着巨大的裂口，甚至可以说是万丈深渊。共和国年代是好长时间不会再有的西班牙文学繁荣时

代。1939年以后，最优秀的作家或者离开了西班牙，或者被打入冷宫。国内剩下的是二流作家。除了知识分子的精华出逃外，大部份出版业也消失了。早被遗忘的古董又被挖掘了出来。在战后初年，一种空话连篇的、突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题材的文学占了统治地位。这也是胜利者方面的趾高气扬在文学上的表现。任何形式的批评都具有颠覆性，都遭到了法律上的迫害。

但是，早在四十年代的前半叶，就出版了几部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其中有：卡米洛·何塞·谢拉的早期长篇小说《帕库亚尔·杜亚特斯家族》和直到五十年代末在西班牙还是禁书的《蜂房》，和卡尔门·拉福雷特的处女作、标题很醒目的《虚无》，它们坚决反对官方主张的文学倾向。这些小说是悲惨现实的写照，既有批判，又有冷静分析。伟大作家谢拉的后期作品，也属于本世纪用西班牙文写作的最优秀作品。

五十年代，长篇小说成为政治陈述的一种形式，因为在其中可以比在报章上发表更多的意见，因为在西班牙根本不存在民主国家进行政治讨论和政治活动的普通场所——议会和政党。当时在西班牙，比欧洲其他国家写出了更多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在称之为“客观现实主义”或“社会小说”的潮流中，出版了大量作品，而今天已经只有很少在文学上是有趣味的了；这些作品的作者，一般都很快就克服了“客观现实主义”的狭窄界线，或者从来没有完全受其束缚。安娜·玛丽亚·马图特的长篇小说（《最初的回忆》，《士兵夜哭》），拉斐尔·桑切斯—费洛西奥的长篇小说（《哈拉玛河畔》，《阿尔凡威》），路易斯·马丁—桑托斯的长篇小说（《沉默的时代》），胡安·戈伊蒂索洛的长篇小说（《同一性的标志》），米格尔·德利维斯，阿方索·格罗索和胡安·马尔塞等人的长篇小说，都不只是时代文献而已。

当代拉丁美洲用西班牙文写作的伟大作品优于西班牙作家的

作品，对这一状况的认识导致了某些西班牙作家的创作危机——随着岁月的推移，西班牙文的美洲文学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尤其在语言上。一系列从前的“社会小说”的作者，这期间已经坐在左派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里——这是他们一直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

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贡萨洛·托伦特·巴列斯特尔，何塞·曼努埃尔·卡瓦列罗·博纳尔德，胡安·贝内特，爱德华多·门多萨（《萨沃尔塔案件的真相》）和路易斯·戈伊蒂索洛等人，写作了艺术水准很高的叙事文学。很多抒情诗人也创作了政治和社会题材的作品；巴斯克人布拉斯·德奥特罗和加夫列尔·塞拉亚就是这样的诗人。受到书刊检查特别残酷压制的戏剧，在佛朗哥时代只产生少量的重要作品，其中有：安东尼奥·布埃罗·巴列霍的几个剧本，他在政府的监狱里开始写作；阿尔弗雷多·马尼亚斯的某些作品；阿方索·萨斯特雷的早期戏剧，他一再成为铁窗之囚。西班牙最聪明的剧作家费尔南多·阿拉瓦尔流亡国外；他还一直用西班牙语写作，但是，他的作品大多数都先是用法文刊印，在法国首次公演。佛朗哥政权行将结束时，西班牙人才开始见识诸如阿尔贝蒂，森德尔和马克斯·奥夫这些诗人的一部份最优秀作品——他们都是共和国时代就有良好声誉的作家。

在无数政治—文化周报上，文学批评占有广泛的位置。文学讨论是活跃的，对外国文学理论、潮流和倾向非常了解，这令人惊讶。用地区性语言，尤其是加泰罗尼亚语写作的作品不计其数；很多诗歌历来是用加利西亚文写的，近几年内，出版了一系列用加利西亚文写的长篇小说。有成就的作品相当快地就由地方语译成西班牙语。

关于西班牙电影艺术是如何产生的，两个教会正在争吵。现在没有把握确定，究竟是《善男信女们离开萨拉戈萨的皮拉尔总教

堂十二点的弥撒》，还是《桑斯牧师教堂的出口处》，是第一部西班牙电影；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教会——西班牙天主教会——随后就匆匆忙忙地关心起西班牙电影来了，这往往使电影创作人员感到莫大的遗憾，严重地危害着电影艺术本身。除了教会的监督和书刊检查外，内战之后还加上国家要求把电影当作它的宣传工具。

当费尔南多·卡斯铁利亚和何塞·玛丽亚·德阿雷尔萨这两位天主教长枪党人要求建立一个新的西班牙帝国，吞并非洲大部份地方时，也产生了帝国影院，产生了民族英雄主义的“帝国电影”。这类电影酷好叙述信仰天主教的国王们，叙述象上次内战中阿尔卡萨包围战的西班牙古今历史英雄业迹。国家元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为这类电影写了一部脚本，名曰《种族》。“帝国电影”在多数人民中间得不到好感。作为对它的反动，随之出现了“苦难电影”。这一名称同当时的西班牙现实接近得多。苦难影院的影片表现了贫民窟，大都会郊区的茅屋，贫穷的乡村和饥馑的农业工人。但是，影片提出的解决办法完全是家长式的。真正的社会批评，甚至对被压迫者有权造反表示理解，现政权和书刊检查都是不允许的。

首批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是由两位年轻导演摄制的，他们是路易斯·G·贝尔朗加和胡安·安东尼奥·巴尔登。起初两人合作，后来各拍各的。在漫长的岁月里，巴尔登和贝尔朗加是国内外电影工作者关心的仅有的两个西班牙名字。《欢迎，元帅先生》和《刽子手》是贝尔朗加的效果最佳的讽刺电影，他是非常阴郁而且典型西班牙式的“黑色幽默”的导演。很多年之后，贝尔朗加拍摄法国与西班牙联合制作的影片《大自然》，它是描写七十年代法国新爱情至上主义的，也许是最理智而同时是最富于消遣性的作品；这部影片在西班牙遭到禁映。巴尔登描写佛朗哥西班牙的大资产阶

级的受贿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一个骑自行车人之死》，《主要大街》)，在西班牙国界之处，也引起注意。

早在1955年5月，就举行过萨拉曼卡电影座谈，会议试图对1939年以来的西班牙电影进行清理和评价。结果表明，批评之诚实超出了想象。萨拉曼卡座谈指出西班牙电影：1.政治上毫无作用；2.反映社会不诚实；3.知识贫乏；4.美学上空虚；5.制片工业不齐全。萨拉曼卡座谈之后，人们也开始在电影杂志上重新回顾西班牙电影的一个有趣时代——第二共和国时代。当时路易斯·布尼乌埃尔等人在西班牙摄制电影，他们是一些在内战之后流亡到法国和墨西哥的导演。

西班牙政府终于也努力谋求另一种新的电影。情报部电影局开始对“艺术上完美的电影”进行资助，补助金额达到生产成本的百分之五十。国立电影学院在财政上得到十分优惠的照顾，政治上也比其他院系自由得多。电影学院造就了很多有才华的导演和摄影师。他们拍摄的影片，大部份被西班牙政府送到国际电影节去，得了奖，并经常在国外影院里放映和电视台里播送。

几家制片公司专门生产要求国家资助的电影，因而产生了所谓“新西班牙电影”，埃利亚斯·克雷赫塔是它的最有名的制片人，卡洛斯·绍拉是它的最具有国际成就的导演(片子有《狩猎》，《薄荷冷饮》，《乐园》，《安格丽卡表妹》)。导演巴西略·马丁·帕蒂诺参加过萨拉曼卡座谈。他的第一部故事片《给贝尔塔的九封信》，由于它的政治内容，在弗朗哥的西班牙，成为争论最多的一部影片。曼努埃尔·苏梅尔斯，米格尔·皮卡索，维克托·埃里塞，何塞·路易斯·博劳，曼努埃尔·古铁雷斯等人，都拍摄了一些得到知识分子好评的、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短命的“巴塞罗那流派”出了哈辛托·埃斯特瓦和华金·霍尔达。在他们的影片里——最成功的是《不只是严厉的但丁》——反映“现代”欧洲生活方式，也反

映加泰罗尼亚首府年轻而有钱的资产阶级左派的腐朽生活情调。

但是，政府通过它的补助法，一直控制着“年轻的西班牙电影”。给予电影有多大的自由，一般地取决于情报部里有关文化官员的思想方法自由程度。年轻的电影工作者反对政府家长式控制下的自由。若干年间，在西班牙有一种资金微薄的地下电影。但是，大多数地下导演，逐步进入商业电影企业。今天，在西班牙有相当多有才华的电影创作人员——导演和摄影师；如果扩大政治自由范围，西班牙电影的伟大时代可能就将开始。即便欧洲电影之父路易斯·布尼乌埃尔，也会乐意把他的最后几部作品，拿到他的祖国去摄制——如果让他在那儿充分地工作的话。

现在，君主政体政权显然不仅想宽容知识分子，或者如果适当的话，想把他们请出“茅庐”，加以利用。至少有几位现在已经部份革新的“政治阶级”的代表认为，象在某些民主国家的情况一样，知识分子在新的国家里有一项重要任务：不是支撑君主政体及其政府和政策，但是，可以帮助实现在西班牙也有必要的政治、文化与方言的多元化。自从共和国失败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官方的政治纲领里，宣布了对本国知识分子的邀请。无论如何，国王的登基演说是这样的。西班牙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们首先抱等着瞧的态度，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君主政体的首批政治家，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独裁制度的政治家，而且这个政权，首先不是依靠人民给予的信赖，而是依仗若干社会少数派——军队、一部份农业和工业资本占有者、享有极大特权的贵族和少数不合潮流的政府各部和工会的官僚。

鲁本·卡瓦的民意测验表明，西班牙的知识分子认为，政府、军人、企业和教会上层的影响和权力太大。他们的这一看法几乎同欧洲——至少是拉丁语系的欧洲——的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认为欧洲在艺术和文化上，远比世界其

他地方优越，技术与科学巨人美国正在遭受缺乏人道主义价值的苦难，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西班牙知识分子一不再倦地乐于参加讨论，大多数人也十分了解世界各地新的发展趋向，尤其在政治理论领域里，这使外国人感到惊愕。诚然，对很多西班牙知识分子来说——如同对他们的大多数同胞一样，所谓讨论主要是自己侃侃而谈，而极少倾听谈话伙伴的意见。他们竞相成为左派，因为这时髦——这在西班牙与在欧洲其它地方一样。在马德里的，尤其是在巴塞罗那的半知识分子的生活优裕的左派“神圣的左派”，口头上很激进，然而在政治上早已不被人重视了。但是，他们一直在从事日常的文化活动，组织优雅的夜总会。他们妙语连珠，才气洋溢，富有魅力——青年资产阶级的左的魅力。

西班牙人生性喜欢独树一帜、标新立异、轰轰烈烈和走极端。而始终如一，持之以恒，直至尽善尽美，那是比较罕见的。很难说西班牙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们是伟大的事业家，常见的倒是倡导者，倒是天才的开路先锋。他们偏好激进的个人主义，很难适应团体的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有自己的纲领并定期出版书刊的知识分子政治分裂小组比比皆是，尤其是在西班牙的大学里。政府无法铲除大学里知识分子的多元主义，在最初几年政府曾想这样做过，而且略为试了一试。的确，有些反对派教授丧失了他们的教席，然而大多数现政权的反对者，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和比共产党人还要左的人，却能够继续执教，而不必时时隐瞒自己的政治态度。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西班牙只要身为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就可以占些便宜。末了，佛朗哥的教育部长们只剩下了最后一招：拖延特别严厉批评政府的教授们的就任——他们找借口，施诡计，尽可能久地拖延任命证书的签署。象德米格尔，巴尔维罗·桑托斯和莫罗多等名教授的案件，都是些有名的案例，并且公开讨论过。

在最严峻的独裁统治的年代，各大学是有限自由的小岛。西班牙大学有着优秀的、也是爱好自由的传统；如果不想十分残暴而系统地对付它，便不能轻易地使它屈服。早在五十年代中期，高等学校的政治反抗就导致发生严重事件，整整十年之后，发展到了高潮。接着在各系设置了警察办事处；穿制服的警察坐镇讲堂。六十年代末，包罗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温和的“民主大学生同盟”，被政府摧毁，政府一直认为它是一个非法社团。同盟的领导人或落入监狱，或逃往国外。大学生运动四分五裂，更加激进化了。一些右翼激进的、大多数受到政治警察支持的大学生联合会也应运而生。左派学生和极右派学生在大学校园里进行了激烈的、有时是血腥的搏斗。

教学很受骚乱的影响。例如，1971至1972年整个一学年，西班牙最大的学府马德里—阿尔卡拉大学医学系，由于罢课而没有上课和实习。三年之后，由于微不足道的事件，教育部长把巴利阿多里德大学各系关闭了整整一个学年。大学生和许多教授在巴利阿多里德建立了一所违禁的平行大学；在咖啡馆和舞厅上课，在私人住宅举行讲座。

西班牙对某些学科的研究和著作享有特别良好的声望；历史，阿拉伯哲学，有一个时期还有古典哲学，都属于西班牙的大学在国际上领先的学科。法律和医学也可同国外媲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自然科学研究缺少必要的财政条件；因此，大多数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都到国外去完成他们的学业。而对非西班牙语国家的现代哲学和地理的认真研究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因此，西班牙对拉丁语文化的贡献——希斯巴尼亚学^①除外——相当微小。象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西班牙的高等学校也培养了太多的社会学家和

^① 古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半岛总称为希斯巴尼亚，研究希斯巴尼亚的学科叫希斯巴尼亚学。——译者

政治学家，结果是大部份不能按照他们的专业找到工作的机会。设置了培养新闻记者的“情报学”系以后，新闻学很快就成为热门学科。现在在西班牙情报学系就读的学生，足够补充西欧全部报纸所需的编辑人员。

西班牙三十所高等学校存在的大多数问题，邻国的大学也存在。为了对付人员拥挤，在高中和大学之间，插入了经严格考试的一年制大学预科。1975—76学年，注册大学生超过三十万，其中马德里占十多万；仅在马德里—阿尔卡拉大学就有九万多。近几年来，教授的权力受到限制，但是，这种权力依然一直激起非正教授们的不满和抗议。好几个教育部长都颁布过大学改革法令；多数都是局部的改革。工农子弟占大学生总数的比重仍旧一直低于百分之五。奖学金的数字比西欧大多数国家要小。就读高级中学是进入大学的先决条件，而这对很多农村地区的居民依然是困难重重的。国立文科中学的数目很少；教会和其他私立学校的学费一般都很高。对于大城市里的工人家庭来说，孩子上学和上大学，意味着减少本来已经难以维持家计的工资。

1975—76学年，西班牙政府终于达到了长期梦寐以求的目标：所有六岁儿童都上小学。几年之前，还有数十万儿童不能上学。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西班牙人不能读，不会写，这些人几乎全在打上大地主所有制烙印的南方，而且年纪较大。大地产所有制的加的斯省，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文盲最多的省份，而小农和中农经济的老卡斯蒂利亚，从本世纪开始以来就不再有文盲了。

大多数西班牙大学生对君主政体很冷淡。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对他在马德里大学的短时间学习生活，也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在进校的头几天，这位昔日的王子在教室里四面受敌，很多大学生嘲笑他，发出粗鲁的呼喊；最好的也不过是对他们未来的国王置一轻蔑的笑。那时，左派和长枪党右派在拒绝君主政体

这一点上还是一致的。

国王许诺的西班牙民主化，也必须包括削弱西班牙教育事业的阶级性质，必须导致建立更多的国立学校，减少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当“私立”的上帝事工派大学得到巨额国家补助的消息传出后，愤怒的狂飙轩然而起。大多数西班牙人拒绝私立学校和私立大学的制度。认为不受国家控制的上帝事工派大学比所有其他西班牙高等学校优越的看法，无非是巧妙的宣传噱头罢了。

西班牙——这是整个欧洲的一个希望——拥有大量的优秀人才，他们藏卧于广大民众之中，只是尚未找到通往当今教育金字塔高层的门径。

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 经济前景

卡斯滕·R·莫泽尔

一、西班牙经济在担忧与希望 之间徘徊

夏天，有大批德国游客蜂拥到帕尔马、阿利坎特、贝尼多姆或马拉加，他们想在这些地方度假几周，用太阳、沙滩、大海来忘却平日的忧虑，并为来年养精蓄锐。对他们来说，西班牙确是一个游览胜地。尽管他们对过份喧闹，浴场拥挤，旅馆设备差劲感到不满，但天高气爽，费用低廉以及西班牙人的好客弥补了这些缺点。

德国游客在假期逗留中是否了解真实的西班牙呢？倘若他只停留在地中海边某个有小香肠店、巴伐利亚啤酒酒店以及陈列着除黄色新闻外所有德国报章杂志的报摊的游览区，那他肯定不了解西班牙。但他若懂西班牙语，寻求与西班牙人接触，并到处游逛，那么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非难这些德国游客，他们在柏林、波鸿或斯图加特紧张工作年余，只想在休假的几周内为自己及其家庭寻找安静和轻松，而并不准备了解这个国家、它的人民及其希望与忧虑。倘若他回国后，就自封为西班牙通，并作出判断，那定然是自欺欺人。“西班牙充满矛盾”，隐藏在这句众所周知的话背后的实际情况不是在几周内所能掌握的。

现代西班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譬如尽管官方禁止任何罢工，但在佛朗哥政权下，1974年罢工人数占欧洲第四位。1975至1976年冬季同样也以大量社会冲突为其特点。与政治上不自由相比，近十五年来政府在经济上采取异常开放的政策。欢迎外资，自1959到1973年间外国共投资2,180亿美元。但总还有200

多万西班牙人必须在国外工作，因为经济发展还不足以为所有人提供就业机会。按人口平均收入虽已超过 2,000 美元，但仍有许多西班牙人，尤其是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收入刚够维持生计。

即使在佛朗哥病危的三十四天前，不合理现象、敌对行动及各种矛盾也一直在发展。主教让大家祈求将军们审核安全法令。马德里和巴塞罗纳交易所股票危机加剧。对佛朗哥的死，有些人害怕，但有不少人却在盼望着。离他死日越近，在团体和企业，在家庭和夜总会里，对下列问题的讨论越激烈：独裁者死后，西班牙是否会面临葡萄牙状况的威胁？胡安·卡洛斯是否能不经过政治经济危机而使军事独裁统治过渡到民主政府？至今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将会怎样？在权力交替中，本来就不稳定的病态经济将会有何种前程？

阿里亚斯·纳瓦罗总理领导的最后一届佛朗哥政府在 1975 年 11 月 20 日之前，大肆渲染一种印象，似乎佛朗哥之死对西班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并且他的死决不意味着政权或至今实行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结束。

而反对派（以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为中心，联合成民主委员会，又同联合了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的统一纲领组织相联合）亦增强了建立过渡政府的信心。为了安抚居民，他们一再强调，在革命第二阶段才开始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但在政府及反对派表面充满胜利信心的背后，却隐藏了不稳定及忧虑，甚至对未来感到恐惧，政府的冷静是装出来的。假如，军事独裁者佛朗哥当然的接班人胡安·卡洛斯能使至今统治的支柱——军队、佛朗哥主义政治家族联合会以及政府——信服的话，则大可不必如此吞吞吐吐并神秘地报导佛朗哥临危的消息。

共产党领导人卡里略在佛朗哥去世前强调指出：“从根本上来

看,胡安·卡洛斯是佛朗哥的儿子。所有由佛朗哥创造的结构,包括胡安·卡洛斯在内都需要废除。”这样轻率地与过去决裂是不现实的,许多政府的反对者知道,军队站在佛朗哥大元帅的三十七岁接班人一边。何况,胡安·卡洛斯还深受各阶层人民的爱戴。他若能加快民主过程,则他将更受拥护。不过,起决定作用的是,大多数西班牙人害怕未来,害怕过多的试验,因为他们怕混乱与骚动。

面对葡萄牙发生的情况,经济界害怕政治上的左倾和工人阶级的激进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担心看来是被夸大了,因为大多数西班牙工人及职员虽赞成改革,但反对革命。他们对内战后的艰难困苦还记忆犹新。他们不愿意为思想意识原因作试验,而把千辛万苦得来的幸福孤注一掷。

毫无疑问,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经历了惊人的经济繁荣。内战(1936—1939年)结束后,西班牙处于经济全面崩溃的边缘。西班牙因死亡及政治避难损失了近100万劳动力。有200多个城市遭到破坏的程度达60%以上。国民经济遭受的打击,特别明显地造成国民收入及按人口平均收入的减少。以1953年价格计算,1935到1940年,收入从2,080亿降到1,490亿比塞塔,按人口平均收入从8,520降到5,789比塞塔。

1939年后,佛朗哥及其同事首先提出使经济重新运行起来的任务,由于第二次大战中西班牙孤立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1946年联合国封锁西班牙决议的结果,西班牙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倾向发展到了极点。四十年代,政府力求以国营经济形式推动经济发展。为了优先使各部门工业化,马德里选择国家经济计划以及发挥中央积极性的道路,但结果是事与愿违。

1953年华盛顿与马德里签订了军事协定后,对西班牙的国际经济封锁以及自给自足经济倾向开始有所缓和。

美国经援触发了第一次经济飞跃，国民收入实际增长率平均为4.5%，并增加了工资，扩大了进口，但也带来了通货膨胀。只有出口停滞。

五十年代末，马德里最终废除了自给自足经济，参加了“经济合作及开发组织”。并请求该组织及货币基金组织参与制订稳定计划：制止通货膨胀及贸易逆差作为短期目标，提高西班牙经济的竞争能力作为长期目标。该计划包括的措施从比塞塔贬值，外贸自由化及紧缩国家支出到限制信贷政策。

从商业流通政策角度来看，稳定计划成就之一是，近年来能控制物价上涨，吸引外资，黄金及外汇储备从1960年的6,000万美元增加到1964年14亿美元。但是虽推行工业化，且有美国经援，而结构上的弱点依然如故。

西班牙南部及西部仍处在贫穷状态，而北部及东部分享经济飞跃带来的大部分好处。其结果是大量人口移向北部和东部，各省之间收入差距也增大。到1964年，50个省中有30个从未达到过按人口平均收入3,106比塞塔。

为了更好地控制经济及社会发展，1963年佛朗哥政府制订了1964—1967年的发展计划（它以法国经济计划作蓝本）。该计划规定要实现的目标是：在保证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支出平衡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实际增长为7%。上述官方投资计划及措施还应为私人经济指出政府所希望的发展方向，并减少其投资的危险性。

该计划规定国家支出为55亿美元。并优先发展交通，住房建设，农业及教育。此外，为鼓励本国及外国企业首先在不发达区域投资，制订了一系列信贷及财政金融政策。该计划的其余部分为能源计划以及十分节制的税收改革。

1964年马德里与欧洲共同体之间开始有关西班牙加入共同体的谈判。在处理西班牙农产品出口问题上，产生了第一批经济

问题。与西班牙有类似农业结构的意大利从一开始就抵制共同体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迎合西班牙的要求。而在政治上共同体各国一致拒绝接纳西班牙，理由是其政权具有法西斯性质。但经济上惊人的飞跃以及西班牙与欧洲之间越发密切的联系(其中一部分是由旅游业的繁荣所造成的，1960到1964年，外国游客的人数从600万增加到1,400万)，使马德里政府希望，欧洲共同体会很快改变其看法。

但两年后，西班牙政府不得不认识到，与欧洲六国共同体进行的加入该组织的谈判是毫无希望的。因而决定力求与布鲁塞尔签订贸易协定。1966年秋，又就宪法(国家组织法)的补充和如何谨慎地搞现代化进行了受控制的公民投票，但均未能改变共同体不妥协的立场，其理由是，西班牙现在虽允许政党存在，但仍没有自由选举，又没有集会罢工权利，因此只能把西班牙摒斥在欧洲的大门之外。

西班牙对这次打击满不在乎，因为那几年它陶醉于真正繁荣之中。国民收入增长率1964年达7.1%，1965年7.4%，1966年又是创纪录的7.4%。因而不重视对计划中存在的缺点和发展中蕴藏的危险提出警告的批评意见：譬如农业代表诉说对国家优先发展工业的不满；银行界指出国家支出过高(1964年底已超过第一个四年计划规定官方投资的50%以上)以及本国与外国投资不受节制；另外，经济专家非难工业、信贷、政财和社会政策之间缺乏协调。

1967年政府才醒悟过来。而在此前几年，贸易逆差已达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并出现了通货膨胀，如1965年为13.2%，因欧洲经济衰退使西班牙国民收入实际增长率降到4.1%。政府十万火急地制订出一个稳定计划，它规定1968年全面冻结工资和所有列入生活必需品的商品及服务的价格。厉行节约，鼓励投资，紧缩国

家开支。1967年底英镑贬值14.3%时，西班牙也紧跟着使比塞塔贬值16.6%，表面上是为了稳定英国游客人数，但实际上是为了一举解决通货膨胀、贸易逆差以及发展不快的问题。

稳定计划短期内就见了效：1968年通货膨胀为5%。失业虽增加了，但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只有出口几乎没受到激励，虽有各种促进措施。不过，政府已感到满意，因为衰退似乎已被制止，物价上涨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但批评愈来愈多，他们指出西班牙经济结构的弱点（尤其是农业）。还有越来越依赖外国，工业部门的生产设备陈旧落后，税收不合理，国内资金不足以及因外国投资过多而造成受外资控制的局面等等。

第一个发展计划结束时，主管部门不得不承认，虽然有些指标已被超过，但另一些还未达到。经济实际增长率超过了规定，1967年按人口平均收入达到600美元。充分就业已无危险，因为许多西班牙人收拾行装，在国外寻求幸福。尽管贸易还有逆差，但在外国的西籍工人汇入的外汇，外国投资以及外国人观光（1968年有1,900万外国人游览了西班牙）使黄金及外汇储备超过10亿美元。不足之处：通货膨胀、经济上区域发展不平衡与结构弱点依然存在。

第二个发展计划（1968—1971年）虽在1967年底提出，但因须补充稳定计划措施，因而到1969年才生效，该计划又把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上面。主要目标是国民收入实际增长率每年为5.5%。其它目标是农业现代化，为实现区域政策而继续努力，促进出口贸易以及教育与住房建设，并重新安排财政金融市场与社会政策。

后来几年中，经济确实继续飞跃。发展的特点是，高增长率，充分就业，并有大量黄金外汇储备。不过物价上涨也超过西欧平均水平。1969年就西班牙情况来讲，国民收入又出现了高增长率（6.3%），并因延长冻结工资及物价的政策，故物价只上涨了

2.2%。但后来几年中增长率下降：1970年为5.6%，1971年为4.7%；可是物价上涨：1970年为5.7%，1971年为7.5%。

第三个发展计划(1972—1975年)的第一年取得显著成绩。年初人们对经济恢复还很忧虑，但到年底却一致认为最兴旺时期到来了。单单国民收入实际增长就达7.8%，超过其它工业国家。投资增加了15.1%。汽车工业生产甚至提高了将近35%。

尽管贸易逆差的窟窿越来越大，达到28亿美元，但并不被认为是特别可悲的。因为3,000万外国游客留下了30亿美元，在国外的西籍工人的外汇及进口资本显示出增长的趋势，看来50亿美元的货币储备是一个起稳定作用的缓冲。但美中不足的，是通货膨胀9.5%。当然，通货膨胀并不符合第三个发展计划的构想，它规定在物价相对稳定、充分就业以及收支平衡的前提下，重新达到实际每年为7%的高增长率。官方投资估计为150亿美元。计划重点是交通部门、农业、教育及住房建设。

假如，1973年底不是石油危机使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工业国家的所有计划统统完蛋的话，那么1973、1974及1975年的实际情况或许可能超过第三个计划的设想。1973年，在物价上涨14%的情况下还能看到实际增长超过8%。但第二年就开始衰退：国民收入实际增长率低于5%，而物价上涨了将近18%。尽管有3,000万游客，而且外国投资及在国外的西籍工人的外汇也未减少，但因石油提价的结果，黄金和外汇储备从60亿降到50亿美元。

最后一年，外汇损失与物价上涨虽稍低一些，但在多年繁荣以后第一次出现停滞及失业。经济内阁在佛朗哥临危时还多次聚会，并于1975年11月14日制订出振兴经济的应急方案。这说明，对停滞及失业的发展动向，当然也对经济界及工人对国家元首的更替的反应，政府是何等关心。国王首届政府对出口减少，投资停滞以及失业增多(官方公布为2.4%，但根据许多专家估计已增

至5%)感到不安而决定通货膨胀。但对社会骚乱的害怕程度更重于对迅速通货膨胀的害怕。

社会骚乱的危险并不太小，这在佛朗哥后期已表现出来。官方虽然禁止一切罢工，但罢工的浪潮仍以一个前所未有的势头席卷西班牙。在以后的岁月中，社会冲突将肯定如其它西方工业社会那样成为西班牙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为提高工资而作顽强斗争也将成为西班牙经济及社会秩序的显著特点。政府激进的反对者，如共产党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也希望，不可避免的工资冲突成为西班牙火药桶的导火线，并可能导致推翻国王。胡安·卡洛斯若要把西班牙引上民主发展的道路，则要解决现代化工业国社会问题的方法几乎不可能有别于欧洲其它诸国，即不是用暴力，更不是通过新的内战，而是在谈判桌旁解决问题。

许多佛朗哥政权拥护者认为，平静、秩序及和平是佛朗哥三十九年统治时期的特点。另外还有经济及社会发展，虽然，佛朗哥与其葡萄牙的同盟者萨拉查相反，从未特别关心过经济问题。1973年8月《新苏黎世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比利牛斯半岛上两个邻国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别：

近十四年内西班牙实现了经济高速度发展，目前仍保持了向前发展的势头。而葡萄牙直至萨拉查引退后，才在各种内部困难下勉强决定投入经济发展运动。这是由于两个独裁者的个性决定的。看来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却是这样的。佛朗哥是一位将军，他从来不想掌握经济专业知识，但他允许西班牙经济发展。自长枪党自给自足经济倾向崩溃后，1959年起，佛朗哥就准备听从有现代思想的经济专家的建议。

而萨拉查本人就是一位经济学教授，这个情况使葡萄牙在战后年代以及后来几十年中失去可能发展经济的机会。这要归结于萨拉查死抱住他年青时在科英布拉学到的凯恩斯之前的观念和方

法，他在成年时曾成功地运用这种观念和方法稳定了葡国的财政。

当然，佛朗哥统治的四十年，西班牙的经济政策也是有一定原则性的。1939到1959年，重点是放在自给自足经济上。为达到这个目的，强调国家既是企业主，又是小百姓的庇护者。1959年的稳定计划使西班牙经济政策的方向开始了决定性变化。国家资本主义以及政府政策的社会成分虽然仍是经济哲学的组成部分，但已被其它两个中心内容——对国外开放和以法国计划作蓝本——所补充了。

上面我们对西班牙经济政策（它带来近十二年来实际增长率平均超过7%的经济大飞跃）的四个固定成分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政权交替后的西班牙经济。

没有一个西班牙人会认为，胡安·卡洛斯国王一统治，就会在经济及社会秩序中实行重大改革。不过，诸如经济发展遭到的突然性打击以及社会不安加剧等短期问题，将要求他投入其全部注意力。而上述经济问题仅因石油危机才得不到澄清，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反而用另外一些原因来解释它：阿里亚斯·纳瓦罗政府指出，在其上台前就存在着经济结构的弱点。并认为，极右翼要对此负责，当然，目前政治自由化浪潮也要为此负责，而民主力量相反却要政府负责。不少专家一致认为，确有可信的理由来说明经济不稳定和对社会的不满，即通货膨胀是近三年来罢工剧增的直接原因。在西班牙犹如世界各地一样，首先是大城市工人与乡村小农这样的百姓深受通货膨胀之苦。西班牙按人口平均收入虽已达2,000美元，但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它已进入了提高人民大众消费水平的阶段。实际上，老百姓还不能摆脱对经济的忧虑（通货膨胀，失业增加），他们要求有更高的工资和福利的愿望也没能得到满足。

工人的社会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工人政治觉悟提高

（部分因较高的文化水平，交通方便；部分也因共产党和社会党所做的群众工作），他们不仅要求进一步的政治自由，而且希望和西方同行们一样有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

目前，失业还保持在可忍受的范围内。但欧洲衰退若持续下去，许多在国外工作的西班牙工人被迫回国的话，则情况很快将完全两样。目前国内因缺少就业机会而不许可大批工人回流。那么近期内，西班牙经济及社会怎样重新吸收这么多在国外的西籍工人，是今后数月中使西班牙官方深为头痛的问题。

广大人民都期望着，最终着手进行旧政府一再推迟的重大改革。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偷税漏税并不少见，而是一种通病。庞大的行政机构的主要毛病是效率太低，因而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彻底改革经济官僚制度和行政管理机构。

如何迅速而严肃地着手处理上述短期问题，这将取决于国王第一届政府的态度。它若有勇气并肯牺牲自己的利益，则将为胡安·卡洛斯赢得第一仗。反之，若毫无决心，并缺乏改革的愿望，那么社会冲突可能会导致推翻国王。同时，许多西班牙人对西欧工业国家的情况有所了解，因而现行制度的小修小补并不能使他们满意。他们现在要求更多的东西，即政治上允许民主竞赛和经济政策上更强调社会成分。

贫富之间的收入差以及财产差也属于急待解决的主要结构问题。连大资本也和内战后同胜利者站在一起的各集团一样经不起削减工资的诱惑。而另一方面，最贫穷的阶层只分享到近几十年物质进步带来的一点儿好处。他们现在要求比较合理的分配。

发展上远远落后于北方的南方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尽管，至今为止的三个发展计划有不少区域政策的声明，但西班牙南北两部分之间的裂缝几乎没有缩小。联邦国家结构的拥护者希望，更广泛的政治及经济区域自治将会带来的新发展。

3,500万西班牙人中有3,000万人属于“沉默的多数”。还在不久之前，他们还直接或间接地受着内战留下的苦难。近几十年来他们享受到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但当他们想到将来时，他们的思想在希望与恐惧之间飘荡。绝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胡安·卡洛斯及其同事若能把西班牙平静而有秩序地引上民主发展的道路，则西班牙完全有可能避免葡萄牙式的经济问题。

但还有一个问题，即目前的经济状况是否能持续下去呢？很多西班牙人深信，原始资本主义（开放主义与保护贸易主义的混合物。它旨在保护政府中各集团的利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将来的经济秩序更近似于西欧式样，并强调社会改革的新资本主义。

各阶层都期望西班牙迅速接近共同体将加速上述进程。即使小百姓也强烈希望从孤立于欧洲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一位西欧国家驻马德里大使以他亲身经历作了这样解释：1975年秋西班牙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紧张，当他在这之后重返马德里时，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在认出他是谁之后，拒收车钱，并讲：“很好，您又回来了，欧洲没有完全抛弃我们。”西欧国家是否愿意帮助西班牙从独裁过渡到民主，未来将表明这一点。

本文的第二及第三部分将探讨胡安·卡洛斯所面临的短期的和长期的经济问题。正如第一部分那样，第二、三部分不仅发表了作者本人对西班牙未来经济及社会的看法，而且还反映了几位中年及青年的思想与立场，他们在新的政治领域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从主观愿望出发挑选了对话者，这是否客观可以批评。尽管如此，这个设想还是获得了热心肠的社会名流的赞同。

第一部分探讨了佛朗哥经济政策的四大支柱。和1974年曾任国家工业局国营康采恩的主席、现为中左翼经济政策的发言人佛朗西斯科·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讨论的题目是：西班牙国家资本主义至今的作用以及将来的作用。和1974年初至1975年

12月曾任劳工部长的亚历汉德罗·费尔南德斯·索尔多讨论的题目是：昨天、今天及明天的社会政策。和著名的经济律师及经理安东尼奥·加里格斯·瓦尔克讨论了“向外国开放对西班牙经济发展的意义”。和最优秀的经济学教授及政府最尖锐的批评者拉蒙·塔马梅斯讨论了西班牙计划经济的成功与失败。

第二部分将研究西班牙四个最急迫的经济问题。社会主义者劳尔·莫罗多从他的立场出发阐明社会冲突情况和原因及其对政治发展可能的影响。“西班牙工会的特点以及工人改革的愿望”这个题目的谈话人是何塞·曼努埃尔·阿里雅，他作为当选的工人代表以及社会问题编辑，对上述范围问题十分熟悉。经济学教授何塞·拉蒙·拉苏埃分析了如何使西籍工人返回西班牙生产中去。尼古拉斯·弗朗哥·帕斯库亚尔·德尔波比是常任国家元首弗朗哥的侄子，他对“经济官僚制度及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发表了看法。

第三部分剖析了西班牙结构问题。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经济政策发言人米格尔·博伊厄讨论了贫富对立。“北富南贫”这个题目的谈话人是巴塞罗纳大学教授天主教民主派有影响的成员拉蒙·特里亚斯·法加斯。发行人赫苏斯·德波朗科对西班牙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作了预测。最后，工业家华金·穆尼奥斯论述了接纳西班牙参加欧洲共同体的可能性。

二、佛朗哥统治下经济 繁荣的支柱

国家资本主义

国际货币、贸易及石油危机对西班牙并非没有影响。根据西班牙最著名的经济学权威之一佛朗西斯科·费尔南多斯·奥多涅斯的说法：“西班牙经济被国际危机所包围，只要西方经济大国仍停留在衰退阶段，则它是无法摆脱困境的。”

通货膨胀、失业、外汇损失以及增长停滞等均为经济危机的信号，而西方各国至今不论从精神上、还是政治上或经济上都不能摆脱这次危机。许多国家这一次采取的措施同近几十年来惯用的措施一样，它们祈求于国家指导经济，而不从国际合作中谋求出路。控制兑换率、限制进口、补贴出口、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等诸如此类的措施跟过去一样被誉为“拯救”措施。虽然，历史告诉我们，这些措施短时间内或许能改善一下经济状况，但从长远来看，往往只会造成更多的灾难。

在这方面西班牙也并非例外。近四十年来，西班牙一直推行指导经济，尽管这样，它也免不了要遭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物价上涨只略低于20%，进口超过出口的二倍，始终必须有几十万西班牙人在国外做工以维持生计。失业增多、增长率很低使经济进一步不稳定，而社会不安则达到了危及政府的程度。

西班牙指导经济起源于内战后的年代。西班牙政治上、经济上的孤立状态从第二次大战一直延续到战后。外加长枪党信条中

所包含的政治上、经济上及文化上的自给自足倾向。作为自给自足与指导经济的政治经济工具——国家工业局，成立于1941年9月25日，有资本5,000万比塞塔。

工业局法定的任务是，支撑西班牙为其防御能力而作的努力以及促进经济的自给自足。国家资本主义（应理解为官方的试验）通过国营企业强制推行工业化。不过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货膨胀率也升高（1950—1959年欧洲各国批发价格的比较表明：西班牙货币贬值最烈）。失业（包括公开的，尤其是秘密的）已达到不小的规模。在进口支付加倍的情况下出口呆滞。

政治经济实验家佛朗哥在五十年代末也逐渐明白，自给自足的企业永远是一个梦想。为佛朗哥效劳的第一位圣十字神父会^①的技术治国专家阿尔维托·乌利亚斯特雷斯于1959年推行一项稳定计划（即制止通货膨胀，并在保持内外平衡情况下为建立健康的经济结构而打好基础）以及使外贸自由化，从而使西班牙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但1959年后，国家资本主义仍影响着西班牙的经济生活。1973年底，工业局在50个企业中直接入股投资，并在121家公司间接入股。尽管这个国家康采恩只控制近20%的西班牙经济，但它在西班牙20个最重要企业入股，其中有国营冶金有限公司，伊比利亚西班牙航空公司，旅游汽车有限公司，西班牙造船有限公司，塞维亚电力有限公司，国营石油公司，国营北部煤矿公司。上述20家企业中有2家是国家垄断资本即电话公司和西班牙国营石油有限公司。

工业局入股的重点是繁荣部门，如钢铁、电—天然气—水、石

^① 是天主教的一个组织，成立于1928年。——译者

油化工、航空及汽车工业。按收益计算，国家集团对下列部门控制最为明显：钢铁(38%)，石油化工(37%)，造船(30%)，矿山开采(29%)及电—水—天然气(24%)。

工业局目前理应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先驱，而应当帮助政府实现其经济计划以及促进西班牙工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但这个大型康采恩的成绩并非是国家机构经营管理能力令人信服的证据。即使佛朗西斯科·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1974年曾任工业局局长十个月)也不得不承认：“只能有条件地给予工业局工作的结果以积极的评价；这个条件就是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个康采恩若在民主选举的、议会控制的政府手里，可以成为实现经济及社会目标的一个宝贵工具。”

大家普遍地认为，四十五岁的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是工业局史上最有力量的经理之一。他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期间始终名列第一。他还在哈佛大学念过几学期。毕业后不久他就在财政部升任财政金融局副局长。1969到1973年间他任技术总经理，后来又任财政部国务秘书，并率领西班牙代表团出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欧洲共同体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1974年初被任命为工业局局长。

尽管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领导工业局只有十个月，又适逢经济不佳时期，但他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他的许多前任。他达到了下列目标：提高了这个国家康采恩的经济性；为填补西班牙技术不足作出了贡献；并通过合并及改组使工业局集团变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当他1974年2月4日就任时，他以下列的话结束他的就职演说：“我们既要从播种上也要从收获上鉴定自己的成绩。”不论播种还是收获结果都很可贵。费尔南德斯及其同事们成功地在外国金融市场上以极为有利的条件借了3亿美元。尽管经济形势恶化，但他仍使规定的投资计划扩大了5%。他的顽强的谈判

风格及其个人的作用使得常闹罢工的国营企业不再出现罢工。另外，他特别重视长期被忽视的确保原料供应的问题。

这一问题在石油危机开始时显得特别突出，仅 1974 年上半年的进口费用与上年同期相比就提高了 60%。为进口支付的 200 亿马克中，原料进口就占 70%。马德里确认，与阿拉伯世界良好的政治关系带来的好处还不如产油国拧紧石油价格的龙头。西班牙单为进口石油就多化了将近 70 亿马克。

面对上述形势的变化，工业局管理机构迅速而认真地作出了反应。一方面更加重视西班牙德明埃克斯石油公司在产油国的活动，另一方面最终实现了统一管理西班牙三个最大炼油厂（雷佩萨、恩卡索和恩塔萨）的目的。新的国营西北石油公司以其 3 亿资本及每年 15 亿马克的收入而被列为欧洲同行业的最大企业之一。1976 年起这个炼油厂集团每年能加工 3,000 万吨石油，收入 25 亿马克。

单凭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在半年内能建起大型炼油厂这件事也值得我们大书特书。西班牙的第一流周刊《改革 16》在评价他任工业局领导的业绩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干得很出色。

1974 年 10 月 29 日西班牙政府危机时，危机的牺牲品不仅包括自由派的情报部长皮奥·卡瓦尼利亚斯（在极右翼的压力下被解职）以及强有力的财政部长巴雷拉·德伊里莫（为抗议对他同事的驱逐而辞职），还有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他作为巴雷拉·德伊里莫的被保护人和心腹在政府危机后马上就辞了职。

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当了一家英国大建筑公司西班牙子公司的经理，一家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以及民主力量中间派的发言人，就此而言，可见他确实是一位很忙的经理，并且是一位极受本国人及外国人推崇的对话者。西德外长根舍在 1975 年初访问马德里时，在官方计划外曾邀请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交换意见，并

表示，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对西班牙未来政治经济所作的出色而又现实的判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数观察家认为，他的离职（并转向民主反对派）是阿里亚斯政府的一大损失。并认为，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还远未达到政治家生涯的顶峰，人们还将听到有关他的许多消息。

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的政治立场是左派自由主义，他与政府破裂的原因是：“长年服务于国家的经验教训以及当佛朗哥在世时阿里亚斯政府为使实行有节制的自由化而需要克服的巨大困难，这一切加深了我对佛朗哥之后西班牙未来的悲观看法。西班牙在民主上已完全成熟，这点我相信，但反动派及法西斯的强大力量会用惯用非法手段全力以赴地维护自己的特权。”

他希望西班牙能实现多数人的民主，当然也希望胡安·卡洛斯是在合适的时代、合适的地方的一位合适的人。他以同样的口气表示了对佛朗哥独裁统治变为左派独裁统治或右派军政府的担心。

但他本人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他想限制甚至取消国家资本主义。实际情况正相反。“我是有限制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而且希望国家在某些经济领域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当然在实现民主后原则上应让政党来决定私人经济与国营经济的比例。”

在他眼里，有西班牙特点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其优点，它使国营企业除国家垄断资本外全部隶属于工业局中央管理机构。“这将减轻领导及协调的任务。”他只部分同意对工业局管理机构不断提出的庞大且官僚主义的非难。“当然，工业局领导曾作过许多错误的决定，此外中层领导有些是很差劲的。但对工作起来到底是私人经济还是国营经济更为合理这个古典问题，我不作任何估计。实践提供了许多例子，其中有出色经营的国营企业和差劲的私人公

司,但也有相反的情况。”

在赞成国营企业的许多理由中,他还举出这种可能性,可以不考虑利润或损失而向不发达区域投资以调动那儿的积极性,或进行诸如建立核电站或本国的电子计算机工业这样的大型财政和技术项目的投资。“工业局若拥有足够的财政手段,则国家康采恩的区域政策的作用以及技术作用将能增加。”

只有少数西班牙人会公开赞成取消国家资本主义。政府代表与任何一个民主西班牙的拥护者(保守派、基督教民主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当然还有共产党)或多或少都认为,国家对经济进程的直接影响应增加而不应减少。

但他们也同意,为了增加工业局的利润率,有必要采用新的组织方法、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并改善工作条件。特别应指出西班牙国营铁道公司与国营北部煤矿公司是亏损最大的企业。1974年其亏损分别高达47亿及45亿比塞塔。照工业局康采恩一位经理的说法,工业局将长久背着煤矿公司这个包袱。“所有这一切表明,煤矿公司即使到下几个世纪也甩不掉赤字。”影响工业局结算的不仅是煤矿公司,而管理差、并缺少合理计划的工业局本身也是原因。但对此是完全有办法解决的。

社会政策

尽管从理论上讲,社会政策始终是这类政权(意大利墨索里尼倡导的国家社会主义结构形式)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它是处在“不惜任何代价达到经济繁荣”的阴影笼罩之下。当然,工资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险系统的建立,进一步扫盲以及许多社会补助建房的成功毫无疑问也是社会政策的成就。但是目前,对工资、物价上涨、失业救济不足、农村缺乏医疗条件、农民子女很

少享有合乎情理的教育机会或很难拿到社会补助来建房等，人们存在着不满情绪。

为什么佛朗哥政府不能制止这些不满情绪的蔓延呢？这些情绪在罢工热潮中已明显地反映出来了。社会政策将来到底有何价值呢？对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亚历汉德罗·费尔南德斯·索尔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费尔南德斯·索尔多是政府里中年政治家的样板。他较快地被提升为部长。他对目前西班牙存在的问题有充分的认识，同时也直截了当地承认，他相信西班牙将和平且有秩序地从佛朗哥过渡到胡安·卡洛斯。1922年他生在奥维多，长在利亚内斯并在那里上学。毕业后他又回到了奥维多，以行政法及劳工法助教的身份开始其职业生涯。

他考上情报及旅游部官吏后，被原劳工部部长兼国民运动部部长何塞·索利斯（1975年夏秋又重任国家统一运动的头头，他是佛朗哥最大和最有影响的顾问之一）所发现，被任命为国家劳工出版社社长，从此就青云直上，起先任情报及旅游部出版社总经理，以后就在劳工组织中坐了第二把交椅，自1974年初至1975年底任部长。目前他是地方信贷国家银行行长。

这个人对他的导师何塞·索利斯及佛朗哥只讲好话，这是不足为奇的。他认为胡安·卡洛斯是佛朗哥之后西班牙和平与进步的保证人。“国家元首佛朗哥在1969年决定任命胡安·卡洛斯为其接班人，并亲自实施这项决定。在七年后的今天，这个公开的行动得到西班牙人民的完全拥护。”

他把政治联合会看作第一届阿里亚斯政府的主要业绩。从中他看到了放弃独裁统治和实现政治意见多样化的希望。国王的第一届政府宣布准许政党存在。“人们往往以三十年代时政党使西班牙崩溃为理由否定政党，而我有完全不同的理论。如果接受政

党确实带来很多破坏的说法，那也得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只在西班牙才发生？依我看，1936年前西班牙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政党。人们并没有成为社会主义者、激进党或改良党的拥护者，但却选了普列托、毛拉或另一党的头头。”

他继续说道：“我认为，这种现象在西欧任何国家都不象西班牙那么明显。所以我把希望寄予政治联合会上，因为我希望，它能破坏领袖原则，而同时又不重新陷入过去的混乱中。若在过渡时期建立了政党，并以具体目标参加选举，则上述试验可能成功。”

费尔南德斯·索尔多对西班牙未来的政治充满信心。“我的乐观主义是建在西班牙人民的品质上。这种品质表现为历史上的伟大，和文化上的充分成熟——这一点时常被忽略。由于我赞同文化是进步的基础的看法，因而我是乐观主义者。”

索尔多实事求是地和正确地估计了西班牙的经济形势。“相比之下，某些发展（譬如消费繁荣）在西班牙将迟一些开始。由此可见，西班牙经济对石油危机的反应是不同于西欧工业国的。但总的来讲，经济最高增长率与其他西欧工业国几乎没有什么差距，因而以后几年中，西班牙肯定也达不到过去十年创纪录的增长率，而是更符合欧洲发展的趋势。但由于还存在未被利用的潜力——首先在不发达区域内，所以经济还将向前发展。第四个发展计划（1976—1979年）就是针对不发达区域的。”

根据他的意见，不仅区域政策，而且商业结构及财政结构，社会政策都需要改革，而社会政策更首当其冲。但他不同意政府许多批评者的说法，即佛朗哥的历届政府只关心经济高速发展，而从不考虑社会目标及后果。“一定要搞经济飞跃的想法正是考虑到社会要求的结果。倘若考虑到，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西班牙经济结构是何等的落后，那就有必要使国民收入高度增长，以便能提供尽量多的福利。当然，始终存在着分配得不好和不合理的问题。不

过总是考虑到社会目标的。”尽管这样，索尔多也承认，社会政策中的四部分（工资改革、社会保险、教育政策及社会补助建房）急待改革。

“近年来工资战线的形势恶化。其原因是：为消除现有的社会紧张而工作的官方机构办事不力。根据我们的法律曾规定，任何罢工是非法的。至1975年才承认一定条件下罢工是工资纠纷中的合法手段。新的法令怎样规定，我们还须拭目以待。不过，我认为，我们还是前进了一大步。”

按他的意见，劳工组织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适应也是重要的。“在对1975年6月选举新工人代表的企业选举发表评论时，我特别强调指出，参加选举的人数高达80%。因而我们把一切都寄托在有群众基础的新选上的工人代表身上，希望他们能在75年下半年被选到劳工系统更高的位置上。我们并不希望，在统一劳工组织的领导机构与群众之间隔上一道深渊。我们必须把新选出的力量吸收到我们的系统中来。让我们毛遂自荐是不方便的。假如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西班牙劳工运动就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在第二轮劳工选举的结果还未公布之前，这位部长一直在梦想着这一点。其间，选举的结果透露了出来，应当讲，索尔多是失败了，尽管他有着良好的愿望。在马德里省约有四分之三的工会主席是重新选举产生的。在西班牙其他地方的表决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

当然，也不能期望会有别的结果。因为，不可想象的是，至今忠于政府的工会主席会不经过战斗就被轻而易举地赶下台。此时，极少数年轻的工人代表也热衷于当选工会领导，并从而被吸收参加政府。不过，这次保守腐朽力量的胜利给政府带来了极坏的后果。

工人不仅对工会组织、而且对保险系统也表示不满。由国家

救济局负责的社会保险系统包括对疾病、工伤事故、职业病的强制保险，以及某些如老年赡养或教育的自愿保险。批评涉及的范围是国家救济局对某些项目的预算保密，国家对社会保险这部分预算投资太少，以及使医生与病人都表示不满的保健设施的不足。

索尔多看到这些问题。“社会保险的预算，1975年为4,800亿比塞塔。这已接近国家预算的水平，尽管经济状况刚巧很差，但政府还得知难而进抓一抓社会保险。当然不少项目需要加以说明。国家救济局的预算只向人民会议公布也是不够的。另外，还要仔细研究企业家、工人及专家对该系统的批评，并把它吸收到新的计划中去。”

应该怎样改革呢？“我认为，出发点应是国家对社会保险增加投资额。目前，几乎全部由企业主与工人承担，而国家投资只占5%。在费用上，虽不能忽视西班牙的特点，即社会救济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均需要大量补助，但还得注意厉行节约。譬如我家里人与我得了感冒后服一片阿斯匹林就行了，而女仆学了时髦在同样情况下则非去看病不可。她对公费医疗制度感到有点新鲜。这种需求的结果是使医生与药品的开支大量增加。”

教育也属于社会政策的一部分。从经济角度看，它主要影响社会资本（结合实际资本能发展生产力）。在这方面实际上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59年时十五到六十五岁的西班牙人中有12%不会念也不会写。而1969年文盲不到3%。

“文化进步是西班牙社会发展中令人鼓舞的事实。”索尔多强调指出：“当我在内地旅行时一再发现，工人家庭关心其子女的教育超过想得到电视机或洗碗机、更高的工资。与工人妻子的谈话中发现，她们越来越明显地流露出一力求得到更好的教育以及关心其子女的成长，这是一种值得欢迎的倾向。这一切使我充满了信心。”

下列这些数字生动地反映了这方面的进步：1964—65 学年有 3,763,000 名孩子上幼儿园与小学，而 1970—71 学年上升到 4,650,000 名。初高中学生人数从 1964—65 学年的 1,027,000 增加到 1970—71 学年的 1,873,000。1970—71 学年有 214,000 名青年在综合性大学及技术学院学习，而 1964—65 学年只有 112,000 名。

过去五年中国家更重视教育。第三个发展计划规定的建造新学校、招用更多的教师及扩大发展计划的总投资额为 1,000 亿比塞塔，但由于近两年的经济及财政金融危机，到 1974 年底时只完成了 54.2%。

近年来在住房建设中，官方规定的支出与实际支出之间也出现类似的差额。第三个发展计划规定 1972—1975 年总投资为 750 亿比塞塔。但至 1974 年底实际支出还不到总数的 50%。尽管如此，这方面还是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内战结束后不久，住房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这是由于人口剧增，战争年代住房建得少而破坏得多。农村人口迁往城市也迫使城市发展住房建设。1955—1960 年间每年规定建造 11 万间住房，而实际上最高只完成 77%。

1960 年制定了一个十六年建房计划，计划期限虽长，但规定很具体。例如规定 1961 年建造 125,000 间住房；实际完成的是社会助建 121,000，个人自建 12,500。1973 年的计划和实际完成数相差也不多，计划为 300,300，实际完成的是社会助建 18,000，自建 11,000。

费尔南德斯·索尔多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虽前进了一大步，但远未达到我们的目标，即实现最终消灭投机倒把的土地改革；改组及加强负责社会补助建房与私人自建房屋的管理机构；增加补助减少开支，以便使社会补助建房确是社会助建的，这些都是急待

解决的问题。”

政府及反对派一致认为，社会政策中有些情况是很恶劣的，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将来的任何一届政府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由国家财政金融情况来决定必要社会改革的速度及时间的长短。但是，倘若不注意社会改革的话，那么在最短时间内将会产生混乱。

向外国开放

下列数据证明西班牙与外国的经济联系是何等的密切：第一、西班牙每年要进口 400 亿马克的货物，同时出口 200 亿马克的货物；第二、单单 1975 年 1—6 月流入西班牙的外国资本就有 23 亿美元；第三、去年又有 3,000 万游客光顾西班牙；第四、还有 250 万西籍工人生活在西欧各国。

跨国公司已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在向西班牙投资之前，首先向分驻马德里、巴塞罗那、布鲁塞尔或纽约的“杰·安·加里格斯”办事处征询有关的建议。这个事务所的三十三位律师由西班牙的富豪家族的后裔安东尼奥·加里格斯·瓦尔格领导。他的父亲是国王第一届政府的司法部长，哥哥是“民主党”的创建人，而他本人则是阐述西班牙必须与外国积极发展经济关系的原因的发言人。这个关系将来是否还是如此密切呢？还是应估计到，西班牙的民族主义和保护关税的倾向会抬头呢？当然，首先要了解：他的政治见解及其目的是什么？

虽然他诉说工作太忙，还担任福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瑞士劳力士公司西班牙子公司的董事，但和比他大一岁的哥哥一样，并不少参与政治。他哥哥华金 1975 年初放弃经商，全力以赴投入政治。“目前西班牙正处在政治上的歇斯底里时期。因而许多有

良好意愿的人稍不留心即会引火烧身。我想稍待片刻，既不放过任何一幕政治好戏，也不过于束缚自己。我估计 1976 年秋将登上政治舞台。”

但安东尼奥·加里格斯·瓦尔格的说法与他本人的许多报告，报上发表的文章及与记者的谈话是有矛盾的。这证明了许多观察家的看法，不论是他还是他哥哥都不愿放弃在佛朗哥之后尽快上台的机会。对西班牙人来讲，他的政治经济见解并非秘密，其中也包括了他们对佛朗哥的有褒有贬的评价。“我认为，佛朗哥是内战不可避免的结果，并是西班牙人政治上无能的证明。我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代替我们缺乏政治天赋的个性。因而我们也曾准备把权完完全全交给他。在这个悲惨的全景中，佛朗哥对政治生活很少赋予思想内容，但在西班牙生活的许多方面作出了很多实际成绩。”

他害怕，佛朗哥死后会由于西班牙人缺乏政治经验以及政治上不够成熟，以致要求一个新的强有力人物的呼声会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他出自对佛朗哥继承人的同情而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胡安·卡洛斯是一位波旁王族，因此他的成熟期要长一些。但他具有明显的政治本能。起初他肯定处在拒绝任何变化的右派的强大压力之下，但我深信，他的年青、国际接触及其性格会使他采取逐步的稳妥的但是决定性的开放政策。”

安东尼奥·加里格斯·瓦尔格属于民主反对派中少数几个赞成建立政治联合会的政治家之一。这并不是由于他相信这个组织，或从理论上认为它是尽善尽美的，而只因为认为它是逐步实现民主的一项试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认为它对西班牙的政治前途是至关重要的。

他对西班牙经济前景满怀信心。他既不否认通货膨胀问题的存在（认为这是石油危机的结果），也不否认目前的衰退会对就业

及繁荣造成危险。尽管这样，他预言西班牙将有一个真正的经济飞跃。在他眼里，欧洲已精疲力竭，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经济上是没有前途的。而法国也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经济的不景气现象。只有联邦德国才是真正的经济大国。而西班牙因还有意想不到的增长可能性，因而它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为了让经济飞跃纳入正确轨道，需要主管人的才能与决心。

安东尼奥·加里格斯·瓦尔格在经济结构上不大主张搞激进的变革。但他也主张彻底改革经济官僚制度。“一个象西班牙这样的国家根据其现有的财政金融秩序（偷税是天经地义的，而老老实实上税却是破了例）是根本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只有当偷税漏税被提高到一种应受惩罚的犯罪行为时，才有接近解决问题的机会。”

他希望实现的第二项改革是，通过银行之间竞争的激化以及削减银行目前对工业的权利来改革财政市场。第三他认为外国银行的知识以及更强的竞争能力将有利于本国银行业整个经济的发展。所以他希望取消对外国银行的限制。

最后一项改革愿望只得到几位反对派政治家的同意。左翼以及许多右派集团认为西班牙是过于依赖外国了。譬如右派自由主义者塔西托在马德里《终极报》的一篇社论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已经到了应该对外国投资进行调整，以及严格地选择和控制在控制外资的时候？在这点上他与左翼政党的看法是一致的。

至今的历届政府在这点上与加里格斯·瓦尔格的想法相似。也就是强调外资的贡献。1975年1月当时的商业部长内姆西奥·费尔南德斯·奎斯塔承认：“收支差额的扩大毫无疑问是我们的最大忧虑之一。但我们不要忽视，没有外国信贷及投资，这个窟窿就会大得多。”

自1959年开放了经济及贸易限制后，美国及西欧的大企业争

先恐后地跑到西班牙来投资。商业部估计，1959—1973年间外国投资的总数达2,180亿美元。外国公司的投资活动使西班牙的净收益从1959年的8,800万增加到1965年29,200万和1973年的68,200万美元。换句话说增加了七倍。

在有些行业中外国企业的影响特别明显。譬如，1973年轿车及卡车市场50%以上是牢牢掌握在克莱斯勒，雷诺，莱兰(英国)，西特龙，费亚特，奔驰，大众，迪尔，马赛—弗格森等家汽车公司的手里。自1976年起还要加上福特公司。电气工业及化学工业是外国投资优先的部门。其40%控制在外资手里。在西班牙通过子公司作代表的德国电气康采恩及化学康采恩的名单很长，它们是布劳恩，通用电气器材公司，西门子，赫希斯特，巴登苯胺纯碱公司，矮克发—盖瓦埃特，拜耳，柏林格尔等公司。

造成西班牙最近几十年有大量外汇富余的原因，不仅仅是外国投资的关系。在国外的西籍工人，尤其是旅游收入有助于填补日益扩大的贸易差额。1960—1973年间进口支出从7.21亿增加到96亿美元，而同期出口收入只从7.25亿增加到52亿美元。也就是说1973年贸易逆差为44亿美元。上述逆差由于石油危机又增加了一倍。

至1973年，旅游收入的确平衡了贸易逆差。旅游业的繁荣使西班牙外汇收入从1960年的2.97亿增加到1973年的31亿美元。尽管西欧经济发展停滞，但旅游人数减少不多。而1974和1975年收入还是略超过30亿美元。每年3,000万游客以及自1950年至今250亿美元的总收入，光这两个数字就能说明旅游业的重要性。

对旅游人数及外国投资的估计表明繁荣远未结束。第三个发展计划估计外国游客的人数还将增加一倍，到1980年将为6,000万。虽然这个计划对七十年代末的外国投资规模还不敢预计，但

加里格斯·瓦尔格却坚信，外国投资也将大幅度增加。“当然，自1959年来外国投资猛增了许多。但与联邦德国、法国或英国相比，总的规模仍是微不足道的。假如西班牙的政治前景短期内就能明朗，并克服经济危机，那么西班牙将重新吸引许多外国投资者。”

他列举了下面各种原因作为他抱乐观态度的理由：“第一，西班牙虽还不是第一流的工业国，但它已有明显的工业传统；第二，工资水平近年来虽增长很大，但大大低于欧洲的平均水平。而工资因素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因而这点也十分重要；第三，西班牙远未达到其繁荣极限。资本虽小也是可以赚到大钱的，特别是如果西班牙能参加欧洲共同体，那么情况更会如此。”

加里格斯·瓦尔格只部分接受反对派反对外国投资的理由。“不应该对外国资金和民族资本一视同仁。而主张西班牙取消外国经济存在的人对外国资本却另眼相看。跨国公司并不是慈善的好好先生，所以他们偏爱繁荣部门以及工业集中的地区。尽管这样，他们对西班牙经济的发展还是有大功的。其投资一直占国家收入的20%左右。就是说每五个工作位置中有一个得感谢外国公司。另外这也有助于支付平衡。

对欧洲与美国康采恩的投资阻碍了本国技术的发展（西班牙为外国专利提供了比为本国发展更多的资金）这样的非难，瓦尔格回答如下：西班牙孤立这么多年后需要补充大量技术，假如西班牙不利用众所周知的发明和技术的话，是违背经济常识的一种做法。

根据他的意见，国家不应为专利及其他科技成就支付过多。他认为，通过颁布合理而灵活的法律还是能控制外国企业的投资活动。因而他和同事们积极参与了1974年10月新国家法令的制定。“对某些条文的重新解释将加深外国投资者对这些条文的理解。而管理机构也能更好地贯彻执行。而过去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释，甚至可能有曲解。总之，西班牙对外资基本肯定的立场不变。”

根据瓦尔格的看法，即使在以后若干年内外贸政策的自由化原则也不应改变。“由于各国政府都认为有必要扩大其影响范围，而在国际经济关系上都以保护贸易的措施来回答本国遭受的打击，因而在全世界经济自由主义越来越受到限制。但我坦率地承认，我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偏爱将与日俱增。”

法国计划的西班牙版

佛朗哥政府在五十年代末就已明白，只靠国家工业局是不可能领导经济的。制订稳定计划及实现外贸自由化后若干年中增长率虽少，但却十分稳定。此外，这几年也为第一个发展计划作了准备。

开始制订计划时是完全照搬法国计划的那一套东西。第一个计划（1964—1967年）只不过是原来巴黎计划的翻版。马德里没有考虑两国不同的经济结构，而接受法国人的目标，即首先是达到经济繁荣，而采取的方法是引导私人经济，压制国营经济。

第二个计划（1968—1971年）及第三个计划（1972—1975年）对西班牙特点及问题有所注意。但指导方针仍然不变，而在这方面改革的钟声早就该敲响了。尽管每年达到的增长率近7%，按人口平均收入增加了四倍（即收入为2,000元），略超过过去十年，并有了50亿美元的大量外汇储备。这一切使许多观察家在1974年底有理由沉醉于西班牙经济奇迹。但是有得必有失，与此同时出现了物价飞涨；个人之间与区域之间在收入和财产分配上的两极分化；以及上述原因而造成社会不满增长。

拉蒙·塔马梅斯在他撰写的几本书中分析和批评了西班牙经济计划。他的犀利的文笔，他的政治地位与他的奇妙的崛起使美国《时代》杂志在1974年7月把年方四十的塔马梅斯（他自认为是

民主主义者及马克思主义者)与胡安·卡洛斯,尼古拉斯·佛朗哥并列为西班牙未来的政治家。他成了报章杂志上的风头人物。

马德里《经济现状》周报这样描述他的特点:“始终站在战斗的前沿;好争论;好为会议致开幕词和闭幕词;穿着讲究;爱讲恰如其分的笑话。当他动脑子的时候就在小纸片上画起复杂图案。他一直享有温和改革家的声誉,并总与企图争取他的公司发生争论。”

《时代》杂志这样称颂他:“长期以来塔马梅斯是马德里大学最著名、最受爱戴的经济学教授之一。他因著有《共和国 佛朗哥时代》而被公认为合格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分析家。人们曾推荐他为财政部长的候选人,他将在西班牙合法反对派(佛朗哥下台后即可允许存在)中占据领导地位。”

拉蒙·塔马梅斯纠正了《时代》杂志一文中说他曾任佛朗哥财长的错误。他鄙视已故的军事独裁者。“他在最后几年已不复存在,而其政治经济上的狐群狗党则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也直截了当地承认,他参加了民主委员会。“我认为,民主委员会能为反对派的统一纲领组织提供基础,当然还没有做到这一步。另一方面民主委员会与统一纲领组织有许多共同声明,这表明,各个反对派可能进行有效的合作。我也认为,这是值得庆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对国王的政治未来不抱希望,如同他不太相信西班牙能按部就班地发展到民主国家一样。“胡安·卡洛斯拿了一手好牌,但还是输了。他是政府的一员以及他与政府的关系是他无法否认的。最后几年他若对佛朗哥及其走狗保持中立的话,他或许会被反对派所接受。当然胡安·卡洛斯背后有军队支持。但我不相信,他会盲目服从任何政治集团。人民对他冷淡。”

塔马梅斯反对政府并非没有个人原因。1956年他曾坐牢三个月。虽然1962年他已履行取得讲学的一切条件,但至1967年才聘请他当了教授。1975年他在海峡群岛的一次会议上谈了他

对西班牙未来政治经济的看法。而当他回到马德里机场时，警察已在等候他，在没有说明理由的情况下逮捕了他，单独拘留了三天。直到审查了会议记录后才重新释放了他。

对西班牙经济状况他说过：“我认为，我们远未达到成年阶段，因而衰退很易演变为萧条。物价将上涨，工人失业人数将继续增加。贸易还将长久出现逆差，经济增长率徘徊在零上。此外投资活动也因政治不稳而受到阻碍。而改善机会甚少。假如石油输出国猛提油价的话，那么西班牙就完了。”

他把经济上的困难归罪于最近十二年来错误的经济计划。在他著的《西班牙经济指南》一书中他对三个经济社会计划作了估价。第一个计划是根据下列假定，即根据1%的人口增长率以及5%的生产增长率得出国民收入增长率为6%。1964—1967年间国民收入平均以6.3%的增长率达到了上述目标，以此实现了计划规定的最低要求。

但是在上述四年中既没实现国营企业的现代化，也未扩大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至于宣布的国家统计局的改组以及公布统计数字一说均未兑现。曾试图以七个工业发展部门来减缓区域不平衡的试验也以失败而告终。宣布的改善农业结构以及发展外贸从一开始就搁了浅。

官方计划的投资额实际上只完成77%，而建筑业、旅游业及汽车生产均猛增并超过计划规定。物价也飞涨，1965年增加了13.2%。而1966年和1967年分别增加了6.3%和6.4%。

物价令人不安的上涨迫使政府于1967年底制订了一个稳定计划，其重点是冻结工资以及冻结部分物价。除此以外，当英镑贬值时，比塞塔也贬值16.6%。第二个计划原定1968年1月1日开始，为期四年。但为适应新的条件只得推迟一年才实行。

第二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国民收入实际平均增长率达到

5.5%。保持低失业人数。而游客带来的美元、马克、法郎等继续平衡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和扩大黄金外汇储备。而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变得明显了(大大超过欧洲的平均水平),这是最令人忧虑的。

第三个计划有些新内容:第一,设想了的1980年;第二,加强社会重点;第三,答应对区域政策给予更多的注意。并提出年实际增长率7%为目标。并宣布了九十五项十分具体的国家计划。

根据他的看法,“1980年远景规划”是朝正确方向前进了一步。但也暴露了许多问题。譬如应根据怎样的假定来计算1980年国民经济数字?政府对西班牙和欧洲共同体之间的未来关系是怎么考虑的?另外,到1980年,一个经济及社会现代化的西班牙怎样才能相容与“自给自足”和“落后”政治制度呢?

总的来说,加强社会福利及区域政策的计划不止一次地搁了浅。尤其在最近两年中,有关经济发展的估计与现实之间真有天壤之别。西班牙最大汽车制造厂主席称1974和1975年为“灾难性的两年”。1974年国民收入虽然实际上还有所增长。但一年之后,西班牙的增长率也变成了零。

许多西班牙人把迅速发展的通货膨胀视为第一号问题。1971年通货膨胀率为7.5%,1972年为9.5%,1973年为14%。而1974年创了纪录达18%。1975年略低一点。专家们估计今后几年内物价还将飞涨。失业日益增多使政府忧虑重重。政府尤其对这样的估计感到不安;以后几年中生活在欧洲的大部分西籍工人将有可能返回本国。

1974年统计提出最保守的贸易逆差为80亿美元。多亏外国投资、从游客身上赚来的外汇及在国外西籍工人的外汇,才使黄金外汇储备损失限制在近10亿美元。1975年的情况和1974年差不多。

经济上的突然挫折使大部分西班牙人大吃一惊。拉蒙·塔马

梅斯认为，经济上的逆转除了石油危机这一原因外，还有另外两个主要原因：社会紧张和政治上日益不稳定。

为了爬出深渊，经济及社会计划需要有新的内容：“依我看，西班牙不需要指导计划或强制性的计划，也不需要集中行动，而是需要一个改革现有结构的计划。换句话讲，为能充分利用本国的经济力量（它比技术专家承认的大得多），必须清除目前存在的各种阻碍。”他列举了十项紧迫的改革：1. 银行国有化；2. 税收改革；3. 改组国家企业；4. 土地改革；5. 促进研究和发展；6. 准许工人有不受限制的罢工、组织自由工会以及企业基层组织权利；7. 国家结构实行联邦原则；8. 重新阐述区域及城市化政策；9. 改革管理机构；10. 准许有基本的民主权利。

众所周知，佛朗哥政府并不准备实现上述大部分改革。第四个发展计划（1976—1979年）公布的方针表明，不仅现在而且将来都要保留老的计划蓝图。根本不想进行彻底改革。而假若塔马梅斯成为民主选举的政府成员——财政部长的话，则将实现上述十点计划。但不是象葡萄牙那样仅在一年内就实现，而是在更长的时间内。“我越上年纪就越相信，挥手間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错误。想抄近路走捷径将来总要付出代价的。应当首先树立自由和民主。然后才能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而奋斗。”

拉蒙·塔马梅斯乐观地看待西班牙的未来，“政府非难反对派，认为反对派对未来持否定态度。根据是我们认为，至今的政策不够进步，并且是从错误的前提出发的。而实际上佛朗哥的追随者才是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不相信西班牙的能力。他们以暴力手段压迫人民，并依靠外国康采恩来实现西班牙经济的繁荣。我们才是乐观主义者，我们认为，不仅在高速发展国民经济上，而且也在实现对现有财富更为合理的分配和在改善生活水平上，将来能够搞得比今天更好。”

三、佛朗哥的经济遗产

社会冲突

拉蒙·莫罗多在研究“社会不安，其原因及可能的影响”。他是受人尊敬的著名社会主义者恩里克·铁尔诺·加尔班的学生及最亲密的合作者。莫罗多本人是政治家和科学家。他年方四十，但已是律师及马德里大学国家法及宪法学教授。他被视为典型的勤勉开明，富有同情心的反对派政治家。

平民社会主义党总书记拉蒙·莫罗多认为：“过去一直是有罢工的，也是被许可的。但官方不承认有罢工。”尽管如此，在最近几年内文件上的罢工人数还是在不断增加。

1974年的大会报告列举了1973年的数字：有811起罢工，由此损失1,100万个工时，参加的人数超过40万。罢工最多的省份为巴塞罗那和吉普斯夸。受工资纠纷影响最大的要数金属、纺织和建筑业。

在欧洲，西班牙失业人数排在意大利、法国及英国之后，但在西德、比利时、荷兰及丹麦之前。当时许多观察家推测，1974年罢工人数还要多。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根据西班牙工会总书记的说法，1974年是充满社会冲突的一年。官方记录的罢工次数超过2,000起，参加人数为70万，损失1,800万个工时。

莫罗多认为，工资纠纷日益增多是今日西班牙的特点，它是政治经济不稳定的产物。“由于去国外的移民，外国投资及旅游的关系，西班牙经济近年来经历了巨大的飞跃。但国际经济危机造成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其特点是通货膨胀率高，失业增多以及贸易逆

差增大。由于各阶层对经济形势的不满，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不稳定。”

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工资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许多在国外的西籍工人的回国，通货膨胀（如世界各地一样，肯定是小百姓遭殃）以及工人阶级自信心的增强，所有这些，一方面导致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加深，而另一方面也使工人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加剧。一轮新的工资谈判本来是用来提出经济及社会要求的，但也用来反对政府。”

1974年底到1975年初，在西班牙最大汽车厂赛亚特爆发了持续三个月的冲突是一典型事例。自1974年10月开始的一轮工资谈判起，工厂中几乎每天不是这个部门就是那个部门举行罢工。根据赛亚特发言人提供的数据，这段时间内生产损失超过5万辆汽车。

该企业领导于1975年1月9日宣布开除将近400个职工，并让28,000名工人中的21,000人从1月10日到15日停止工作，作为对持续骚动的报复。之后一周内，遭殃的人在巴塞罗那街道上示威游行的次数剧增，有关与警察发生冲突以及别的工厂对赛亚特职工的声援活动的报导也增多了。

组织首批罢工的重点要求是提高工资30%以上。企业领导指出停车场当时还有10万辆汽车待售，并因石油危机汽车行业前景暗淡，以此拒绝了工人的要求，并单方面宣布减少工作时间。至11月底以一个折中方案结束了官办的企业委员会与董事会之间的谈判。但新协定并没得到职工的同意。

所以，以后几周不定期罢工的目的在于推倒负责缔结新协定的企业委员会，并以工人真正信得过的人来取代之。至今国家严格控制企业委员会的选举，这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在绝大多数大型企业中除合法的企业委员会（由政府心意的代表参加）外，

还有第二个代表机构（由真正的工人代表参加，他们往往是共产党员或社会党员）起着作用，并被许多企业领导当作实际的对手。

赛亚特并非是近年来受罢工浪潮折腾的唯一大型企业。1974年11、12月许多银行分行和保险公司分公司发生了罢工。发生罢工的外国子公司名单很长，其中有皮雷利，法萨—雷诺，西班牙奥利夫蒂，通用电器公司，奥希及博施等。有三起事件使社会不安加剧。1974年10月奥希和法萨—雷诺汽车厂的车间被烧毁。10人死亡，无数人受伤。1975年11月马德里郊外的卡莱斯勒工厂也遭到类似的灾难。虽然不能证明这是一起破坏活动，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不但越来越多的工人参加罢工，而且至今作为政府支柱的中产阶级也参加了进去。西班牙市场大厅的商人1975年初决定罢市，这是因为有一名商人在行诈时（他的磅秤不准，给的份量不够）被两名检查人员捕获。这个抗议如同许多部里自发的罢工一样是辱没国家威信的行动，当然也表示对公务人员制度的不满。

有500名公务员签署的声明提出下列五点要求：由自由选举的议会监督公务活动；有权组织公务员工会；取消行政特权；在国家机关中制订鉴定成绩及提升的客观标准；并实施按成绩发放解雇金的办法。

去年头几个月演员也举行了罢工，但并不是强行要求更高的工资，而是为罢免在职的工会代表。戏剧及电影业和赛亚特工厂一样也要求允许他们信赖的人作为与官方谈判的对手。公立医院年轻医生的造反是中产阶级参加西班牙社会抗议运动的另一个证明。1975年夏，这个冲突以开除1,500名医生而达到了高潮。其中一部分后来又被吸收回来。但对报酬过低，工作时间过长以及主任医生过于掌权的不满依然如故。

但至今，作为反对派斗争手段的纯政治罢工仍被禁止。唯一例外是1974年12月11日在巴斯底号召举行的总罢工。它是声援进入绝食斗争的156名政治犯的游行示威。响应号召而参加游行的人数超过20万，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1975年春，在复审非法工人委员会的马塞利诺·卡马乔以及其他9名新的领导人员时，工人委员会曾试图组织群众游行示威，但没有成功。在初级法院中他们总共被判处142年徒刑。在复审中减刑为38年。减刑后他们全部被释放。当时只有一些职工举行了短时间的抗议罢工；但没有发生更大的事件。

在马德里大区，西班牙共产党号召的总罢工也得不到太大的响应。宣布为工人斗争日的1975年6月6日这一天过得也比预期的要平静得多。在马德里大区中，在职人数超过100万。根据组织者乐观的估计，约有10万人参加示威游行。而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只有一些建筑工地、报馆、工厂、银行及保险公司中约2、3万人参加了游行，罢工半至两小时。而大学生和工人组织街头示威的企图还在萌芽时就被警察血腥地扼杀了。

几天后，在巴斯底和巴塞罗那组织的工人斗争，有近10%的工人响应左翼政党的号召，成效稍大一点。但看来人民中追随共产党的人并不多。

但除上述情况以及害怕橡皮棍和逮捕外，还有另一个决定罢工失败的主要原因：工人和职员害怕罢工可能造成西班牙多年来从未经历过的经济衰退。石油危机后，物价开始飞涨，以致许多西班牙人简直不能以薪水来维持生计。

由于月底没钱买汽油，所以大城市的汽车破纪录地急剧减少。夜总会及餐厅老板也诉说客人减少。西班牙人以奢侈生活（早就有讲究吃的嗜好）维持的消费繁荣也破灭了。

1974年秋冬两季的多次罢工是对上述情况发展的首次反应。

但后来有一段时间工人阵线的情况很平静。我们可以下列数据作证：去年头十个月只有 723 起罢工，参加人数为 37 万 5 千人，损失了 900 万个工时。随衰退接踵而来的是失业，这是西班牙人几乎没有经历过的另一个社会弊病。过去几年中，从穷地方来的没有工作的人可以到大城市或国外去找工作。但最近几年这种机会减少了。怕丢掉饭碗的心理因而增加了，而主要原因是由于许多企业利用非法罢工及政治性抗议活动借以开除职工，以缩减开支。

但形势随佛朗哥去世而变化。规定在 1976 年冬实施的许多工资协定以及新的政治形势都导致群众性罢工运动的兴起。1 月初马德里地铁近 4,000 名职工参加的为期五天的罢工就是明证。不论政府（以其改革声明）还是反对派（以其乐观的目标宣言）都没能成功的事，地铁员工都立即做到了：与资方不断进行谈判。

这表明：西班牙工资纠纷已根据新的比赛规则在进行了。职工更自觉更勇敢地为自身目的（提高工资和要求更多的社会保险）而斗争。而老板和企业领导也不再躲在条文乃至国家的后面，而是准备接受提出的要求或以相反的理由进行反驳。政府避免加剧冲突或恐怖。它重视稳定与秩序，但它不利用一些无足轻重的机会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以及动用警察。

地铁工人为什么要罢工呢？1974 年 6 月通过了一项两年有效的工资协定。双方同意地铁员工在当时的车票提价中分享好处（票价从 4 比塞塔提高到 7 比塞塔）。1975 年 8 月，公司再度把票价提高到 7 比塞塔，相当于 30 芬尼。这促使职工代表再次要求从这笔附加收入中分享一部分。

直至今年 1 月，私人控制的马德里地铁领导拒绝对此进行谈判，并指出，现有的工资协定并未规定工人在车票提价中分享好处；费用开支爆炸般地增加（也由于一年半前协商的增加工资所

致，每年直线增加 42,000 比塞塔，即 1974 和 1975 年分别增加 15%)；去年 5 月的关于调整工资纠纷的法令。资方以此作为拒绝谈判的理由。

当所有的谈判可能性都消失时，当 60% 的职工都赞同罢工时，罢工就被认为是合法的斗争手段。但如果在解释已有的协定时出现问题而进行罢工，或在公务机构中罢工仍是被严格禁止的。

因此，地铁冲突属于被禁罢工之列。尽管这样，近 4,000 名职工还是宣布罢工。他们日以继夜地聚集在马德里各教堂中等待冲突的结果。他们的理由是，月平均工资只有 15,000 比塞塔，而物价飞涨超过预计。所以要求特别追加 15,000 比塞塔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1970 年马德里地铁员工曾举行过一次类似的罢工。当时西班牙内阁决定对职工进行军队编制。职工面对这种威胁性的应急措施决定复工。因而这个措施未被执行。政府认为不立即对这次事件进行严厉抨击是适当的。它只是为应付最重要的几段线路的交通而派出了一些运输部队。此外，政府宁愿留在幕后，这样就为冲突各方提供了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可能性。

这种做法收到了效果。五天后地铁又恢复了正常。由于罢工经费用完了，双方又都准备谈判，使得地铁员工投票赞成复工。而公众并未对结束冲突施加很大的压力，即使每天搭乘地铁上下班的 200 万马德里人也很冷静地对待由罢工所造成的不便。

当然这次地铁罢工的影响比主要以工资政策为目标的罢工来得深远，后者有邮电和铁道员工(政府动用了军队)以及马德里金属、建筑、银行和保险公司工人罢工或从外省传来的为数不少的罢工。不平静的冬天在扰乱中开始了。佛朗哥时代虽也有过罢工，但现在与过去不同的是，政府和警察力求少当主角，而多当调解人。

莫罗多认为，今后的日子将以更多的社会不安为特点。他举

出三点理由来证明他的看法：

第一点，至少在佛朗哥去世之前，还是搞血腥镇压的强硬路线占上风。目前虽然方法有所改进，国家的行动不都是明显地针对工人运动及公开反对派的领导人。但是，另一方面，持不同政见的西班牙人却越来越觉察到了这种压力。它势必产生仇恨及反作用；

第二点，社会和平是一个空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在西班牙，是不存在社会和平的；

第三点，只要旧政府继续掌权，则持不同政见的政治斗争就将继续下去。罢工是进行这种斗争的手段之一。

拉蒙·莫罗多认为，更换政权是西班牙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首先必须尽速改变政治制度，而经济改革必将自动随之而来。光有一个反对派并不能达到用民主来代替现政府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有的反对派政治家必须建立起非阶级性的联盟。”

这个信念也是铁尔诺·加尔班与莫罗多同共产党及其它反对派建立民主委员会的原因。而西班牙其它社会主义党考虑到同西班牙共产党建立关系为时过早，因而决定与基督教民主主义者成立统一纲领组织。

莫罗多承认这个理由，但不同意它。“我认为，许多社会主义者及基督教民主主义者没有完全真正地领会民主委员会背后的意图。从独裁过渡到多数人民主的过程中有必要建立各反对派的反法西斯联盟。在第一阶段的任务胜利地完成，每一个组织就可以独立发展了。”

共产党在民主委员会中占优势这点似乎并没使莫罗多担心。“我不能理解，为何一再批评民主委员会被共产党所控制。根据经验我知道，这不是实际情况。他们或许比其它组织来得积极，甚至

可能有更多的党员。但从长远来看,这并不意味着,在自由选举时它也能得到更多的选票。另一方面,西班牙共产党是一部分居民的重要的代言人,轻视它是不现实的。这是个大错误,正如我们拒绝冲我们而来的外国资本一样。”

3,500万西班牙人中约有1,400万职工。毫无疑问在这1,400万人中间,甚至在3,500万人中间,多数是既不同情政府也不同情共产党的。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在西班牙的自由选举中社会主义者能够得到许多选票。可是与葡萄牙的情况不同,在西班牙没有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党,而是存在着许多小组,并且互相找麻烦。莫罗多接着讲:“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也有这种情况。但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者之间可能最为严重,他们各持己见,有时甚至发生冲突。尽管这样,我认为在废除旧政府的过程中,各社会主义小组之间的合作会更密切,最终它们有可能联合成一个党,可以把这个党看做是平等伙伴之间的联盟。”

陈腐的工会

西班牙工会是如此混杂,以致佛朗哥最后一届政府的劳工部长亚历汉德罗·费尔南德斯·索尔多在他任职期间从未出国访问过。他的前任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在出国访问时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向主人解释西班牙的工会制度。

在西班牙工会法的范围内如何举行一轮工资谈判呢?首先在公司一级举行,即在公司领导与职工代表之间进行。若双方还不能达成协议,则由省工会代表机构发布一道有关调整工资的命令。而工人这时只能通过罢工来反对。

西班牙禁止罢工约有40年之久。自1975年5月起,罢工才被政府承认为合法的斗争手段,但要在谈判已不可能而且必须有

60%的职工赞同罢工的情况下才可以举行罢工。实际上，在这以前已通过罢工来反对省工会代表机构发布的调整工资命令，并且罢工次数也越来越多了。超过局部和地区范围的问题，则由全国总工会来决定，劳资双方在政府的监督下派代表参加。

六个月后首批数字表明，新的罢工法令博得的赞同超过了专家们起初的估计。在152起工资谈判中，有10万名工人在秘密表决中决定遵循法令规定的途径直至最后采取罢工，企业领导与工人能达成解决冲突的协议占上述情况的90%。剩下的需由工会组织插手决定。

同样使人感兴趣的是，不是总能达到赞同罢工所需要的60%的票数。在坎迪乌矿山(属国营北部煤矿公司)，巴塞罗那的德斯利特工业公司以及其它几个地方，40%以上的职工反对罢工，这证明经秘密投票有时得出的结果不同于工人领袖的设想。这也证明，西班牙工人并不是不讲一切代价就同意罢工的。

当然，限制罢工法公布后，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罢工是在违反罢工法情况下举行的。这是由于上述特别复杂的谈判程序以及工人目前对政府的所有声明及改革一概持怀疑态度所致。

费尔南德斯·索尔多就职时也曾许诺对工会制度进行改革，即使实际与愿望接近一致。“工会的特点不应是服从和被动的，而应是负责和参与决定的”。这个有种种限制的罢工法只不过在所宣布方向上前进了一小步。第一次允许劳资双方各有自己的联合会也不过只是前进了一小步而已。受禁止的工人委员会(照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的说法，工人委员会抱有社会目标及政治目标)由于在企业中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而被排除在联合会之外。此外，国家并没表示会放弃在统一的工会中的影响。

另外，迄今的计划正勉强地给“工会以参与决定”的权利。但这些计划目前仍局限在通过企业领导反映职工的意见。因而，不

能侈谈工会真正参与决定，例如还不能象西欧那样实行工资自治。

西班牙工会结构已产生了一些变化。其结果是选举工人代表。在1975年6月举行的选举中工人可以重新选定287,589名代表。工人代表的任务是在工会中代表工人的利益，并从中选出企业委员会。

提出的候选人要够下列两个条件，一是至少在所在单位工作两年；二是候选人不是下台的工会干部。虽有上述限制，但许多工人和职员都报名当候选人。受共产党影响的工人委员会和社会主义工人组成在不少单位里以民主委员会候选人的名义提出共同的候选人名单，而在有些单位中他们各自进行竞选。

这些组织在多年处于地下之后决定参加这次选举，其原因是公开选出的代表更能维护其追随者的利益，并且可在工会组织中造成一些变化。

除反对派名单和许多无党派候选人外，主要的还有一个官方工会候选人名单。在这个名单上的工人代表都是忠于政府的老人。社会主义劳工总联盟抵制了这次选举。

竞选的各方对选举的结果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三个数字是没有争议：第一、参加选举的人数占职工人数的88%，超过预计的数目；第二、重新当选的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3%，比率低得惊人；第三、工人代表的年龄降低了10—12岁，这是因为当选代表的65%以上都在40岁以下。

谁是选举的胜利者，只有天知道。费尔南德斯·索尔多及其同事根据他们的资料得出结论，当选的反对派代表总共只占代表的2.5%，在650个冲突频繁的大型企业中当选的反对派为15%。而工人委员会及其同盟也庆祝这次选举，并视为本组织的巨大胜利。按他们的说法，在马德里，巴塞罗那，西班牙北部，塞维利亚，巴伦西亚工业区中，他们的代表有50%当选。在西门子，西班牙

牙奥利夫蒂，索尔瓦伊及西班牙电视台中，反对派的候选人甚至100%当选。

下面的例子可说明，对选举结果双方看法是多么不同。官方宣布，有28,000名职工的赛亚特汽车厂中，共计45名反对派代表以及105名独立代表当选；而另一方得出的结果是，150名工人代表中有128名来自他们一边。根据工会提供的数字，在凯尔维纳托厂中最多只有20%的反对派代表当选，而根据反对派的报告却达100%。官方资料承认在克累斯厄和贝卡索厂分别有20%和37%的反对派代表当选，而非法组织则认为是60%和90%。

对选举结果的不同解释是因为以不同标准来划分当选代表所致。工人委员会认为，不明确宣布当官方工会候选人的代表属于他们的行列。而费尔南德斯·索尔多把代表分成政府的，反对派的以及独立的，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当选代表的50%以上是年青开明、而且比较熟练的职工，他们既不与政府一致，但也不同意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观点。假如他们想在工会运动中干一番事业，他们就不该当候选人。而实际上，他们由于受野心的驱使，即想在下次工资谈判中为工人取得最大的经济及社会好处，因而还是当了竞选人。

费尔南德斯·索尔多认为劳工部长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把这批年轻的新生力量吸收到工会组织，从而吸收到政府中来。“假如我们没能吸收他们参加我们的政治团体，我们就打输了这重要一仗。”费尔南德斯·索尔多并不缺少好的愿望。他的后任鲁道夫·马丁·比利亚也被视为改革家，他打着新的政治招牌在西班牙可能会比他前任干得更好。

根据许多观察家的意见，微小的进步（主要是在近年取得的）不该使人忘记在西班牙根本没有西欧概念的工资自治。何塞·曼努埃尔·阿里雅是最熟悉内情的人之一。他41岁，是当选的工人

代表，并且也是西班牙第一流周刊《改革16》负责社会政策的主编。

他是这样评价至今的改革与1975年选举的：“工会组织是政府整体的一部分。政府若几乎不再演变的话，那就不可能期待在工会中会有巨大变革，可能另外会有一些自上而下的变化，譬如重新规定各部的职能乃至劳动与工会两部合一。也甚至会决定将劳资双方的组织分开。我并不想否定这一切。但这一切还不够，因为真正的工会改革须由下而上在民主和自由的进程中完成。”

阿里雅用和费尔南德斯·索尔多不同的立场来分析西班牙的工会。他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不属于任何左派政党，因为他认为，各社会主义组织首先需与过去历史脱离而联合成一个大的社会主义党。换句话讲，他是一个独立分子，也正是费尔南德斯·索尔多想吸收进政府的人。而阿里雅愿意与他合作吗？

“不，因为我不太赞成小步子前进计划。对我来讲，政府宣布的自由化及改革还根本满足不了我的要求。”他不相信，从专制能演变到民主。“能成功地完成这一过程，那将是历史的创举。”因而他也认为，胡安·卡洛斯当国王的时间不长。“他打出佛朗哥主义的牌，很快就将被前进的车轮碾碎。但他若打出民主的牌，那他登基不出一年就会被佛朗哥的狐群狗党所推翻。”

根据他的看法，西班牙经济的前景不妙，通货膨胀，失业，贸易逆差以及社会不安是形势的特点，并且还要持续多年。他对西班牙工会制度的发展是怎样看呢？“不管费尔南德斯·索尔多实施的变革还是选举均未带来很大的进步。只要旧政府还掌权，并由非选举产生的工会会员作决定，西班牙工会肯定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从理论上讲会出现我所担心的这样的情况，而将来的情况往往也就是这样的，即多数工人代表要求变革，但经过筛选后，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仍是保守势力。譬如在马德里，小企业比大企业多，这样在省工人代表的选举中，小企业保守的候选人往往有更

多的机会取胜。以后的情况将如此。”

这个工会制度发展的结果是，西班牙工会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在大企业以及一些小企业中，由工人代表产生的企业委员会，在有关经济及社会问题的谈判中它将是职工的真正发言人；第二部分在较高层领导位子上的工会干部，他们将比靠工运吃饭的人更富官僚习气。

阿里雅认识到，西班牙工会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他是够现实的。“此外，因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仍大权在手，所以今年最大可能仍是按行之有效的模式去建立工会组织。我甚至认为，在过渡时期仍保留统一的工会组织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由上面规定分裂统一工会组织的做法无疑是对工人阶级的一个打击。”

他对将来有什么估计呢？“一个自由的并是大家希望的工会组织是欧洲所有工会组织的最终目标和理想。即使在西班牙，工人在工会中自由决定其联合的时刻在二、三年内有可能到来。他们有必要进行选择，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会组织，还是建立几个工会组织。西班牙实现民主结构后，实现第二种可能性的机会很大。”

在国外的西籍工人问题

目前仍有250万西班牙工人及其家属生活在欧洲其它国家内。西班牙贸易逆差的平衡很大程度上依赖西籍工人给国内的汇款。1974年汇款额超过10亿美元。

由于西欧工业国家的经济危机，收拾行装试图到欧洲其它地方寻找幸福的西班牙人急剧减少。如1966—1968年以及1973—1975年衰退年份中，回国的比出国的多。在西德以及其它国家内停止使用西籍工人是造成下列情况的主要原因，即官方同意给外

国人的就业机会由1973年的16万1千个减少到1974年的10万个，汇款及资金转移从1973年的11亿8千5百万减少到1974年的10亿7千万美元。

西欧失业浪潮也冲击到西籍工人。在西德总共18万西籍工人中，从1975年到1976年冬天约有8千人失业。同时期在整个欧洲将近5万名西班牙人没有工作。所以，1973年有5万名，而1974和1975年甚至每年有10万名西籍工人回国，这是不足为奇的。现在还不知道，1976年有多少个西班牙人会回国。不同的估计之间相差很大。移民局局长霍尔达纳·德波萨斯认为，最多有10万名工人回来，而天主教移民委员会估计有20万名。

不久将来若真有大批西班牙人回国的话，则1976年的失业人数将会使人更加忧虑。官方统计的失业仅占2.4%的数字反映不出真实情况。总有25%以上的职工被迫从8点到15点在一家公司中，而从16点到20点在另一家公司中挣钱糊口。马德里调查报告得出这样的结论，中产阶级偏好于身兼数职。只要人们想一想，近12%的西班牙工人在身兼两职的情况下每月还只挣900马克，那么想身兼数职的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能挣到上述工资的二、三倍钱的人大多是生活在小城市及农村。不少工人还有一块地，周末搞一搞，或者有一个由其妻子经营的小铺子。在目前以衰退为特征的阶段中，某个企业决定辞退部分职工，那么这一部分被开除的职工就得开始过艰难的日子。他们的收入一般缩减50%。而那些另外还有一个工作或还有一个收入来源的人是拿不到失业救济的。

劳动力市场面临如此的形势，因而仍有不少西班牙人希望到国外去挣钱，这是不足为奇的。目前真想出去的人数可能不如1961—1965年多，那时每年出去10万名以上，也可能不会超过1969—1972年期间每年6万名。现在询问西班牙人是否愿意出国

去挣钱,往往仍能得到肯定的回答。马德里一位 25 岁电工与巴伦西亚一位 45 岁的机器装配钳工或有两个孩子的、丈夫是巴塞罗那卡车司机的清洁女工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不容易找到十分合适的理由来解释西班牙人仍要出走的现象。诚然,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低工资有一定的作用。至今,虽然西班牙人还是比德国人,法国人或英国人干得多挣得少。但另一方面,生活费用(住房,食品,其它生活必需品)低于北方诸国。近年来经济飞跃使 50% 以上的家庭能有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近 25% 的家庭有小汽车。按人口平均年收入超过 2 千美元。因而几乎不好说西班牙人“穷”,为生活所迫必须到国外挣面包糊口。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西班牙工作环境恶劣。尽管到 1975 年,作为工人斗争手段的罢工仍是非法的。但 1974 年还是 1936 年以来社会冲突最多的一年。这些罢工无疑是大部分工人日益不满的标志。不满情绪主要由物价上涨,工作不稳定,社会福利不足造成的,但这些仍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西班牙人仍有出走的愿望。另外,也不应该忘记,譬如在德国,大家都知道,在不少情况下,西班牙及其他外国工人因对工资及住房条件的不满而参加了罢工。

第三点要着重指出,对普通西班牙人来讲,出国几年已成了一种习惯。在六十年代,对许多人来讲肯定是不得不到国外去找职业。单单 1960—1968 年每年平均有几十万人离开农村。不是所有背井离乡的人都能在工业或旅游业中找到工作,因而他们不得不到国外去。目前情况已变了,变得不是那么紧迫了。不过,单在西德就有 18 万西籍工人,1973 年就汇了 8 亿 5 千万马克,其中许多人能在本国找到相应工作,但他们仍留在国外。

即使马德里第三大学(自治大学)经济学教授、44 岁的何塞·拉蒙·拉苏埃也说不明白,为什么在西班牙目前形势下还有

出走的人。他本人一度也曾在国外当工人，那是1965年在伦敦。他说：“我决不会忘记我当时的经历。”他以品学兼优完成了中学和大学的学业。现在他因其知识及专业而受到重视。工业部门（其中包括国营铁道），政府（住房建设部及商业部）以及反对派（圣地亚哥·卡里略，拉斐尔·卡尔沃·塞雷尔以及恩里克·铁尔诺·加尔班的民主委员会）都重视他的建议，这并不令人奇怪。

拉苏埃十分肯定在国外的西籍工人所作出的贡献。“首先要强调的是大量外汇收入。另外，这些到过国外的西班牙人以他们较高的生产率有可能促进繁荣。这是因为第一，许多人外出造成劳动力较为紧张。由此，部分工业被迫引进现代化的新技术；第二，这笔外汇使进口技术有了可能；第三，大多数出国的人在国外高度现代化的企业中受到了很好的实际锻炼，至少有些人带回了西班牙所不知道的知识。”

根据他的看法，对最近12年中生产增长率超过6%的西班牙来讲，其中20%到30%应归功于外出的移民。“在西班牙，也许人们并没有认识到采取相应的措施是可以减少向外移民的消极方面的。虽然，移民无疑也要增加一笔国民经济开支，但我们应更高度评价其积极方面的东西。”

不是所有专家都象拉苏埃那么看的。其中，有些人因移民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影响而对此持批评态度。在他们眼里，移民使整个农村地区人口减少，而在其它区域工资费用已升高到妨碍许多国内外企业投资的程度。根据他们的看法，还要强调指出，许多回来的工人很少愿意把他们在外国学到的东西为祖国服务。不少人只想在欧洲度过一段艰难岁月并挣得一笔钱后，在故乡买一家啤酒酒店或拐角上的小铺子。

大量外汇有好的一面，这是由于在商情好的时期它增加了经济循环中的流通。但根据发行钞票的西班牙银行的意见，在七十

年代初增加的流通对高通货膨胀率也是有影响的。近年来，从北非涌入西班牙的劳动力越来越多，这是西班牙反对向国外移民的另一个原因。随生活水平的提高，本国工人很少愿意再干收入低、又被人瞧不起的行当，如扫马路或开垃圾车。这种情况发展的结果是，在西班牙的摩洛哥人迅速增加，官方估计为6万名。另外，至少还要加上10万名非法入境的北非人，他们没有有效的工作许可证而逗留在西班牙。

15年来向国外移民的结果对经济领域带来好处也带来了害处。而对其社会效果，那不论是拉苏埃，还是其他许多西班牙人都是予以肯定的。“西班牙人在国外所受的社会教育及培养是不可低估的因素。这里，我不是指在工作中所取得的经验，而是指在一个陌生集体中从共同生活中所吸取的知识。所有外籍工人以一、二种外语进行接触。他们积累了新的生活经验，免费上了一堂实际运用自由和民主概念的课。当他们回国时，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水平也得到了提高，这是十分重要的。”

西班牙社会与人口的变化部分也应归功于向国外移民，但主要应归结到近年来的发展。这一切使拉苏埃乐观地看待西班牙的未来。“近70%的人民没经历过内战，而按人口平均收入却剧增，尤其在社会结构中已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有大批小企业主、职员和专业工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已提高到中产阶级。也真是这些人赞成政府实现民主改革，但他们从根本上来讲是保守的，他们害怕不安和混乱。而这也给了我希望，胡安·卡洛斯会实现政治开放的。”

他对经济的估计是：“西班牙吃亏在于不实行必要的措施来适应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多数成员国（可能除英国和意大利外）对大部分变化都已相应作了反应，特别在原料与能源上，而西班牙至今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阿里亚斯·纳

瓦罗政府只关心最低限度降低社会费用，因而它采取的措施不会超出政府资助消费促进繁荣以及按黄金外汇储备来吸收外国信贷等范围”。

他继续说道：“直到不久以前，上述情况的发展也曾使我担心过，因为我认为，以失业、贸易逆差大、外债多、物价飞涨为特点的经济状况对国王是一个过重的负担。但葡萄牙事件启发了我。假如，不是萨拉查存了并留下大量黄金外汇储备的话，近年来里斯本军事当局就不可能用现在这样的方式方法作出反应。所以，处于过渡时期的西班牙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就不再使我感到不安了。西班牙与外国的经济关系看来将增加，从而使西方世界更有可能对西班牙政治及经济的发展施加适当的影响。”

假如在国外的 250 万西班牙人中绝大部分在以后几年决定回国的话，那么西班牙就需要援助。按相应人数安排工作不是一件容易事。根据拉苏埃的看法，对这个问题作合情合理的解决首先需要时间，必须及时作出通盘考虑并制定计划，正如对待西班牙其它许多结构问题一样。

在他眼里，不仅农业，而且工业都迫切需要现代化和专业化。国营企业生产的货物与私人货物之间的分配关系也应朝有利国家的方向变化。对他来讲，税收改革与实施改善了的区域政策都是很重要的。同时必须尽快重新制定财产法及义务法以及改革社会保险。

这位经济学教授自认为是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者。许多团体对他这个人物是有争议的。西班牙杂志《经济现状》是这样描绘何塞·拉蒙·拉苏埃的：“这里谈的是不时出现在大学生活中的一位有争议人物。他是那种惹事生非的人。可以想象，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将走向何方。”但在与他的谈话中，很难得出上述看法，至少在他对佛朗哥的评价上反映不出来。“我对作为伟人的佛朗哥

非常敬佩，但越敬佩，我内心越充满了忧虑和怨恨。”另外，还反映在他对胡安·卡洛斯的同情上，他与反对派中多数人相反，他公开承认同情胡安·卡洛斯。

经济官僚制度及行政管理机构的 势在必行的改革

在《时代》杂志整理的45岁以下未来政治家的名单（这个名单是颇有争议的）上有三个西班牙人，其中第二位即是尼古拉斯·佛朗哥—帕斯库·德尔波比。他是独裁者佛朗哥的侄子，生于1937年，通过美国新闻杂志的介绍，才为西班牙公众所知晓。虽然他自1971年起就是国民运动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和议员，但至今他在政治上并不突出，致使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最后—任劳工部长费尔南多·苏亚雷斯表示，他至少认识二百个年轻政治家可顶替尼古拉斯·佛朗哥在名单上的位置。

显赫的姓氏以及政治观点上与他伯父大相径庭这一事实使得尼古拉斯·佛朗哥在西班牙五光十色的政治舞台上被认为是一个“怪物”。他在美国及西欧其它国家中的威望超过本国，可能是由于对许多外国人来讲，佛朗哥的名字是一个概念，也可能是，他们从另一个佛朗哥那里听到西班牙要求民主，这使他们感到惊奇，但还是可以接受的。

他在政府中地位虽不高，但他身兼议员，几个董事会的董事（至1975年10月他掌管诺罗埃斯塔塔银行，自1976年2月起他任韦尔瓦银行行长），西班牙葡萄牙贸易委员会西方主席（葡萄牙革命后照旧）以及其它的名誉职位。他是一位身兼数职的年轻经理。他生来就富有，并且作为有能力的经理人毕业于马德里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专业以及日内瓦的“工业研究中心”。

他的政治观点远远超过政府的观点。“西班牙向各种政治派别都开放。当然也对左派开放，因为有必要让给左派一定的合法票数以及相应的言论自由。没有它即不存在中间派，没有左派和中间派，右派就会试图进行暴力统治。”

他这样综合了自己的社会及政治信念：“在社会领域中，西班牙需要发展成一种混和制度。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我谈的社会未来是指社会机会的改善。我要把医院，卫生事业，某些基础工业以及服务业国有化。若信用业反应不够灵活时，也考虑对它实行国有化。在政治领域中，西班牙要成为民主国家。必须考虑公众舆论。因为人民是未来的主人，所以不能既藐视他们也不能不予理睬。政治家的最主要任务是在所有西班牙人中达到和解，并维护它。重新实现基本民主权利也是重要的。”

有些西班牙教士或政治家因公开主张西班牙成为民主和社会主义国家而坐进了监狱或长年被剥夺公职。有一次，佛朗哥政府的一名忠诚战士当着佛朗哥的面诋毁了尼古拉斯。独裁者对此作了如下的回答：“尼古拉斯的年纪和知识都已到了可有自己的看法并发表其看法的阶段。”

许多议员及佛朗哥政权的追随者特别感到生气的是，尼古拉斯·佛朗哥公开赞同进一步改革税收，并违犯了佛朗哥政权的特权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但尼古拉斯的辩护是有道理的。

在3,500万西班牙人中间有将近150万人（其中包括官吏在内）必须申报收入税。而偷税漏税乃是富人的一个癖好。尽管每个财政部长在就职演说中总强调改革的必要性，但至今没有一个人能有效地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

在财政部长阿尔贝托·蒙雷亚尔·卢克和安东尼奥·巴雷拉·德伊里莫手下当国务秘书的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承认：“在实现民主结构之前不可能处理这个棘手题目，因为税收改革应由议会

通过，而议会受极右翼控制，所以每个计划都被束之高阁。我当蒙雷亚尔助手时，财政部曾拟了一份共有四卷的白皮书，递交给佛朗哥将军。我相信，它正搁在那里吃灰呢！”

阿里雅·纳瓦罗总理是最后一个敢于接触这个题目的乐观主义者。在1975年6月24日议会的演说中，他宣布在一年内公布税收改革的白皮书。但怀疑论者认为，这只不过是又一次争取时间而已，但话也得说回来，把动听的宣言变为实际行动只有在目前，即佛朗哥死后，并在别的政治招牌下才有可能。

国库近年内只有近30%的收入来自直接税。在目前的税收制度下，工人和职员是受害者，这是因为他们那部分税收被企业扣除，并直接交给经济官吏。而私人资本在申报收入税时做了手脚，大多只报一部分收入，这样他们便相应地占了便宜。

有一个著名的商人，最近几年每年平均只报10万马克的收入。大家都知道这个数目，因为财政部每年都要公布所有的税收额。然而具体的材料却禁止公布。而这个西班牙人的财产估计将近5,000万马克，年收入至少为25万马克。因而许多新闻记者和热心人在看到这些数字、他们的大名及上报的过低收入时都笑掉了牙。

偷税漏税的手法如此卑劣，以致在野的政治家都要求改革。拉蒙·塔马梅斯认为：“税收改革如此需要，以致连官方也一再宣布要改革。但这与寡头政治的根本利益相抵触，因而最终仍不了了之。当权者多年来维护这种保护他们本身最低利益的特权。所以，真正的税收改革只能在实现民主后才有可能。”

尼古拉斯·佛朗哥也认为：“在税收政策上我将反对历年来公开承认的最低工资而倡导实行最高工资、薪水、利息和利润。此外，必须最终消灭收入上惊人的不合理现象。这种现象肯定触怒了许多普通西班牙老百姓。”

虽然，塔马梅斯与尼古拉斯·佛朗哥两人天差地别，但他们在必须彻底改革管理机构这一点上倒是一致的。塔马梅斯认为：“光改革税收，而不改革管理机构的做法将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的确需要避免这么个情况，即更多的税收被用来喂肥贪得无厌、寄生闭塞并十分傲慢的管理机构。”

尼古拉斯·佛朗哥一言道破：“路易十四的格言‘朕即国家’与现代民主力求实现的格言‘我们即国家’之间存在着第三条危险的道路：国家是另一些人的，他们操纵并随心所欲地统治着马德里中央管理机构，并使之发展成为国中之国。”他继续说道：“我们大家都面对着一些有意义的要求，如改革我国管理机构，设计与我国政治现实一致的合理又廉洁的环境。”

管理机构实际上可比作一条有成千上万只触手的章鱼，它能单独生存下去。下面三例形象化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个荷兰人，两个德国人和两个西班牙人决心在半年内建一家饲料厂。由于他们与农业部主管单位以及信贷银行有良好的关系，因而半年内就同意了他们的相应计划及信贷。厂房及机器也造好了，只不过稍迟了一点，总之工厂能按计划、并在马德里知名人士的参加下落成。

但直到四个月后工厂才投产，其原因是：工业部一个有病且顽固的老官吏根据三十年代的一条规定，拒绝农业部批准使用的油罐。在不断行贿并自上向下进行干预后，才克服了这个障碍。但对工厂来讲，主要生产期已被耽误了。造成的财政损失是巨大的。

在第二个例子中商业部是主角：一个著名丹麦康采恩的西班牙子公司突然得到通知，务必为它从本国公司运来的机器和货物付10%的特别税。但没说明理由。这家关心其竞争能力的公司搞了一份材料，想说明本国公司可按世界市场价格向子公司供货，而不必按较高的价格结算。当他们带了这份材料到商业部去时，

惊讶地发现，主管官吏根本不怀疑哥本哈根对马德里索价过高，而相反怀疑定价太低。他拒收这份材料，因为“多要钱”这件事是由他同事主管的，而他只管审核“少要钱”这种情况。因此必须重新起草文件，以取悦于出主意的有否决权的律师，而损失了时间的公司只能干生气。

第三个例子尤其可悲：自治大学的医学研究部化了将近 50 万马克买了两台最现代化的仪器（氨基酸分析仪和闪烁计数器）。这种仪器在美国和西欧都十分吃香。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开动着，“因为现代研究需要这种仪器”。我们的大学也购买了两台，但一方面由于西班牙技术人员不会操作它，而另一方面使用外国技术力量会有损于西班牙人的骄傲感，因而这两台仪器被搁置了起来，并在地下室里吃灰。科学家们，特别是年轻科学家们抱怨说，买了这么贵的仪器，落成时还曾向国家元首展示过，仅因缺少相应的专业人员连一次也没有用过。一位医生苦恼地说：“我多年在国外工作。当让我在马德里大学领导一个研究部时，我直说了，因为我认为，只有最新设备才能把我国的科技工作提高到西欧水平。一年后我明白了，我们尽管买了贵重仪器，但我们缺少操作它的专业人员。此外，为了一支铅笔和一张纸都要打一场绞尽脑汁的笔墨官司，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使人工作呢？”

庞大的管理机构每年吞下 100 亿马克，占国家支出的 32%。西班牙国营企业经理人及私人企业经理人联合会主席曾详细地说明，为提高管理机构的效率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政治上要求在管理机构内部建立起协调；分散职能；各部重新改组，如相应取消多余的部门及下属机构。首先要精简。在经济上有必要改善财政部的结构，其目的是改进对税款的征收与监督。我相信，这些改革足以消除国家对预算的担心。提高税收率和税收额不是绝对必要的。”

左派，右派，民主主义者，甚至有些政府的追随者都在大谈税收改革及管理机构改革的必要性。这么说来，西班牙不再是外国企业以及西班牙富人“纳税的天堂”了？倘若政府结构原封不动的话，则现有经济官僚制度及管理机构结构上的彻底变化是不可能的。但从独裁政权过渡到民主政府势必在上述两方面带来彻底的变化。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如果西班牙象葡萄牙那样发展，那就可能发生革命变化甚至造成灾难。

尼古拉斯·佛朗哥自然不愿意西班牙模仿它西边的邻国。“我年轻时在葡萄牙耽了10年，因而我特别关注那里发生的一切。角逐政权的政治家中有许多人是我的朋友。尽管这样，从葡萄牙可以吸取许多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由于它没有及时进入转变和改革阶段，所以它陷入了革命的不稳定之中。”

他希望，胡安·卡洛斯能实现紧迫的改革，并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从而能使西班牙进入世界民主国家之列。“我与国王的友谊对我不仅是荣誉，而且是责任。我们同岁，并且一起在里斯本度过我们的年青岁月。今后，我们将一再发现，我们对西班牙未来的观点和立场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我极其尊敬胡安·卡洛斯。”

尊敬若是对等的，那么尼古拉斯·佛朗哥将在政府中重新任职就不会令人惊讶了。去世独裁者的侄子有政治野心。但是独裁者在世时，佛朗哥这个名字可能管用，而在将来就可能是一个主要障碍。

四、君主政体和势在必行的改革

穷富对立

报告葡萄牙情况的人喜欢介绍在1974年4月25日“丁香革命”前曾控制该国经济命脉的100个家族。而事实上只有一小撮家族集团，确实集聚了大量财富。梅洛家族通过“工厂联合企业”控制了250家以上的企业，其中包括一个银行，两个造船厂及一个船队。昌帕利莫德集团垄断了葡萄牙的保险业及水泥生产。由斯皮里托·桑托家族控制的公司约有200家。基纳集团控制大部分旅游业。科佩蒂诺·德米兰达家族和布里托家族也属于控制葡萄牙经济命脉的著名家族。

这方面还要加上在非洲殖民地拥有的巨大利益。梅洛家族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曾拥有大量地产。这个家族通过了托塔银行在瑞士与外国资本合资不断兴办掠夺原料（石油，铁矿，钻石矿，煤矿，咖啡以及其它热带产品）的公司。昌帕利莫德集团在殖民地也巩固了它对水泥生产的垄断。在殖民统治崩溃前该家族是向卡布拉巴萨计划供货的相当有力的竞争者。

近几年发生的葡萄牙事件使许多西班牙资本家吃不好饭，睡不着觉。而现在弗朗哥的死，使更多的富翁及大富翁感到切肤之痛。他们知道，近40年来他们地位优越。由于在内战及战后忠于弗朗哥，他们得到了经济特权的酬劳。

靠和弗朗哥结盟而发财致富的有奥里奥尔家族，巴雷罗斯家

族，菲耶罗家族以及独裁者的女婿马丁内斯·博尔迪乌家族。《二千经度》杂志在去年7月号上列举了200多个名字，根据调查，他们属于西班牙亿万富翁之列。专家们估计，有500到1,000个家族组成最上层的万人集团。

旧贵族也因他们忠于政府而受到了酬劳，他们在佛朗哥夺权之前就是大地主及许多银行主要股东，并拥有大量财富。根据该杂志提供的数字，梅迪纳塞利公爵一直占有79,100公顷土地，大致相当于汉堡市的面积。另外13个公爵、侯爵和伯爵，其中有佩尼亚兰达公爵、比利亚埃尔莫萨公爵、阿尔瓦女公爵，他们遐迹闻名，各人都可以为拥有地产超过10,000公顷而自傲。

即使今天，有特权的公爵，如比英国女王还富的阿尔瓦女公爵，还干着中世纪的事，把整个田庄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

许多大银行的上层人物往往是贵族，如卡达瓜伯爵任比斯开银行行长，王室的奥里奥尔侯爵掌管西班牙信贷银行。有几个贵族一身兼几个董事以证明其权力和影响，如格拉多男爵，阿尔阿马侯爵都拿17个董事的薪俸，而科鲁纳和阿特切伯爵以及索托·德阿列尔侯爵也一直拿着16个董事的薪俸。

根据德比尔瓦奥银行最近公布的数字，西班牙国家预算中最富的（占全人口1.2%）和最穷的（占全人口25%）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例都是相同的，即22%。社会主义工人党（西班牙许多社会主义党派中的一个，但它是最大和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发言人米格尔·博伊厄就以此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信条，把富人的收入分给穷人，这样一来，占人口四分之一最穷的人的生活水平不是一下子可提高一倍吗？

无人相信博伊厄会如此天真地认为，这种激进措施是万应灵药。他1939年2月5日生在法国的南部（他父母作为虔信的社会主义者和共和国派人士从巴塞罗纳逃亡到那里）。他在马德里上

了中学和大学。他早就信仰社会主义思想，使他在大学年代及以后都与当局闹别扭。1962年他坐了5个月的班房。虽然他学习优良，但被列入危害安全那一类人，因而西班牙原子能署没有录用他。

他起先在西班牙中央银行国民经济部当副主任，三年后在国家工业康采恩中任研究部主任。在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巴雷拉·德伊里莫和国家工业局局长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这两个人被认为是自由派人士和改革家）下台后，博伊厄也于1974年11月辞职。自那时起他在西班牙最大化学康采恩“里奥·廷托炸药公司”任计划部主任。

他在一家资本主义大企业中占居高位并没妨碍他坚信他的党的目标以及咒骂佛朗哥政府的一切：“佛朗哥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版。多亏情况特殊以及佛朗哥本人的能耐，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支持他上台的那几个大国来往不太密切，而战后又利用冷战扩大了他的地位，所以他能这么长久地占居高位。与经济发展相反，这阻碍了政治民主。而我们这一代人在这种政治下受损最大，这是因为它阻挡我们参与政治事务。当然，这还要加上他个人的遭遇——这个共和国派后裔不得不到国外去避难。但我们这一代年轻的西班牙人必须完全排除过去，而主要放眼将来，因为再不允许西班牙留在欧洲之外。”

博伊厄就各民主党派根本不接受佛朗哥最后一个企图（即妄图借助政治联合会给他的政府披上民主外衣，并把它作为谈判基础）作了透彻的说明：“政府要求该联合会遵守西班牙宪法，我们完全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因为这部宪法与为马克思主义者、自由派人士、社会主义者或保守派人士均能接受的西欧其它各国的中立基本法不同，它包含着来源于法西斯的思想原则。我们40年来一直反对佛朗哥主义，难道要我党在最后一刻仅为了得到更大程度的

合法性而吞下这些原则吗？”

他认为胡安·卡洛斯有别于佛朗哥：“国王既不是内战的常胜将军，也不是自1939年起直至今日暴力镇压的主要负责人。1975年9月事件清楚表明，独裁者佛朗哥死到临头时还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签署死刑判决。”

根据他的看法，胡安·卡洛斯完全愿意在西班牙实现君主立宪。但他能否推进民主化过程，并使国家的政治结构与欧洲的相一致，博伊厄是有疑问的。“我相信胡安·卡洛斯不乏良好愿望。但实际上在政府机构（如议会，国民运动全国委员会及枢密院等）范围内，达到西方模式的民主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必须废除现有的一切机构。但这肯定不为极右派接受。对军队我不太清楚，但我不相信它会很赞同的。因而胡安·卡洛斯在今后几个月内，当他保持其王位并要实现他的想法时，他将与许多方面作斗争。”

博伊厄同西班牙大多数政治家一样，对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未来是有信心的。他对自己的乐观看法（即西班牙很快将实现民主）举出四点理由：

“第一点，西班牙的社会进步超过意料。

“第二点，自古以来我们是以接受来自欧洲的政治模式与政治倾向而著称的。譬如十九世纪初是自由主义、维多利亚时代是议会两党制、在本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我们仿效魏玛共和国、然后是法西斯、而今日则是多数人的民主。

“第三点，除现有的经济状况问题及结构弱点外，我国经济达到惊人的成熟程度。企业克服了本身的惰性，并在许多情况下，就是在国际贸易中也有竞争能力。而工人也证明自己能作出成绩并能掌握现代化技术。

“第四点，与葡萄牙情况相反，西班牙在政治上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阶层。而葡萄牙在1974年4月25日前，除共产党外还没有

组织起来的政党。在社会主义、基督教民主派以及保守派阵营中有许多派别。但它们在短时间内完全能变为活跃的政党。此外，有一定数量的著名人士，他们颇有经验，因而不会象葡萄牙那样出现政治真空。”

博伊厄主张进一步改革政治经济政策。“作为社会主义者，对如何迅速有效地首先提高最低层人民的生活水平，我是有一定看法的。根据我的看法，西班牙不能采用瑞典模式，即小区域制（它虽有很进步的税收制度）。我们不仅需要实现税收改革，而且要通过银行及信贷国有化来打破目前在私人经济中由7家大银行集中控制的权力。”

他很清楚，对经济官僚制度的改革只有通过制订新的法令才能彻底消灭西班牙的税收丑闻。在西班牙有一条不成文法：任何一个公民都不认为经济官僚制度是绝对必须的。改革的困难主要应由以低效率著称的经济管理机构负责。所以许多西班牙人同意博伊厄的观点。“我们不仅要有进步的税收制度，而且要有一批文化水平高，收入优厚的税收检查人员，他们要能发现欺骗行为，并且自己不接受贿赂。”

税收改革，特别是随同而成立的新的经济管理机构有可能减少私人经济的投资活动，但他对此毫不在乎。根据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看法，国营经济较多的收入应用来促进国家投资活动。在财富再分配上，西班牙左派认为应该始终有利于国家。

但左派仇视收入和财富不合理分配的现象，仇视把权力高度集中在手里的7家大银行（西班牙信贷、中央、西班牙美洲、比尔瓦奥、比斯开、桑塔纳和大众银行）。据《金融时代》杂志估计，7家银行对工业的控制达30%到45%。

7家银行持有股份的著名企业有阿斯兰特水泥厂，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西门子，团结和凤凰公司（以上为西班牙信贷银行入

股的企业); 费尔斯通, 西班牙造船厂, 电力公司, 里奥·廷托炸药公司(以上为西班牙美洲银行入股的企业); 西班牙锌公司, 挖泥船制造公司, 加泰鲁尼亚铁轨厂(以上为中央银行入股的企业); 西班牙国营石油公司, 伊贝杜尔, 饮料公司, 比斯开冶炼厂, 恩赛特萨, 赛亚特(以上为比尔瓦奥银行入股的企业); 梅伏萨, 道氏公司, 国营巴萨公司(以上为比斯开银行入股的企业); 桑塔纳啤酒厂, 树漆公司(以上为桑塔纳银行入股的企业); 赫勒工厂, 伊维莱亚辛(以上为大众银行入股的企业)等。

银行在各企业占的股份多少是不一的, 譬如西班牙美洲银行在西班牙最大化学康采恩里奥·廷托炸药公司占有主要股份。而其余的股份属乌尔基霍银行和比尔瓦奥银行。这三家银行占有的股份虽不超过30%, 但公司董事会牢牢控制在他们手中。

主要反对派(社会主义工人党也是一员)认为, 只有对银行实行国有化才能限制它们对西班牙经济过分的影响。博伊厄说道: “如果连银行也实行不了国有化, 那么就更不可能对经济结构和公司结构进行彻底的改变。”

他对工人参与决策(联邦德国实行的制度)评价不高。他主张把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职能移交给职工。“尽管董事会从理论上讲应决定公司的政策, 但实际情况完全两样, 经理可以随心所欲地活动。他们中间有识之士虽不乏其人, 但几乎不受任何监督。金融寡头政治是一个无形的庞然大物, 他们留恋过去, 不思上进。所以我建议, 企业领导应向职工报告他们采取各种措施的理由, 这还将带来一个好处: 沟通消息和管理公开。”

大资本家的代表当然不会同意博伊厄的观点。他们最多主张财政改革, 较严厉的卡特尔法以及向欧洲靠拢以复苏竞争活力。但对国有化乃至企业制度的改革他们压根儿不愿与闻。

目前西班牙金融贵族还在高枕无忧。他们知道, 胡安·卡洛

斯及其第一届政府想绝对避免激怒有势力的集团，也就是富翁与大富翁们的集团。但一、二年内政局可能朝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变化。但即使那时他们也不会挨饿。他们早已在瑞士及其它地方的银行中存了大笔钱。葡萄牙难兄难弟们的遭遇已对他们起了作用。

北富南穷

自古以来，西班牙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各省与各地区之间在财富和发展上存在着很大差异。最迟自1957年起对这个问题再也不能等闲视之。全国按人口平均收入为15,131比塞塔，而巴斯底的比斯开省和吉普斯夸省超过30,000比塞塔，即比平均收入多一倍。马德里省收入为24,858比塞塔，巴塞罗那为22,453比塞塔，即比平均收入多50%。而奥伦塞省收入为7,893比塞塔，格拉纳达省为8,037比塞塔，阿尔梅里亚省为8,193比塞塔，只是稍微超过平均国民收入的一半。¹

为使低于平均收入的省份发展起来，在第一个发展计划中制订并宣布了一项区域政策纲领，其重点是建立和扶助发展部门；改善农业结构；在几个欠发展的滨海省份还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决心虽大，但收效甚微。1969年地区收入差异依然明显。按人口平均收入提高到44,681比塞塔。在金字塔尖上的省份还是比斯开(68,089比塞塔)，马德里(67,927比塞塔)，吉普斯夸(66,520比塞塔)和巴塞罗那(63,261比塞塔)。列入最穷的省份是阿尔梅里亚(23,074比塞塔)，哈恩(24,385比塞塔)和巴达霍斯(25,441比塞塔)。

有关地区分配的最新数字出自1973年。这些数字表明，即使在第二个发展计划后还是没有什么可以令人高兴的。名列前茅的仍是比斯开(139,849比塞塔)，马德里(138,610比塞塔)，巴塞罗那

(132,371 比塞塔)。而位于表尾的是卢戈 (57,619 比塞塔), 卡塞雷斯 (58,835 比塞塔) 和巴达霍斯 (60,910 比塞塔)。1973 年按人口平均收入为 99,721 比塞塔。

地区生活水平差异造成的后果是, 人口从经济落后区域向发达区域迁移。1960—1967 年间, 迁移人数约达 250 万 (约为总人口的 8%)。1964—1968 年城市人口占比例从 58.4% 提高到 62.8%。另一个数字是, 1961—1970 年间巴达霍斯省人口减少了 151,337 人, 科尔多瓦省减少了 109,808 人, 哈恩省减少了 83,536 人。1970 年西班牙 50 个省份中 24 个的人数少于 1961 年。

按人口平均支出的情况, 同样既反映出近年来的经济发展, 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1958 年西班牙人每年平均支出为 10,765 比塞塔, 而 1975 年为 71,710 比塞塔。出现的实际增长率为 144%。在进行调查的 12 个区域中差异是明显的: 新卡斯底里恩平均支出为 87,738 比塞塔; 加泰鲁尼亚—巴利阿亚为 84,559 比塞塔; 巴斯底和纳瓦拉为 84,555 比塞塔; 阿拉贡尼亚是 75,646 比塞塔, 它们都超过按人口平均的支出。而余下的 8 个区域都低于 71,710 比塞塔, 其中埃斯特雷马杜拉最末, 按人口平均每年仅支出 48,532 比塞塔。

塔马梅斯在他著的《西班牙经济指南》一书中试图找出地区之间异常差异的主要原因。巴斯底富裕是因为有地下资源、地理位置靠近英国法国、拥有海岸线等良好的自然条件, 并能充分地加以利用。长期以来, 在该地区扎根的钢铁和纺织工业带来了济经发展, 其特点是投资大; 从西班牙穷地方涌来大批劳动力; 那儿还建立重要的财政金融机构, 如比斯开银行和比尔瓦奥银行。

加泰罗尼亚也为其经济飞跃提供了类似的有利条件。西北省份有自己的银行, 并对全国有影响。但很少在巴塞罗那及其周围建立全国性的重要金融机构。加泰罗尼亚经济如此高度发展主要

归功于那里的家族企业。

马德里名列前茅是依仗下面两个情况：其一，强大和骄横的中央管理机构设在此地；其二，它是西班牙无可争议的经济中心。首都的4家银行，即中央银行，西班牙美洲银行，西班牙信贷银行以及乌尔基霍银行对工业、房地产业以及服务行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根据塔马梅斯的看法，穷西班牙目前还受累于需要改革的农业机构（在加利西亚存在小农经济，在南方存在大地主）、较低的文化水平以及欠缺区域政策计划，国家对此也促进不力。

拉蒙·特里亚斯·法尔加斯今年53岁，他主持巴塞罗那大学经济学讲座，并任乌尔基霍银行国民经济部主任，是加泰罗尼亚民主反对派的著名代表。他无疑是最熟悉西班牙区域政策问题的人士之一：

“根据我的观点，要评价经济布局主要集中在北部时需要看到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一，任何一个国家完全有必要最佳地发展它的自然经济区，譬如加泰罗尼亚；其二，同时也要看到过份集中会带来的危害性：首先社会费用（随着加工区产生的结构外的问题造成环境污染）很高，另外也忽视了有些区域可能有的发展机会。西班牙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农业国，尽管如此还要进口大量食品。由此造成贸易逆差。对此我们觉得不安。所以我认为，在区域发展上力求比较平衡的时刻已来到了。可能办法只有一个，牺牲高增长率，但我们应平心静气地接受它，因为生活水平会提高的。”

即使北部工业中心的发展也不是一刀齐的，其因素也不一。“譬如必须区别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而加泰罗尼亚本身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它属于内战最主要的失败者之一。所以政府竭力而为的无非是限制加泰罗尼亚经济发展。此外，它还要战胜风灾和潮水”。

他继续说道：“起初政府尽量不让加泰罗尼亚发展工业。政府的目的并未保密，相反它是在国家公报中公开宣布过的。但等政府看到这个目的不能实现时（因为不能简单地消灭内部促进繁荣的力量），近15年来便鼓励向巴塞罗那及其周围移民。马德里当局想以此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使在农村挣扎着的150万人能获得较好的工作条件，对此我们没有什么可反对的；第二，通过大量移民达到消灭加泰罗尼亚文化的目的。我们对此实际上全力反对。政府在巴斯底也贯彻了类似的方针。尽管有这个官方政策或正因为有这个官方政策，不但巴斯底而且加泰罗尼亚却仍保持其政治文化的独立。”

根据某些专家的意见，安达卢西亚有可能陷入类似意大利南方的境地，但根据特里亚斯·法尔加斯的看法，它若被视为西班牙最穷的区域之一，那国家缺少相应的区域政策要对此负主要责任。“我有这样的一个印象，西安达卢西亚并不穷，那里的问题是与农业结构、地方及工业结构有关。一项真正合理的区域政策将富有成果，并能使这一地区在近10—15年内经济飞跃。而东安达卢西亚却有理由令人担心。这一部分缺水，少自然资源，甚至地理位置也欠佳，以致于就是旅游业也帮不了它忙。尽管这样，我也并不认为，我们面临着意大利在其南方碰到的问题。在意大利南部毕竟居住着将近全国一半的人口，而东安达卢西亚的人口只占西班牙总人口的10—12%。”

一刀齐就意味着不精确。在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情况也如此。首先在北方有富的以及不太富的区域。共同生活不等于没有摩擦：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尼亚的关系就是如此。对阿拉贡尼亚人的前途，有一部分人满怀希望，有一部分人忧心忡忡。抱希望的人看到了那里的土地肥沃，怀忧虑的人看到了别人要把埃布罗河水引到巴塞罗那，而阿拉贡尼亚人以自己需要为由激烈反对引

水。

对这个由于当局态度暧昧所造成的大问题，加泰罗尼亚人特里亚斯·法尔加斯认为：“阿拉贡尼亚把埃布罗河的引水问题当武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保持客观的立场，并实事求是地分析埃布罗河水量的话，则可得出结论：用这些水足可灌溉五倍于萨拉戈萨工业区的面积。并且还有足够多的水留给巴塞罗那。萨拉戈萨试图从国家那里吸引巨额投资，并通过农田灌溉和改善结构外的问题，从而促进本地区的发展，对此我是可以理解的。整个事情使我担心的是，阿拉贡尼亚不单是为了本身利益谋取更多的水，而是要对加泰罗尼亚关住水龙头，使工业移到他们那里去，从而使我们将来没有工业。但实际上对阿拉贡尼亚和加泰罗尼亚来讲，水是够的。”

特里亚斯·法尔加斯如许多加泰罗尼亚人一样拥护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我个人是赞成联邦制的，充分尊重地区自治。但不必由我决定将来的国家形式，这需要由人民投票来决定。”

假如加泰罗尼亚决定分离，后果如何呢？“我不主张加泰罗尼亚独立，但大多数人民是否怀有这个愿望呢？我没有把握。这的确是矛盾的，一方面力求西班牙参加共同体，而另一方面西班牙得分成几个小国共同生活，尽管如此每个地区都只为自己打算。假如独立是他们的愿望，那就得屈从于这个愿望。”

在决定联邦制还是非联邦制国家之前，需要着手另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胡安·卡洛斯目前必须极其迅速地开始实现广泛的民主。若他不能成功，那我们很快就得从下面两条路中任选一条，也就是由有掌权欲的少壮派军人建立右派独裁政权或左派独裁政权。他们将实行比佛朗哥更为强硬的统治。佛朗哥最后已衰老而且疲惫了。所以至关紧要的是，胡安·卡洛斯务必在一年内按西方模式建立议会民主。按我的看法，这是西班牙不回复到独裁统

治的唯一的—个机会。”

特里亚斯·法尔加斯继续说道：“然后，如多数人同意（也正如我推测的那样），第二步需要实现联邦制国家。这方面人们试图建立按自然区域划分的12—15个行政区。这些行政区要有进一步的文化自治，当然也拥有行政管理权。”

在经济领域中，特里亚斯·法尔加斯主张保留市场经济制度，但也同意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和推动社会进步。这些要求乃是他政治信念的产物。“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我来讲个人自由是至关紧要的。但在社会领域中，我主张对现有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革。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伦理和道德。精神的进步必须超过物质的进步。天天追求最新式的汽车或最好的电视机是不对的。少点消费而多考虑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价值。这一点我与社会主义者是一致的，但就社会主义来讲，使我厌烦的是，它企图限制个人自由。”

他对西班牙未来政治的看法是忧虑加上谨慎的乐观：“胡安·卡洛斯是在西班牙政治史上最不幸的阶段继承这个摊子的，因此是值得表示遗憾的。我们想要看到，在他当国王的头几个月内能否造成另一种印象，这也是他被西班牙人民接受的唯一机会。”

他为什么忧心忡忡呢？“因为西班牙是一个困难重重的国家，我不知道能否实现我一心一意所希望的‘和平共处、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的形式。我不能肯定，一方面右派是否准备放弃许多属于他们的但是不合理的特权，而另一方面左派和中间派在为政治目标而奋斗时能否持宽容态度。”

但特里亚斯·法尔加斯也认为已可以看到一线光明了。“有迹象表明，共产党（按我的看法，在民主比赛中它能否起作用，这得看它是否坚持意大利共产党的路线）已明白自己的责任，而保守势力或许能慢慢领会我们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另外，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已不会象内战前和内战期间那样会发生激烈的阶级斗争。

这一切使我有理由感到幸运。”

但也有悲观的原因。“我担心的是，第一，西班牙人好斗，这不同于葡萄牙人；第二，国际无政府主义已在西班牙找到了繁殖的土壤；第三，存在这样的危险：经过30年暴政统治后对平静和秩序已不复感兴趣，从而变得无秩序了。但不平静与无秩序是对生产发展有害的，其结果是大大促进了激进主义。”

西班牙面临着全面的经济变革

首先要简略地叙述一下事实的经过：自1972年1月18日起，何塞·奥尔特加·斯波托尔诺（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一加塞特的儿子）及其朋友为出版一份名叫《国家》的自由民主派日报，试图得到西班牙内阁会议批准。近3年他们常听到有人私下在讲，他们的计划是不受欢迎的。1975年9月才宣布准许他们的报纸于1976年出版。

围绕着日报所进行的长期斗争，绝不只是对一份新的报纸拒绝发给许可证的问题，也不只是对精神之父和出版人羞辱的问题，而还隐藏着更多的东西。连斯波托尔诺本人也为此遭到不信任，虽然一部分政府人士还把他视为一介书生，并看成是其父亲精神遗产的执掌者。这个例子是对第一届阿里亚斯·纳瓦罗政府“开放政策”的考验。这个例子还说明，1974年2月12日由总理宣布的纲领在实际上所遇到的严峻局面。还表明，右翼反对派非常强烈反对这一项很克制的纲领。

出版这份日报的消息发布人出版社的400多个股东中的大部分是这么看的。许多西班牙人也是这么看的。对他们来讲，《国家》日报在出版前已象征着自由派反对政府并为西班牙的未来民主进行了斗争。

报纸的股东名单上有部长，如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和何塞·玛丽亚·德阿雷尔萨；有工业家，如拉蒙·阿雷塞斯和华金·穆尼奥斯；有知识份子，如作家卡米洛·何塞·谢拉；有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如华金·鲁伊斯—希门尼斯；有社会主义者劳尔·莫罗多和马克思主义者拉蒙·塔马梅斯。出版社总经理是赫苏斯·德波朗科，他于1929年生于马德里。他还是西班牙最大教育出版社经理和《结束》杂志的发行人。

波朗科是一位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不隐瞒自己民主派的主张。“可惜自由主义不适合统治国家，虽然它有为建设个人生活的出色基础。在政治上我应把自己列入社会民主派，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受西班牙伟大作家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多年影响。他曾是长枪党员，后来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可惜早年就亡故。另一方面我相信用民主手段以及在合理政策范围内彻底改革我国经济结构的必要性。”

即使现在，即在佛朗哥死后新时期开始时，他在西班牙政治中也不扮演活跃的角色。“作为《国家》报的总经理有为属于不同政治派别的本报股东们进行调解的任务。本报应成为一张独立的报纸并保持下去。它不应为某一个人或某一派别服务。由于在佛朗哥之后宪政时期中它将起重要作用，所以何塞·奥尔特加和我务必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

同何塞·德波朗科谈有关佛朗哥西班牙经济自由与政治不自由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个国家的未来政治经济时，感到满意，这是因为他既清醒又实事求是地说明现实情况，而且他有勇气对将来作出估计。

他对佛朗哥的评价是：“对我来讲，独裁者是一个人，他非常幸运能活这么长。他的所有行动表明他非常实用主义并具有史无前例的权力欲。在评价他的统治时代时，根据我的政治观点，我必须

说，我并不能找到与他的决定和行动一致的地方，虽然我要承认，当我年轻时，即 1947 年我曾是长枪党青年组织的热心成员。但这并不意味着，佛朗哥的政治作用全是反面的，因为旧政府也作出了不少成绩。总之，对我们来讲，西班牙的十九世纪随佛朗哥主义结束而告终。1976 年起开始了二十世纪。可惜这个世纪留给这个国家只有 25 年。”

怎样来解释较为自由的经济制度与直到 1975 年始终是西班牙特点的反动政治之间的矛盾呢？“客观上讲，这的确是一个矛盾，但这也是政府与西班牙资产阶级之间长期协作的产物。资产阶级得到支持佛朗哥政策的酬劳，即在他们本身的活动中可以放手去干，而今天过去盟友的情况有了变化。经济上的发展和政治形势使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得出这样的结论，将来经济若还要发展和繁荣的话，民主化是必要的。”

但是从人口学、文化和经济角度来看，近 35 年内西班牙社会结构已有彻底的变化，而政治上一点也没有变。“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大部分政府人士根本不理解对我们社会的现代要求，譬如对教育及培养需求剧增。目前所有西班牙团体都受到要为每个适龄儿童提供学习机会的强大压力。而家长协会则属于西班牙最活跃的团体之一。因为父母力求提高其子女的教育水平。文化和经济领域也有类似情况。西班牙整个社会都了解现代的新问题，可是保守政府却不然，它还是用早已过时的观点看待一切。”

注视西班牙政治舞台的外国观察家，多年来研究这么一个问题：组成政府的少数派为什么政治上能这么富有影响，并能长期掌权呢？对此，波朗科回答如下：“这个少数派之所以控制政治生活，是因为他们懂得迎合佛朗哥的个性和目标。另一方面，人们往往得出这么一个印象，即佛朗哥与他的追随者相比并不太独断专行。而事实上是他控制了政治生活，他从不放弃一部分权力，而只把一

些残羹分给那些他认为是忠诚于他的集团，或内战时可靠的不可遗弃的同盟者集团。但一旦他觉得它们过于独立或他讨厌它们时，就重新废除它们。所以我认为，这些集团的政治力量往往比想象的小得多。”

将来怎样呢？“现在佛朗哥已不在人世，但他的影响仍可觉察到，不过将不断减少。我不相信，至今完全站在独裁者一边的、因而同样也支持政府的军队，在佛朗哥之后年代还将是政府利益的保护者。军队将支持国王，但平时它宁可留在幕后。除非发生革命，它才有责任干预。政府若没有军队又没有资产阶级的支持，它的影响无疑会下降。”

西班牙资本家越来越反常，如同军队越来越中立一样，使政府深感不安。政府公开的代言人马德里的《向上日报》1975年6月曾发表一篇反对企业家的社论，它强调指出：“资本家对谁都是笑脸相迎，但谁也不拥抱……水混浊时，他们采取对谁都不十分热乎的立场，对真正资本家来讲理应如此。但他们不理解，他们稍一不慎就会陷入虎口，犯这类错误的机会是很多的，只要问一下葡萄牙人和古巴人就行了……”

上述对资本家的攻击证明了波朗科的看法，即资本家的利益在不少情况下不再与政府的政治见解相一致。“西班牙资本家，确切地讲是控制经济的由少数几个家族掌握的银行界感到了害怕。由于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因此他们感到对事态的发展负有责任，并害怕他们将来可能扮演的角色。我知道，西班牙金融贵族将立刻接受一项协定，确保在收入剧减情况下保持他们的地位。而与此相反，中小资本家却很安心，因为他们没有参与大资本家同政府的交易，但他们也害怕不安和混乱。”

面对葡萄牙事件，资本家害怕政治上左倾和工人阶级激进化，这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认为可能有些夸大。因为西班牙多数职

工是保守的。他们虽赞成改革，但反对革命。对内战后的艰难困苦仍记忆犹新，他们不愿把吃尽千辛万苦得来的繁荣为某种思想目的进行的试验而孤注一掷。

西班牙政治要如何发展才能消除资本家和工人对将来的害怕呢？波朗科对此的具体看法是：“为了避免激进化，从现在起就要公开所有问题并加以讨论。但也需要一个仲裁人，他决定那些问题优先，那些问题推后。西班牙共和国最大的错误是恨不能所有问题在一天内解决。我相信，不会再重犯这个错误。胡安·卡洛斯需要作出第一个决定，他必须出自信任而任命一位新的政府首脑。这个人毫无疑问从一开始起就要得到军队的完全支持。”

国王第一任总理的名字——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他是佛朗哥的最后一个人。他注定要全力以赴来推进民主化。不少西班牙人希望在这个位子上有一位自由派的坚信民主的新政治家。但对国王来讲，只有让阿里亚斯任此职而别无他选。只有枢密院才有权可以推荐三个人来当议长和政府总理。国王只能从这三个人中遴选一个，枢密院的多数位子仍被佛朗哥的部下所占有，因此它从未想到要推荐进步的西班牙人以供遴选。

胡安·卡洛斯宁可遴选阿里亚斯，并在他周围安插几位自由派政治家，如弗拉加·伊里瓦尔内任负责内政的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阿雷尔萨任外长，比利亚尔·米尔任负责经济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他们一起进入了内阁。

对弗拉加·伊里瓦尔内，阿雷尔萨及司法部长加里格斯的任命使我有理由希望，开放政策可以在不受干扰和不冒风险的情况下进行。当然，弗拉加关于两年内民主占主导地位一说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这位部长的良好愿望，而且也取决于谨慎的阿里亚斯和内阁中最保守的军人对民主化必要性的相信程度。

经济内阁同整个政府一样是自由派技术专家加上旧政府的代表。44岁的比利亚尔·米尔作为“比斯开冶炼厂”和“地中海冶炼厂”的董事长在国内外同业中享有出色经理的声誉。

但怀疑论者认为，比利亚尔·米尔缺少必要的政治经验和行政管理经验以实施紧迫的计划，如改革经济官僚制度，行政管理制度以及社会制度。此外，他们还怀疑，他是否有充分的主见来对付君主政体第一任劳工部长——强硬人物何塞·索利斯。

索利斯有着长为佛朗哥工作的生涯。从1957年到1969年他曾任统一运动的部长。1975年他又重任此职。现在他理应保证社会和平。不过事实业已表明，给这项任务找一个新的对象也许更为合适。

持批评意见的西班牙人认为，对整个经济内阁本来就不该相信。这四位部长在过去几年中曾先后任西班牙国营铁道的总经理。而这个国营企业的收支赤字最大，这一事实证明不能认为对他们的任命是适当的。因为西班牙的未来主要取决于第一届国王政府的经济政治成就。若它能制止目前近20%的通货膨胀，重新振兴停滞的经济，社会不安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并实现必要的结构改革，则它可以说首战告捷。因为经济复苏得越快，政治改革则越容易实现。

同许多西班牙人一样，波朗科对阿里亚斯·纳瓦罗被任命为国王陛下第一任政府总理感到不满。他宁愿看到另一位政治家取胜，譬如何塞·玛丽亚·德阿雷尔萨——温和中间派的著名政治家之一，或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原情报和旅游部部长，1975年11月前任驻伦敦大使。波朗科对阿雷尔萨和弗拉加的看法是：“他们有许多当今天的西班牙总理的条件。另外我也确信，他们相信民主改革。”

自然，1976年初西班牙还能心安理得地过下去，并对阿雷尔

萨仅任外交部长，而弗拉加仅任内政部长感到满意。他们同波朗科一起只能希望，形势发展进入民主轨道。“在未来的过渡时期中，政治联合会、民主委员会和统一纲领以及其它政治团体迫切需要真正组织成政党。因为分裂是他们常被组织得很好的少数派政府击败的原因之一。我估计各民主派别不会实现大联合的。只有当西班牙爆发革命时或许有可能，但我不相信会有这一天。”

如果接受西班牙能平静而有秩序地发展民主的观点，则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就是西班牙现有经济制度能否继续存在下去。波朗科对此有疑议：“西班牙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成为经济上不那么自由的国家。因为未来的掌权人难以把彻底改革经济官僚制度撇在一边。而这将限制资本家的经济活动。”

解散包括企业主和工人代表双方在内的工会是势在必行的事。允许自由组织工会将对社会提出更强硬的要求。虽工资及社会费用猛增，但为了维持竞争能力，西班牙生产设备将迫切需要迅速实现合理化和现代化。

波朗科继续说道：“这样也好。因为许多企业主也认识到，仍处于非法地位的、但为职工所信任的企业工人代表机构更能说明企业的问题，因而也是更有能力的谈判对手。此外，这些企业主在接受工人合理的要求上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分给股东高额红利的战略长期来占主导地位，但现在只有极少数几家公司实行这一战略。这个战略已被旨在提高生产率，从而能支付高工资和获取高利润的现代化计划所代替。所以，我估计将来西班牙越接近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则其经济竞争能力就越强。”

波朗科也估计到，随着西班牙很快接近欧洲共同体，这个过程将加快。“因为参加共同体将使西班牙的经济结构适应欧洲的形式。”

西班牙被摒弃在欧洲大门之外

1973年起共同体与西班牙之间为一项新的贸易协定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该协定原定于1974年初生效。马德里长期宣扬在农业上作出很大的让步,而坚持西班牙工业到1985年仍要求关税保护。而共同体部长会议和委员会指出,1972年西班牙出口的工业品就增加了7%。许多西班牙政治家也一再宣称,1980年他们的国家将进入世界上十个最先进工业国的行列。所以在布鲁塞尔没有人认为,到1985年西班牙工业仍要受到关税保护是合理的。

为了使西班牙人因工业迅速自由化带来的苦药变得甜一点,委员会部长会议建议,保证在农业上进一步退让。共同体新的提议也考虑了西班牙的几个希望和要求,例如对共同体本身也能生产的西班牙产品予以优惠条件,对西班牙出口的各种农产品免征75%的税,并审核1978年有关农业的谈判结果。而马德里似乎也准备,到1983年减少对来自共同体工业品的关税,条件是自1977年起西班牙出口的工业品能自由进入共同体九国。另外,也达成大量例外规定作为协定的一部分。

尽管在上述条款上双方是接近的,但一直未能签署一项新的贸易协定并使之生效。这主要是由于自1962年起马德里与布鲁塞尔之间进行的无休止谈判冷冷淡淡,充满了误会。德国西班牙贸易委员会按年代顺序汇总了表明各方关系的一览表,它是颇有启发性的:

1. 1962年2月9日西班牙正式请求就加入共同体进行谈判。
2. 1964年2月14日西方重新提出要求。
3. 1964年6月6日委员会答复,他们准备在共同讨论中审核相互关系。

4. 1964 到 1966 年就这个问题开始举行预备性谈判。

5. 1966 年 11 月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有关预备性谈判的报告，并指出只有签订一种贸易协定的可能性。

6. 1967 年 7 月部长会议决定授权就分两个阶段的最惠国协定进行第一次谈判。

7. 1969 年 7 月部长会议决定第二次有限授权。

8. 1970 年 7 月 29 日签署了西班牙与共同体之间的最惠国协定，并于 1970 年 10 月 1 日生效。

9. 1973 年 1 月 1 日英国、丹麦及爱尔兰参加欧洲共同体，从而使西班牙与共同体之间的所有协定均需进行修改。

10. 1973 年 1 月马德里和布鲁塞尔签署了一个附加协定，规定现有协定对七个老成员国延迟一年有效期，但这不适用于三个新成员国。同时决定开始新的谈判，并在地中海总政策的范畴内达成一个扩大的协定。

近年来，马德里与布鲁塞尔的谈判无进展的主要原因是，共同体在重新阐明地中海政策上碰到的困难；重新谈判有关英国参加共同体的条件；国外对西班牙判处左派激进团体五个成员死刑感到愤慨，这项判决是军事法庭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它无视法制国家的最起码准则。

尽管这样，西班牙和欧洲共同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却未受什么影响，反而可以认为是非常密切的。西班牙近一半的对外贸易是与共同体进行的。另外还要加上外国投资，在西欧的西籍工人的汇款以及来自西欧的成千上万的游客。这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紧密的经济关系，并大大超过拆散这个关系的力量。

华金·穆尼奥斯·佩拉茨 45 岁，是巴伦西亚的大工业家，与欧洲有密切的经济关系，所以他很熟悉西班牙与共同体之间的问题，他是一位坚定的欧洲主义者。他出身豪富，一直关心政治，开

始时受“圣十字神父会”的成员拉斐尔·卡尔沃·塞雷尔、安东尼奥·丰丹以及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华金·鲁伊斯—希门尼斯的影响。他是“西班牙欧洲合作委员会”的创办人之一。他与胡安·卡洛斯的父亲胡安·封·波旁熟识。从而使他成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目前他脱离基督教民主派，因为对他来讲它过左了。他想同华金·加里格斯·瓦尔格一起建立保守的“民主党”。

他对过去是这样看的：“佛朗哥及其政府曾写下西班牙历史上长长的一章。由于佛朗哥即政府，所以我认为，独裁者死后政府也将消失，当然不是一朝一夕，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我不属于这样的西班牙人（这些人有不少曾投靠政府并与佛朗哥共过事），他们只不过为了赶时髦而攻击和辱骂佛朗哥将军，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等待，独裁者死后会犯什么罪。当然对我来讲，这些错误将受到法庭的惩处。

穆尼奥斯给国王什么机会呢？“胡安·卡洛斯面前有两条路，任凭他选择。第一条，他成为决定他当接班人的那个政府的俘虏；第二条，他身为国王有责任维护王位的独立。如果他走第二条路，当然他也只有这样做，西班牙实现民主时，他才有前途。”

对穆尼奥斯来讲，西班牙是欧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共同体能越快吸收它当正式成员国则越好。“人民希望西班牙参加欧洲共同体。今日若举行公民投票的话，我敢打赌，绝大多数人都会赞成。为什么我对此如此坚信呢？因为我研究许多资料后了解到，西班牙人民完全意识到自己是属于欧洲的，并越来越认识到，与西欧其它九国结盟后，许多问题就容易得到解决。西班牙近40年来政治上的孤立对许多西班牙人来讲是一大不幸。”

对西班牙参加共同体会产生什么样经济效果的问题，华金·穆尼奥斯回答道：“过去紧密的贸易关系并不能掩盖它曾带来的很

大不利。我们受到关税、数量限制以及对西籍工人的歧视（他们的处境确实很糟）而造成的损失。共同体若决定协调其经济、货币、金融以及能源等政策的话，那我们更要遭罪了，而西班牙如处于这个巨大发展之外，那西班牙就会完蛋了。”

穆尼奥斯同大多数西班牙人一样明白，只有民主在他们的国家占主导地位时，才会被吸收参加共同体当正式成员国。为加入而进行的讨价还价中还有这么一个问题：西班牙几时才算够格呢？“这里让我们设想一下，国王在今后一、二年内能否实现民主呢？或者极右翼是否会不断地强烈反对，以致一再破坏整个民主化过程呢？国王不乏良好愿望，但我也认为，他完全了解这个事实，只有迅速实现民主，才能挽救西班牙的王位。”

与西班牙人讨论时很多人都持这种理论：若早在六十年代吸收西班牙参加共同市场，那将加速其民主化过程。由此产生了对共同体的非难，认为它对政府寿命延续如此久是有责任的。穆尼奥斯也这样认为：“可惜政治是有能耐的人的艺术。欧洲共同体以及整个世界，在五十或六十年代断绝和西班牙的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从理论上来讲是理想的。这肯定将加速政府的灭亡，因为即使万能的佛朗哥对百分之百的真正孤立也找不出拯救的办法，因而只得举白旗投降。总之，这不过是我们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这当然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不利。”

他继续说道：“因此马上会提出第二个问题，假如早就接受佛朗哥及其政府统治下的西班牙参加共同体，则会发生什么呢？在这里，我的回答是自私而实用主义的。我希望欧洲这么去做。起初，这样在政治上不会取得翻天覆地的进步。但至少在经济发展上会得到很大的机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使政府越来越难以再用西欧民主弊病的宣传来蒙蔽人民，保持政治上的束缚了。”

但他同意，如共同体接受一个独裁者作成员的话，则共同体违

背了它的几个基本原则。而实际上自戴高乐死后，欧洲共同体再没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家支持西班牙参加共同体的提议。除西德外长根舍曾在1975年初春访问过马德里外，至今再没有其它国家的领导人来过。“伊比利亚半岛上局势的发展对整个欧洲也有重要作用。鉴于这种情况，并由于其地理位置，西班牙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包括安全政策。所以，我还要就西班牙同共同体的关系表示我们的愿望，即要求继续不断地接近共同体。”

在另一方面，欧洲共同体也该明白，再也不能重犯对葡萄牙的错误。它曾估计到那里会要求迅速给以经济援助。但不管对斯平诺尔斯重新实现民主的计划，还是力求结束殖民战争的计划，西欧均不提供财政援助。而非要等选出能制订宪法的议会后才同意给以信贷。而葡萄牙穷困的经济早就需要它了。

欧洲开始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要拭目以待：改革政策是否确有行动。而当实际上已开始感到并看到一些自由和民主趋势时，共同体部长会议应断然宣布准备就参加共同体的条件进行谈判，这将为西班牙开辟通往共同体的道路。然后，布鲁塞尔与马德里也很有必要坐下来谈判达成一项援助计划，以缓和西班牙最令人担心的经济形势，并支持它继续发展。

共同体若观望过久，则西班牙有可能重蹈葡萄牙的覆辙。首先布鲁塞尔对西班牙不会象对葡萄牙那样，借口西班牙经济落后而拒绝它参加。根据华金·穆尼奥斯的看法，西班牙经过一段过渡时期后完全有能力参加共同体。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西班牙农业，则会发现，它早以出口为目标了。但我们往往还必须高价进口本身不生产的农产品，这是因为我们不是共同体的成员国。在肉类业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麻烦，这是由于来自欧洲的肉类价廉物美。不过，西班牙过去的政府为了不使消费价格上涨也从北欧进口低廉的肉品。所以我认为，西

班牙参加共同体的话，其肉类业遭受的损失不会太大，特别因为双方同意有一个过渡时期就更是如此。”

而工业呢？“这里当然有一些害怕同欧洲竞争的人，他们最希望通过很高的保护关税以及国家大量补助而高枕无忧地长此下去。在这方面我想到来自纺织业的一些具体例子。但是大多数的企业主都知道，西班牙市场将慢慢变小，所以门户还得开大些。我的确相信，西班牙多数企业主，其中也包括开始有可能要与困难作斗争的那些企业主，主张西班牙尽快正式参加共同体。”

西班牙有几个在出口贸易上作出巨大成绩的经济部门表示，它们根本不怕同欧洲竞争。传统的出口商品，如橙子，水果蔬菜罐头，橄榄油和酒在出口单上仍占主要地位。但也越来越多地出口石油和钢铁的半成品或成品，轮胎，船只，鞋，车辆以及书籍。1974年西班牙向国外出售价值近10亿马克的船只及鞋。出口的车辆，轮胎及书籍合5亿马克。

也有些工业害怕同欧洲竞争，这中间特别是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底的纺织工业，但也包括其它一些部门，如部分机器制造业、化工业及制药业，它们在技术上不能与欧洲媲美或受目前中小企业的工业结构影响。

尽管这样，巴伦西亚的经济界根据单纯经济观点分析西班牙参加共同体的利弊时，得出同穆尼奥斯类似的结论，即对西班牙来讲，正式成员国是完全能担当得起的。

佛朗哥之后西班牙所有政治家都不得不提出政治结构民主化的要求。主张君主政体的自由派政治家也是这样。但问题是政治家们能否抵制极右翼的反抗。假若要他们做到这一点，那么西欧政治家也必须克服布鲁塞尔和西欧各国的农业生产者的反对，以及在政治上还可能遗留的内部困难——反对西班牙参加共同体。若他们失败了，那西班牙民主过程也可能要失败。